中國共產党的九十年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

目录

第六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本章提要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相继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两个历史性转变。1949年至195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巩固人民民主政权而斗争，基本上完成土地制度改革和其他民主改革任务，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迅速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为向社会主义转变进而实现工业化准备了条件。1953年党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到1956年，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形势和党的任务

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



★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成立了。”军乐队奏响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接着举行盛大的阅兵式，中国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踏着胜利之师的步伐接受人民的检阅。工人、农民、学生、市民的游行队伍高举红旗，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当天，全国已经解放的各大中城市都举行了热烈的庆祝活动。10月1日这一天，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

执政之初面临的考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①]的国家。在开国大典之前，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一致决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施政纲领。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等。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机构负责人的，包括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海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等各方面的优秀代表人物、知名人士和专家，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团结建国的方针和人民民主政权的特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纪元。领导和组织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的党，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生活的重任。随着近代以来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历史任务的胜利完成，中华民族开始了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新任务而奋斗的征程。党的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根本上结束了100多年来中华民族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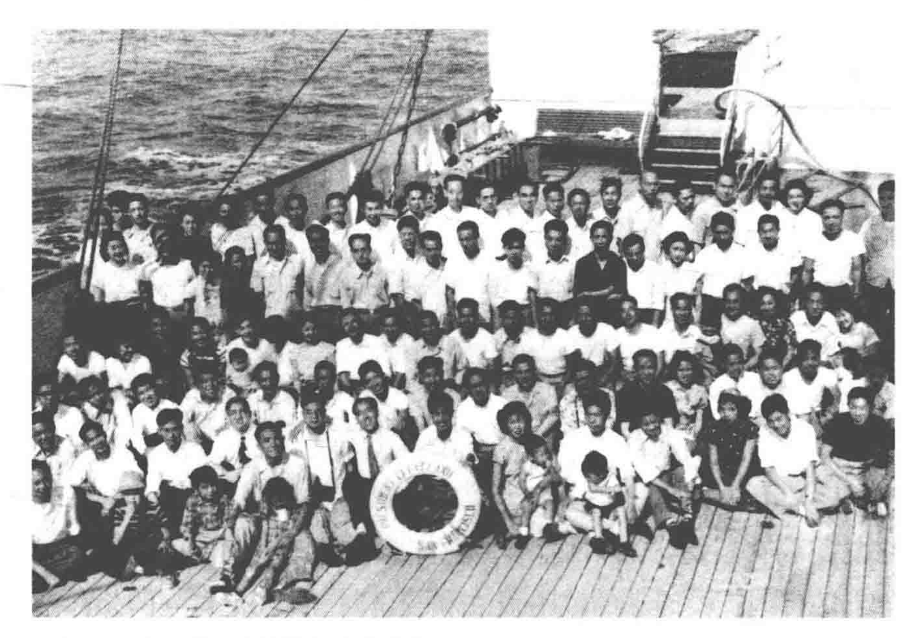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历史，使中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性质，成为真正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占当时世界人口总数1/4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随着在全国范围完成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的改革，从根本上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中国人民真正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军阀割据、战乱频仍的历史，形成了国家基本统一，国内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空前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使中华民族呈现出美好光明的前景。这是中国由近代衰落走向强盛的历史转折点。它为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积贫积弱的状况，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创造了前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具有世界性意义。它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

在巨大胜利的鼓舞下，全国各族人民革命热情高涨。党的各级组织和人民军队，在建立新政权的工作中表现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 1950年10月，由美国归来的留学人员回国途中在船上合影。

精神、艰苦奋斗的作风和严明的纪律，令广大人民耳目一新。工农群众满怀翻身的喜悦，全力以赴恢复生产重建家园。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欢欣鼓舞，踊跃参加革命工作。民主党派及工商界人士珍视来之不易的机遇，愿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旅居海外的学者、科学家纷纷回国参加建设。许多中间人士，包括从反动营垒中分化出来的人士，主动向党和政府靠拢，要求重新学习，以适应新的形势。解放区和原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的力量、革命力量汇合起来，更有力地发挥组织动员作用。中华大地上呈现出万象更新的局面。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着严峻考验，许多困难亟待解决。

军事上，人民解放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国民党还有100多万军队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负隅顽抗。在新解放地区，国民党溃逃时遗留下的大批残余力量，同当地恶霸势力以及惯匪相勾结，与人民政权对抗，严重危及社会新秩序的建立和稳定。

经济上，新中国继承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生产萎缩，生态破坏，交通梗阻，民生困苦，失业众多。国民党统治下长期的恶性通货膨胀，造成物价飞涨、投机猖獗、市场混乱。此外，在拥有三亿以上人口的新解放区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封建的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还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党和政府有没有能力把经济形势稳定下来，把生产恢复起来，使自己在政治上经济上完全站住脚，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从国际环境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得到苏联和东欧、亚洲人民民主国家以及一些西欧国家的承认和支持；亚洲、非洲许多国家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运动正在兴起。这是对建设新中国有利的外部条件。另一方面，美国拒绝承认新中国，并竭力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能不能冲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建设自己的国家，这是又一个严峻考验。

中国共产党自身的队伍，也面临着如何在全国执政的新考验。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艰巨繁重的建设任务摆在党的面前，要求全党必须排除万难，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习经济建设和治理国家的全新本领。更重要的是，在执掌全国政权、从事和平建设的历史条件下，党如何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不因权力、地位而丧失革命意志，不为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所腐蚀。对此，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向全党提出警告：要经得起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1949年11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检查中央直属部门和各级党的组织及党员违犯党的纪律的行为。朱德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面对复杂形势和种种考验，中共中央保持清醒头脑，满怀信心地迎接挑战。根据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各项基本方针，党采取一系列积极稳健的政策措施，有条不紊地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开始了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

地方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

开国大典的礼炮声犹闻在耳，人民解放军即遵照中央军委的部署，继续向华南、西南进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扫荡残敌。到1949年底，在华南，相继解放了闽南地区和广东大部、广西全境；在西南，先后解放了贵州、四川，并以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促使国民党军政要员起义，解放了云南、西康[①]地区；在西北，新疆宣告和平解放后，入疆部队完成了千里挺进边陲的壮举。1950年4月，人民解放军千帆竞发强渡琼州海峡，同国民党海军展开激战，取得大规模渡海作战胜利。5月1日，我国第二大岛屿——海南岛获得解放。截至同年10月，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作战，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28万余人，收编改造了170余万起义、投诚的

① 旧省名，1955年撤销省建制，归四川省管辖。



★ 1951年10月26日，西藏地方政府为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式。

国民党官兵。

西藏是全国大陆最后一个待解放地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西藏上层分裂势力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公开打出所谓“西藏独立”的旗号，企图趁国民党政权覆亡之际将西藏从祖国大陆分离出去。西藏自元朝纳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辖，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共中央确定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西藏的坚定不移的方针，同时慎重地对待西藏地方的历史、民族、宗教等复杂问题，同西藏上层分裂势力进行了军事和政治紧密配合的斗争。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先后进驻拉萨及日喀则、江孜等国防重镇，结束了西藏长期有边无防的历史，粉碎了帝国主义及西藏少数分裂分子制造“西藏独立”的图谋，实现了祖国大陆的统一。西藏的和平解放，是西藏地方从分离走向团结，从落后走向进步的重要转折点，这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一个重大胜利。

随着解放全国大陆的胜利进军，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迅速建立起来。在建政过程中，一些地方面临着严重的匪患。各地的土匪，主要

是不甘心失败的地主恶霸势力纠集反动帮会、旧社会的惯匪等拼凑起来的反革命武装；另外，有相当一部分国民党军的残部就地转化为政治土匪。形形色色的土匪武装相互勾结，以推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为政治目的，有组织地进行武装暴乱和颠覆活动，威胁着人民政权的巩固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为剿灭土匪，1950年3月，中央军委作出强有力的部署，先后从人民解放军抽调主力部队，分别在新解放地区土匪活动区域，展开大规模的剿匪斗争，同时帮助当地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发展生产和进行土地改革。为保证剿匪作战的顺利进行，中共中央、毛泽东提出军事进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武装自卫三者相结合的方针，规定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

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新解放区全面展开由军队、地方和人民群众紧密配合的大规模剿匪作战。首先集中优势兵力，对股匪严重的华东浙闽赣，中南湘西各县，广西瑶山、六万大山、十万大山等地区以及西南川、康、滇、黔各省进行军事进剿。到1951年上半年，各地清剿的股匪已逾百万，大陆上的匪患基本上平息。旧中国历史上遗留下来而为广大人民深恶痛绝的匪患得到根绝，有力地保护了人民安居乐业，基本安定了社会秩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是彻底打碎国民党反动统治机器之后在全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在各新解放地区，先是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维护社会秩序，接管国民党和旧政府的一切公共机关，组织恢复生产。一般经过几个月的过渡，各地陆续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地方人民政府。政府的工作人员大都是来自老解放区的干部、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新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从中央到地方领导层的构成，以共产党员为主体，吸收了相当数量的爱国民主人士参加。

在建立必要的社会秩序后，各地对城乡基层政权进行了系统的改造。这是铲除国民党反动统治根基的一项重要工作。首先废除国民党

对人民实行严密控制和监视的保甲制度。在城市，普遍建立市辖区或不设区的市下的街道办事处，逐步建立健全居民自治组织（后统称居民委员会），负责传达政府的方针、政策和法规，开展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各项活动，如防空、防特、防火、防盗等，同时担负改造游民、娼妓，贫民救济，卫生防疫，清查户口等大量社会工作。这对于有效实现基层政权的更迭，恢复工商业和正常的社会秩序，协助政府做好城市的管理与建设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在新解放区农村，结合清匪反霸、减租减息斗争，普遍建立有广大农民群众参加的、带有半政权性质的农民协会组织，同时建立民兵、自卫队组织，协助政府进行防匪、防特等治安工作。在此基础上废除保甲制度，进行划乡和建立农村基层政权工作。各地召开乡农民协会会员大会或农民代表会议，民主选举乡政府委员会，成立乡人民政府。

经过对全国城乡旧的基层政权进行彻底改造，人民政府的组织系统从中央、大行政区、省、地（市）、县、区一直延伸到社会的最基层，初步形成上下贯通、集中高效、具有高度组织动员能力的国家行政体系。这是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一次重大变革，为党在全国执政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到1951年，全国共成立29个省、1个民族自治区（内蒙古）、8个省级行政公署、13个直辖市人民政府，140个省辖市人民政府及2283个县人民政府，形成从中央到地方政令统一畅通的各级政权机构，使纷繁复杂的政府工作迅速打开局面。人民民主政权成为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真正得到人民拥护的、在全国范围内有效行使权力的政权。

新中国外交方针的制定和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结束百余年来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完整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新型的外交关系，创造了前提。在全国解放前夕，党正确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国际形势的变化，制定了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和指导原则。

战后国际形势的演变，主要是世界上逐渐形成以美苏两大强国相互对峙为特征的两极格局，出现了美苏之间的矛盾同帝国主义与和平民主两大阵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相互对抗交织在一起的局面。这一方面为新中国成立后同苏联和一批人民民主国家以及周边一些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建立新型外交关系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意味着新中国同美、英等国之间必然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1949年上半年，毛泽东先后提出了三条基本外交方针，并形象地概括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第一条，是不承认当时外国政府派驻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也不急于取得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第二条，是首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干净，不给它们留下活动余地，然后再考虑建交问题。第三条，明确宣布新中国站在社会主义和世界和平民主阵营一边。

这些方针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党对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所面临国际形势的清醒判断和现实考虑：新中国成立后能否立即同一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以迅速获得国际承认？如何防止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保障国家的安全？怎样取得外国对我国经济恢复的必要的援助？在二次大战后世界形成两大阵营对峙的国际环境下，要解决这些问题，我国的对外政策只能"倒向社会主义一边"，争取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而在内部政策上，则强调自力更生，并认真着手去做。

以上述外交方针为指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了新中国与外国建交的原则，即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

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

根据《共同纲领》规定的建交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一经成立，即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并先后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和越南等十个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一成果具有重大意义，不仅有利于刚诞生的新中国步入国际社会，而且有利于我国迅速恢复和发展饱受战争创伤的国民经济。



★ 1949年10月16日，毛泽东接受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递交国书后合影。

对于愿与新中国建交的一些亚洲民族独立国家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按照《共同纲领》“先谈判后建交”的原则，即在对方明确表示承认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同国民党集团断绝“外交”关系，承诺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前提下，进行实际的建交磋商。从1950年至1951年，新中国不仅同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四个亚洲民族独立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同瑞典、丹麦、瑞士和芬兰四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通过与这些国家建交，新中国向周边国家传达了睦邻友好的信

息，向世界昭示了一个中国的原则，迈出了打破美国对新中国实行遏制和孤立政策的重要一步。

废除旧中国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是党的既定方针和新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立即结束长期由帝国主义国家控制我国海关和关税收支的局面。1949年10月，中国海关总署成立。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随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和新的海关税则，并由国家管制对外贸易，实行进出口许可证制度。中国海关由此完全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1950年1月至9月，北京、天津和上海的军管会先后宣告收回或征用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在当地的兵营，外国在华军事特权被全部取消。1950年7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发布关于统一航运管理的指示，规定外轮一般不准在中国内河航行，只有在特定条件下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悬挂中国国旗，严格遵守中国的法令和规定方可驶入；同时，对在华外轮公司实行逐步接管。中国领水主权全部恢复。至此，全部取消了外国在中国大陆的军事特权和经济特权，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经济利益，彻底结束了鸦片战争以来我国主权被外国肆意践踏、外国人在中华大地上耀武扬威的百年屈辱史。

对于外国人在华拥有的企业和房地产，党提出应按照国籍、系统、行业等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况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美国宣布管制和冻结中国在美的公私财产及存款、物资。我国政府采取针锋相对措施，发布管制美国财产和冻结美国存款的命令，同时宣布征用英国在大陆各地的公司财产。随着外国在大陆的企业日渐衰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残余基本上被清除。

对于外国政府、私人和团体在中国设立的宣传机构，城市一经接管即开始清理，首先停止各地“美国新闻处”的活动；随后宣布不允许外国人继续在中国兴办报纸和杂志，停止与中国无外交关系的外国通讯社

和记者的活动。对外国人经办的或接受外国津贴的文化、教育、卫生、救济等机构，一段时期允许它们在遵守中国政府法令的前提下活动。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重大外交行动。这次访问最重要的目的，是在国民党政权被推翻后，旧的中苏条约应予以废除而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适应中国革命胜利后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的变化。经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和安排，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中苏双方就签订新约和有关协定举行正式谈判。在谈判中，两国代表就关系双方重大权益的处理中国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问题，贷款和贸易协定问题反复交换意见，虽然存在种种矛盾和不同看法，但最终双方都作出了相应的让步，就条约文本的内容达成一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有关协定在莫斯科正式签订。这是新中国外交取得的重大成果。4月11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批准这一条约时，毛泽东指出：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



★ 1950年2月14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上签字。

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

没收官僚资本 建立国营经济

中国的官僚资本是官僚资产阶级依靠超经济的特权，在剥削劳动人民和兼并民族工商业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也是《共同纲领》规定的一项历史任务。与彻底打碎反动的国家机器不同，党确定对官僚资本企业先按照原来的组织机构和生产系统完整地接收下来，保持“原职、原薪、原制度”，实行监督生产，然后逐步地进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这样，既避免发生损失和混乱，又保证企业接收后尽快恢复生产。随着城市接管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到1950年初，全国合计接管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2800余家、金融企业2400余家。以此为主要基础，国营经济迅速建立起来。1949年底，国营工业（包括少量合作社工业）的固定资产，占全部工业（包括手工业）固定资产的80.7%；拥有全国电力产量的58%，原煤产量的68%，生铁产量的92%，钢产量的97%，还掌握了全国的铁路和其他大部分近代化交通运输事业，以及大部分银行业务和对外贸易。社会经济中凡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控国计民生的部分，已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掌握在人民手里。由于官僚资本在旧中国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民族资本主义的力量单薄而又分散，官僚资本企业一经收归国家所有，实际上就改造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收官僚资本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步骤，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据全国清产核资委员会统计的数字，截至1952年，全国国营企业

固定资产原值为240.6亿元人民币[①]，其中大部分为没收官僚资本企业的资产（不包括其土地价值在内）。除去已用年限折旧后净值为167.1亿元人民币。这笔巨大财富收归国家所有，构成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经济物质技术基础的最主要部分，为国家调节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组织恢复生产事业提供了有力的物质手段，并决定着全社会经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一经建立，就成为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和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为以后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做了重要的物质准备。以国营企业职工为主体的中国工人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成为整个国家的领导阶级。

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党在城市工作中，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并把恢复和发展国营工业的生产放在第一位。在城市解放之初，许多工厂及机器设备遭到严重破坏，一些矿山变成废墟，处于人员离散、生产瘫痪状态。在这种困难形势下，党和人民政府牢牢把握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紧紧围绕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的中心任务，领导开展了工业生产的恢复。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这是新中国最早公布施行的基本法律之一。《工会法》明确规定：在一切企业、机关和学校中，以工资收入为自己生活资料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体力与脑力的雇佣劳动者及无固定雇主的雇佣劳动者，均有组织工会之权。在国营及合作社经营的企业中，工会有代表受雇工人、职员[②]群众参加生产管理及与行政方面缔结集体合同之权；在私营企业中，工会有代表受雇工人、职员群众与资方进行交涉、谈判、参加劳资协商

① 按1955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新人民币币值折算，新币1元等于旧币10000元，下同。

② 1950年8月政务院公布《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明确指出“职员为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46页。

会议并与资方缔结集体合同之权，等等。党和各级政府认真贯彻实施《工会法》，各地国营及合作社企业、大部分私营企业，包括机关、学校等，陆续建立和健全了工会基层组织，并组建铁路、煤炭、机械、纺织等全国性产业工会。在工业生产恢复中，全国总工会及各级工会组织对企业行政部门或资方执行劳动保护、劳动保险、工资标准、工厂卫生与技术安全法令条例的情况实行严格监督，切实保护职工群众的利益；同时对职工进行维护政府法令、遵守劳动纪律等教育，通过组织生产竞赛、增产节约运动，保证生产计划的完成，并为改善工人物质文化生活做了大量工作。1950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36.4%，充分证明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工人阶级是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的主力军，完全能够担负起建设新中国的领导责任。

稳定物价和统一全国财经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财政经济面临严重困难。抗战以来愈演愈烈的恶性通货膨胀仍在延续，人民解放军后期作战仍需很大开支，恢复生产和铁路交通急需大量资金，对不反抗新政权的数百万旧军政公教人员实行“包下来”政策，也加重了财政负担。在这种情况下，旧社会留下来的畸形发展的投机资本在新解放城市继续兴风作浪，加剧物价上涨，市场混乱。能不能遏止涨价风潮，成为关系人民生活、社会安定的重大问题。面对复杂形势，党和人民政府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和有力的经济措施，成功组织了同投机资本作斗争的“两大战役”。

首先是“银元之战”。各地城市一解放，军管部门和人民政府即通令以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金条、银元、外币一律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严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但金融投机商对此却置若罔闻，在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他们甚至扬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针对这一情况，1949年6月10日，上海解放仅半个月，市军管会即果断查封金融投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将破坏金融秩序的首要分

子200余人逮捕法办。武汉、广州等城市解放后也相继查封地下钱庄，沉重打击了投机商的非法活动。全国粮油价格随之回落。

再一场是“米棉之战”。同年10月，投机资本家趁政府收购粮棉之机，大量囤积粮食、棉纱、棉布和煤炭，再次掀起物价风潮，各地物价持续猛涨达40余天。国民党特务趁机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米、棉）一黑（煤），就能置上海于死地。以陈云为主任的中财委沉着应对，精心部署铁路交通部门在全国范围集中调运粮食、棉纱等主要物资，在涨价最猛的11月25日，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沈阳、西安等大城市统一敞开抛售，使物价迅速下跌；同时催征税收，进一步收紧银根，投机商资金周转失灵，纷纷破产。在掌握足够的周转粮之后，中财委又部署于1950年春节后的正月初五，在上海敞开销售大米2亿多斤，使期待新年暴利的投机商不得不将囤积的大米全部蚀本吐出。

经此“两大战役”，不法投机资本一蹶不振，国营经济取得稳定市场的主动权。这是党和政府在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积极作用的同时，限制其消极作用取得的第一回合的胜利，得到人民群众，包括愿意从事合法经营的资本家的支持。上海一位有影响的民族资本家在事后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①]

通过市场较量使物价趋于回落，还只是暂时的。要从根本上稳定物价，必须做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和市场物资供求平衡。当时新解放区的财政处于分散状态，中央政府担负着军费、生产恢复、赈灾救济等巨额开支，财政入不敷出。随着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全国性的军事行动基本结束，国家财政经济的统一已势在必行，并有可能实行。1950年3月，政务院发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决定统一全国财政收入，使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集中到中央，用于国家的必要开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使国家掌握的重要物资能从分散状态

① 陈云：《上海工商界情况》（1950年1月1日），《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页。

集中起来合理使用，以调剂余缺；统一全国现金管理，一切军政机关和公营企业的现金，除留若干近期使用者外，一律存入国家银行，资金往来使用转账支票经人民银行结算。这个决定在全国雷厉风行地贯彻执行，很快取得明显成效。1950年一、二季度国家财政赤字曾占支出总数的43%和40%，而三、四季度即下降到9.8%和6.4%，财政收支当年已接近平衡。随着实行现金管理、整顿税收、推销公债等措施，全国物价进一步回落并趋于平稳。

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结束了自抗战以来连续多年使人民深受其害的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局面，有力地推动了在全国范围内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为独立自主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转变，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创造了条件。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在财政经济战线上第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毛泽东高度评价这个胜利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国内外那些对中国共产党能否管好经济持怀疑态度的人们也不能不表示赞佩，叹为“奇迹”。事实证明，共产党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是坚强有力的，在经济上也是完全有办法的。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

随着在经济战线上取得初步胜利，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但还不是根本好转。为全面部署党在恢复国民经济阶段的各项工作，1950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向全会作题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向全党提出当前阶段的中心任务。会议指出，要获得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需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创造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

在全会上，陈云就财经问题作报告，对合理调整工商业作了具体部署。他指出，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应当统筹兼顾。因为私营工厂可以帮助增加生产，私营商业可以帮助商品流通，同时可以帮助解决失业问题，对人民有好处。只有在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办法下面，才可以大家夹着走，搞新民主主义，将来进到社会主义。但五种经济成分的地位有所不同，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统筹兼顾。全会还听取了周恩来等人分别对外交工作、统一战线、军队整编和整党工作所作的说明。毛泽东的报告和全会上其他几个报告，围绕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主题，作出了对以后一个时期全党工作任务的全面部署。

由于革命胜利引起社会经济改组，一些主要城市出现私营工厂、商店停工歇业，工人、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失业增多等现象，农民为支持解放战争后期作战和生产恢复所承受的负担还很重，工商资产阶级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惶惶不可终日。针对这个情况，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作了题为《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他指出：我们当前



★ 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作《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

的总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面对这样复杂的斗争，必须处理好同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不要四面出击，树敌太多，造成全国紧张。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才能彻底孤立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残余。针对几个月来党内在处理阶级关系方面出现的过激偏向，毛泽东批评了“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想，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不要把他们推开。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仍然是又团结又斗争，以团结为主，是节制资本而不是挤走资本、消灭资本。总之，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

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不仅体现了党历来“打击主要敌人，争取最大多数同盟者”的策略，更反映了党在执政之初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即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不可避免地给社会带来冲击和阵痛，因此，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要举措，不可进行太猛，步伐过快，宁可慎重缓进，以便稳步地达到既定目的。七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这次会议反映了党刚刚执掌全国政权时对慎重处理社会转变时期的社会矛盾保持了高度的清醒。全会决定的方针，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的工作规定了明确的行动纲领。

二、抗美援朝战争、土地制度改革和其他民主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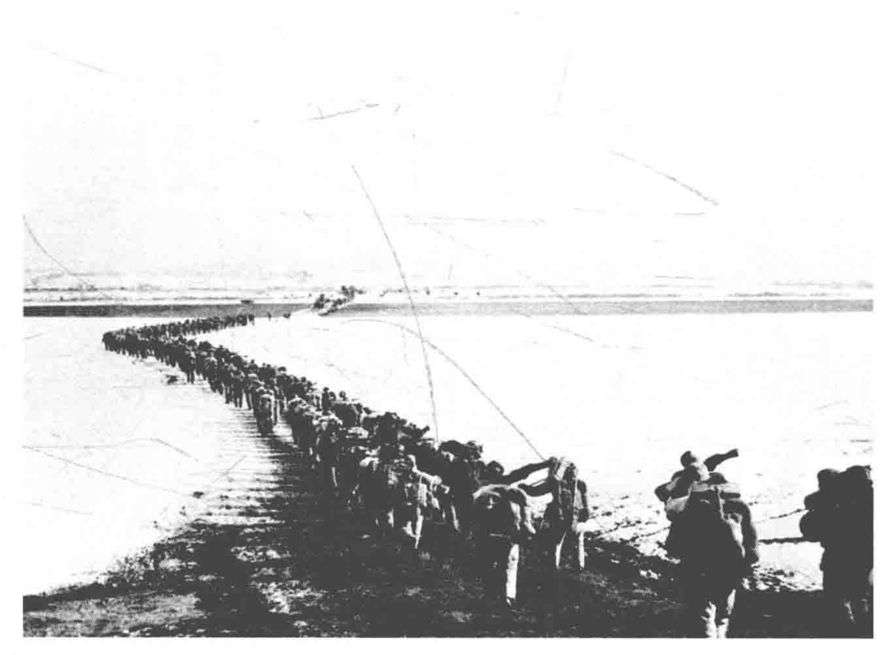
正当全国人民集中力量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时候，新中国受到外国侵略的严重威胁。1950年6月25日，中国近邻的朝鲜半岛爆发大规模战争。美国立即进行武装干涉，同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

入台湾海峡，“阻止对台湾地区的任何进攻”，公然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美国还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决议，组成以美国军队为主，英、法等15个国家有少量部队参加的“联合国军”，扩大侵朝战争。美军无视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悍然越过南北分界的北纬38度线（通称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直接威胁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在战况陡转危急的情势下，朝鲜劳动党和政府两次请求中国出兵支援。

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

敢不敢迎战世界上经济实力最雄厚、军事力量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这对于仅成立一年、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当时，我国经济的恢复刚刚开始，财政状况甚为困难，新区农村的土地改革尚未进行，人民政权还没有完全巩固。更严峻的是，中美两国的国力相差悬殊。1950年，美国的钢产量是8785万吨，工农业总产值2800亿美元。而中国的粗钢产量只有61万吨，工农业总产值仅为100亿美元。美国还拥有原子弹和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具有最强的军工生产能力。在这样的敌我力量对比下，如果出兵参战，能不能打赢？会不会“引火烧身”“惹祸上门”，使经济建设难以进行？军情紧迫，压力巨大，决策异常艰难。

10月的上半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主持下进行多次、反复的讨论，最后“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毛泽东说：“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事实上，朝鲜战争爆发后，台湾被美国控制，如果整个朝鲜也被它占领，中国就会处于美国势力南北夹击的态势下，而它随时可以找到借口对中国进犯，中国的国家安全



★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

从根本上就失去了保障。经过反复权衡利弊，中央政治局一致得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1]的结论，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组建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10月18日晚，毛泽东向中国人民志愿军下达入朝作战命令。19日黄昏，志愿军隐蔽地渡过鸭绿江。25日，志愿军同长驱直入的“联合国军”遭遇，给敌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初战告捷。11月，“联合国军”发起所谓“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总攻势，志愿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包围歼灭和重创大量敌军，再战告捷。12月，中朝军队收复平壤，继而收复三八线以北绝大部分地区，扭转了战局。在路河冰冻，衣被单薄，粮弹缺乏，吃一把炒面就一把雪的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志愿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同高度现代化装备的美军英勇作战，又进行

① 毛泽东：《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当和必须入朝参战》（1950年10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104页。



★ 彭德怀在朝鲜战场。

了互有攻守进退的3次大的战役。到1951年6月，5次战役共歼敌23万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根据形势的变化，毛泽东提出“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1]的总方针。美国在遭受损失及其盟国的压力下，被迫同意进行谈判。朝鲜停战谈判从1951年7月开始，谈判地点先是设在开城，后移至板门店。自此，朝鲜战争进入边打边谈阶段。

伟大祖国和刚刚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中国人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坚强后盾。志愿军入朝后，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的宣传教育，极大地激发了各阶层人民的爱国热忱。全国各地掀起参加志愿军的热潮，成千上万的祖国优秀儿女斗志昂扬奔赴朝鲜战场，大批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医务人员和各种民工队志愿到前线担负战地勤务工作。与此同时，全国人民还积极开展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及爱国丰产等运动。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下，工人们提出“工厂即战场，机器即枪炮”的口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页。



★ 工人们在开展“抗美援朝劳动日”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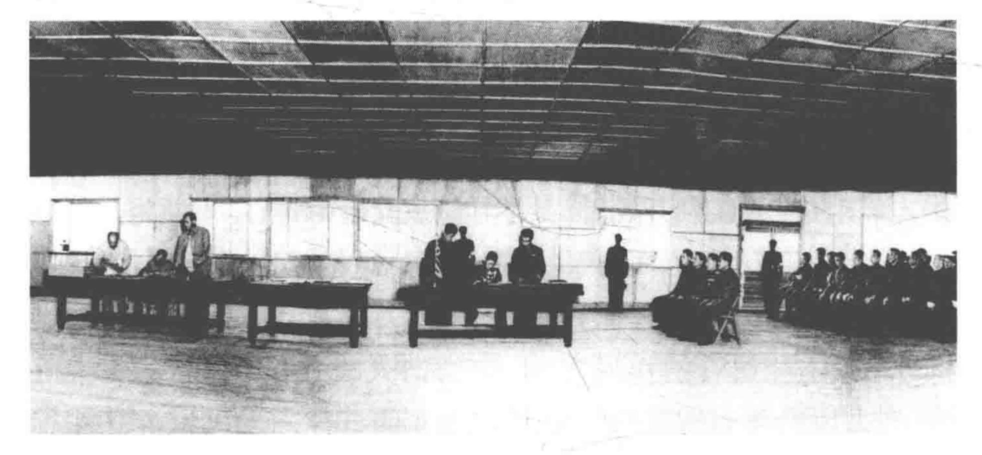
号，许多工厂夜以继日地为志愿军生产军需物品、武器弹药；广大农民踊跃交售“爱国粮”，全力保障前线的物资供给。为进一步加强国防，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号召，动员全国男女老少、各阶层人民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至1952年5月底，全国人民支援朝鲜前线的捐款可购买战斗机3710架，有力地支援了志愿军英勇作战，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强保障。抗美援朝运动以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教育人民，极大地鼓舞起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和劳动热情，成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动各项社会改革的巨大动力。

美国在停战谈判开始后，并不甘愿放弃侵朝野心，不断施加军事压力，企图迫使中朝方面屈服。中朝军队针锋相对，以打促谈，粉碎了敌人1951年的夏秋攻势，共歼灭敌军15.7万余人。同时采取阵地防御和运动反击相结合的作战方法，取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重大胜利，有力地配合了停战谈判。在持续两年的打打谈谈中，美军还实行疯狂轰炸我交通补给线的“绞杀战”。志愿军各部协同作战，顽强进行反轰炸、反“绞杀战”和反细菌战斗争。中国国内部队作为志愿军的

后备力量也轮番入朝作战。

在异常残酷的战争中，志愿军指战员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以及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创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成为国家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三年中，志愿军涌现出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等30多万英雄模范和功臣。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第一批入朝参战，英勇牺牲在朝鲜战场。中国人民志愿军被祖国人民称为“最可爱的人”，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汇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极大地鼓舞着全国人民为保卫和建设祖国而团结奋斗。

敌人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同样得不到。在遭到空前的严重失败后，美国不得不于1953年7月27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在他的回忆录中沮丧地写道：“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1]



★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订。

① 〔美〕马克·克拉克：《从多瑙河到鸭绿江》，哈普公司，伦敦1954年版（Mark W.Clark, From the Danube to the Yalu, George G.Harrap & Co.Ltd, London, 1954），第11页。

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共毙、伤、俘敌71万余人。战争以美国侵略者被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而告结束。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①]。这一胜利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包括美、苏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感到必须重新估计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分量。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通过这场战争，人民军队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向国防现代化方向迈出了一大步。我国东北大工业基地的边防得到巩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帝国主义从此不敢轻易地欺侮和侵犯中国。

废除封建土地制度

从1950年冬到1952年底，党领导占全国人口一多半的新解放区进行了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

在新解放地区，先是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从斗争中建立农村基层政权和民兵组织，培养一批农民积极分子，为新区土地改革准备了条件。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土地改革法》总结党过去领导土地改革的经验，又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规定了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成为指导新区土地改革的基本法律依据。

《土地改革法》颁布后，政务院相继制定和公布实施与之相配套的法规、政策。关于农村阶级成分的划分，具体规定了以经济地位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等成分的标准，并明确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出身，依其家庭成分决定，其本人的阶级成分，依本人取得主要生活来源的方法决定"。对小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手工业资本家、

① 彭德怀：《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1953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27页。



★ 翻身农民热烈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手工业工人、小商小贩、开明士绅的划分以及地主成分的改变等，也分别作了规定。

新区土地改革运动，是在人民革命战争已经取得全国胜利，统一的人民政权已经建立的条件下进行的。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就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土地改革法》明确规定：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同时改变过去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的政策，规定保护富农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半地主式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征收其出租的土地。对地主，除没收土地外，限制没收其财产的范围。对小土地出租者，提高了保留其土地数量的标准。实行这些政策，为的是更好地保护中农，有利于分化地主阶级，减少土改运动的阻力，还有利于稳定民族资产阶级。归根到底，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在全国已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条件下，党强调土地改革必须有领

导、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一方面，新区土改仍然是一场阶级斗争，必须贯彻群众路线，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使广大农民充分发动起来，在打倒地主阶级的斗争中提高觉悟，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当家作主。另一方面，对群众运动又不能放任自流，必须把放手发动群众同用党的政策去武装群众、引导群众结合起来。为保证《土地改革法》的正确实施，从中央到地方都抽调大批干部组织土改工作队，其中吸收了相当一批新解放城市的青年和学生，经过集中培训，认真学习土改法令，掌握各项政策和工作方法，分期分批下到农村开展土地改革。在新区实行土地改革的3年中，每年的工作队员都在30万人以上。党还在城乡各界人民中进行宣传教育，组织大批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去参加或参观土地改革，形成城乡最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

为了把农民真正发动起来，土改工作队深入到贫雇农家中，启发他们倒苦水，挖穷根，算地主的剥削账和农民的翻身账，弄清到底"谁养活了谁"，使许多苦大仇深的农民觉悟起来，同地主面对面进行控诉和说理斗争。划分阶级以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使用状况为依据，严格掌握政策标准，要求既不漏划一个地主，又要防止错划，尤其防止把中农错划为富农。在没收土地财产和分配胜利果实中，防止农民对地主分子产生单纯报复情绪，防止分配中的绝对平均主义。在



★ 翻身农民在丈量土地。

确定地权后，及时把农民的政治热情引导到发展生产上去。

由于党的政策和土改法令的正确贯彻执行，涉及2.9亿农业人口的新区土地改革进行得井然有序。到1952年底，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在全国大陆基本完成。包括老解放区在内，全国有约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约7亿亩土地，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3000万吨以上粮食的地租。同时，广大农民还分得大量的其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计有耕畜296万头，农具3944万件，房屋3795万间，粮食100多亿斤。土地改革极大地激发了亿万农民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由于经济、政治状况和社会、历史条件有许多不同的特点，党决定采取更加慎重、更加和缓的政策和步骤，用较长时间陆续予以完成。

随着新区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各级政府从经济上对翻身农民给予扶持，实行一系列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的政策措施，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普遍添置耕畜及各种新式农具，改善和扩大生产经营，掀起群众性的生产热潮。从1950年到1952年，我国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的产量逐年增加，显示了土地改革对解放生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也推动了工农联盟的巩固和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

土地制度的改革大大促进了农村文化的发展。随着土改后农村经济的恢复，农民的文化需求日益增加。为了满足农民学习文化的迫切需要，各地农村普遍开展文化扫盲运动，利用冬季农闲时间，组织农民学习文化，学习政治，提高农民的素质。1950年全国农民上冬学的达2500万人以上，1951年上常年夜校的农民有1100余万人。新的科学知识开始传布，劳动光荣逐渐成为风气。同时，翻身农民的子弟开始大量进入学校，接受文化知识教育。1952年与1949年相比，农村在校小学生数增加111.8%，中学生增加186.2%。随着国家颁布新婚姻法、开展扫盲运动等民主改革法令的宣传和实施，农村中普遍进行了扫除封建迷信、改革陈规陋习等移风易俗活动，使闭塞守旧的乡村出现许多深

入民主改革的新风气、新气象，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新区土地改革中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在人均耕地面积少的地区允许征收富农的出租土地以满足贫雇农的要求，实际上有相当多的省区在土改中都动了富农的土地，《土地改革法》规定的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未能真正贯彻执行。经过土地改革，富农经济事实上已失去了存在的基础，随着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兴起，我国的富农阶层很快归于消亡。

土地改革的完成，消灭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从根本上铲除了中国封建制度的根基，带来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农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封建斗争的一个历史性胜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反封建任务的彻底完成。继续肃清封建的和小生产者的政治和思想影响，仍是此后相当长时期的历史任务。

镇压反革命运动

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全国还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新中国成立之初，留在大陆上的大批国民党特务、反动党团骨干等反革命分子，采取“长期埋伏，待机而动，重点破坏，进行暗害，武装袭扰”的策略同人民政府对抗。旧社会遗留的“一贯道”“九宫道”等反动会道门组织也大肆造谣惑众，扰乱社会秩序。朝鲜战争爆发后，反革命分子的气焰更为嚣张，认为美国已把战火烧到中国的大门，台湾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时机已到。他们加紧破坏厂矿铁路，焚烧粮库，刺探情报，印制伪钞，鼓动骚乱，妄图里应外合，颠覆人民政权。据统计，1950年各地有近四万名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惨遭反革命分子杀害。猖獗一时的反革命活动，给生产恢复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危害。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严厉制裁反革命分子，成为巩

固新生人民政权的紧迫任务。

为了保证土地改革和经济恢复的顺利进行，特别是为在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建立稳固的后方基地，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坚决纠正在前一段时间和一些地区曾经存在的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实行坚决镇压。从12月开始，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

镇压反革命运动打击的重点，是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及反动会道门头子。这几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是反动政权统治的基础，是民主革命的对象。在革命政权建立和巩固的阶段，镇压反革命运动属于民主改革范畴，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当时并称为“三大运动”。

镇压反革命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敌我矛盾还很突出的特定条件下进行的一场尖锐的对敌斗争，需要统一领导，统一行动。党中央、毛泽东确定镇反运动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即在党委领导下，实行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公安、司法机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并且吸收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参加。同时，要求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注意各个阶段的斗争策略，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毛泽东特别提出了“稳、准、狠”的镇反工作方针：“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1]

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为镇反斗争提供了法律武器和量刑标准。中共中央强调在处理反革命案件中要注重调查研究，重证据，反对逼供信，重点打击那些

---

① 毛泽东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电报，1951年1月17日。

对国家对人民犯有严重罪行的匪首、惯匪、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特务及反共地下军头目等反革命分子。结合《条例》的发布，各地在城乡广泛宣传镇反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召开控诉和公审反革命分子的大会等，使社会各界人士与闻其事，了解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及其造成的危害。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行动起来，检举揭发和协助政府追捕反革命分子，全国城乡布下天罗地网，使反革命分子无处藏身。一些过去直接杀害革命志士、爱国民主人士的国民党特务、反动军官等，尽管在解放后隐藏得很深，还是被群众检举揭发出来，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镇反运动普遍发动起来之后，由于一些地方领导控制不严和基层组织不纯，出现了工作粗糙草率、不按法律程序办事及错捕错杀等现象。中央及时采取措施，将捕人批准权由县级提高到地委专署一级，杀人批准权上收到省一级；要求各地必须严格掌握审批权限，凡介于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凡介于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否则就是犯错误。中央强调，对于有血债或者其他最严重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以及最严重损害国家利益者，必须坚决地判处死刑，并迅即执行。除此之外，对其余罪该处死者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①]的政策。这项慎重的社会政策，有利于获得众多社会人士的同情，分化反革命势力，以达到肃清反革命分子的目的。

到1951年5月，清查隐藏在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的工作基本告一段落，中央决定立即实行谨慎收缩的方针，集中力量处理积案。在处理中，强调要注意调查研究，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反对草率行事，反对逼供信，对罪行较轻、愿意悔改者采取宽大的方针。到1951年10月底，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完成了清查处理工作，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

① 《中共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1951年5月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30页。

基本结束。

由于解放初司法体制还处于草创阶段，审判程序还不够健全，镇反工作在一些地方出现过错捕、错杀等偏差，中央及时发现并作了纠正。总的来说，镇压反革命运动有力地扫除了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基本上肃清了曾经猖獗一时的特务、地下军及会道门等反动组织，社会秩序获得前所未有的安定，为巩固新生政权，为恢复生产、民主改革等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有力地支持、配合了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战争。

社会各方面的民主改革

以土地制度改革为中心，党还领导了包括社会改造在内的一系列民主改革。首先是国营工矿企业的民主改革。中国官僚资本企业的畸形发展，在不少产业、行业内形成一套由封建把头把持生产和管理的腐朽制度，许多工厂里的封建把头专事欺压工人，对工人实行超经济盘剥。在接收官僚资本企业之初，这些封建把头势力还来不及彻底清除，仍在施加其影响，压制工人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使工人当家作主的地位得不到充分体现。

随着国营厂矿中党、团、工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各地首先废除了使工人群众深恶痛绝的封建把头制、侮辱工人的搜身制等。1951年11月，结合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厂矿交通等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这些企业中开展民主改革的指示》，要求各地发动和依靠工人群众，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工厂、矿山和交通等企业部门，首先对国营工矿交通等企业内的残余反革命势力进行系统的清理，并对国营企业内所遗留的旧制度，进行或进一步完成必要的民主改革。

根据中央的指示，各地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从各方面抽调得力干部，对企业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训练职工中的积极分子，进行思

想动员，通过放手发动和依靠工人群众，揭露企业内的反革命分子以及肆意欺压盘剥工人的封建把头和劣迹昭彰的坏分子，使之受到应有的惩处。随后，通过思想教育，加强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消除以往的对立和隔阂。这样，就在工矿企业中逐步建立起民主的团结协作的新型关系。

在民主改革的基础上，各国营厂矿以生产为中心对劳动组织进行整顿，建立新的劳动制度和劳动组织，把一批在生产上有经验、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工人和职员提拔到生产和行政管理岗位上来，使企业的各级领导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各厂矿普遍建立起厂长领导下的工厂管理委员会，并通过工会委员会、职工代表会议联系工人、职员群众，发动和组织职工参加企业管理，初步建立适合生产需要的民主管理制度，调动了广大工人群众当家作主、搞好生产的积极性，使工业生产的恢复取得显著成绩。

改革封建婚姻制度，是党推进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造的又一个重要方面。旧中国的封建婚姻制度，是一种以夫权为中心、压迫妇女并剥夺男女婚姻自由的落后的婚姻制度。它对人性、人权的束缚和摧残，世代相袭，酿成无数人生悲剧，同时还牵涉到社会观念、伦理道德、宗法习俗等许多方面的问题，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根深蒂固。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婚姻制度改革及相连带的社会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很快着手改革旧的婚姻制度。

1950年5月1日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新中国制定的第一部法律。它明确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新婚姻法的颁布实行，是配合土地改革肃清封建残余和建立新的社会生活的一项重大改革。全国城乡通过报刊、广播、文艺、图片等多种形式进行了广泛宣传，使有关新型婚姻制度的法律规定，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做到基本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男女权利平等、婚姻自由等新的

道德观念逐步树立起来，“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等旧的婚姻观念正在改变。

由于受旧的婚姻制度影响很深，一些新解放地区，特别是边远地区，贯彻《婚姻法》很不够，包办婚姻和早婚现象仍严重存在，童养媳陋俗多原封未动，有些地方甚至仍有蓄婢纳妾的恶习，妇女被虐待或因婚姻问题自杀、被杀的现象依然存在。为此，1952年11月和1953年2月，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先后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开展一次贯彻《婚姻法》的大规模运动。党正确地指出：婚姻制度的改革，虽是一种反封建的民主改革，但它不同于农村中的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因为婚姻制度的改革是人民内部的思想斗争，从人们思想中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关于婚姻问题方面的封建意识，这就需要有长期的、细致的、耐心的工作，而不能采取粗暴急躁的态度与阶级斗争的方法。对一般干涉婚姻自由和有违反《婚姻法》行为的干部或群众，主要进行批评和教育，对极少数虐待虐杀妇女以及干涉婚姻自由造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公布实施后，北京郊区的一对新人举行婚礼。

严重恶果的犯罪分子，则须依法惩处。

在随后开展的宣传《婚姻法》及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群众性运动中，各级妇女联合会、青年团与民政、司法部门共同配合，同一些维护包办婚姻的顽固习惯势力，以及某些基层干部漠视妇女权利、迁就买卖婚姻的错误行为作斗争，在保障男女的婚姻自由，特别是保护广大劳动妇女的合法权益，包括通过离婚自由解除封建包办婚姻、建立新型婚姻家庭关系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婚姻制度的民主改革在新中国成立短短几年内取得明显成效。经过贯彻《婚姻法》运动，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封建婚姻制度已被摧毁，广大群众普遍树立起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思想，开始形成新的社会风气。占全国人口半数的广大妇女从封建婚姻制度的束缚下得到解放，参加各种生产和社会活动的热情高涨，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

在城市解放初期，大量的旧社会痼疾遗留下来，诸如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设庄赌博等，严重毒化社会环境和人们的身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迅速开展了扫除各种社会弊病的斗争。这项斗争的打击对象为妓院老鸨、毒贩及赌头等，大都属于封建恶霸势力，因而清除旧社会的遗毒与反恶霸斗争有着密切联系，同样带有民主改革的性质。

在旧中国，娼妓现象的存在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妓女经受着人间地狱的苦难。麇集于城市的妓院娼馆，不仅是进行淫乱活动的场所，而且是社会上偷盗抢劫、吸毒贩毒、拐卖人口、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的藏纳之地，致使道德沦丧，性病蔓延，祸害社会，殃及后代。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不容许罪恶的娼妓制度继续存在下去。

首都北京率先开始取缔卖淫嫖娼的斗争。1949年11月，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封闭妓院的决议。在公安局、民政局、妇联、卫生局等部门的协作下，仅12个小时就封闭了全市224家妓院，逮捕老鸨、领家400余人，并按罪行轻重依法惩处；收容妓女1200余名，专门成立妇女生



★ 接受教育改造的妓女在北京清河制呢厂学习生产技术。

产教养院进行教育改造并从事生产劳动。继北京之后，上海、天津、武汉、南京等大中城市都陆续取缔卖淫嫖娼，全国共查封妓院8400余所，惩治了一批作恶多端的妓院老鸨，使一大批被迫为娼的良家妇女脱离苦海。各地人民政府还帮助她们医治性病，学习文化和生产技能，使她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妇女，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取缔卖淫嫖娼的斗争，使党和人民政府一开始就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

旧中国长期受黑暗势力统治，致使鸦片烟毒在社会上肆虐泛滥，戕害人民生命，耗损民族精神。至解放之初，全国以制贩毒品为业的有数十万人，吸食鸦片烟毒者达千万之众。在烟毒危害最严重的云南省，种烟面积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20%—30%。众多的烟民不事生产，终日吞云吐雾，以至于倾家荡产、卖儿鬻女，沦为盗匪、娼妓，危害社会安定。鉴于烟毒蔓延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党和人民政府决定彻底根除烟患。

1950年2月，政务院发布通令，采取坚决措施收缴烟土毒品，禁绝鸦片种植；对制贩烟毒者严加查处，从严治罪。对于散存在民间之烟土毒品，限期交出，如逾期不交者，除查出没收外，并按其情节轻重分

别治罪。1951年2月6日，周恩来总理签发《政务院重申毒品禁令》，严格规定所有机关、部队、团体，均不得从国内外买卖毒品，违者受国家法令处分；旧存毒品，一律无偿上交当地财委转送中央财政部保管，不得隐藏不交，违者受国家纪律处分。这一禁令的公布和实施，有效地堵塞了机关团体、部队对毒品管理不严的漏洞。经过雷厉风行的禁毒斗争，到1951年3月，西南多数地区的烟田已基本铲除。据东北、华北、华东、西北四区的不完全统计，收缴毒品折合鸦片2447万两，不少毒贩和烟民开始改业和戒除。

1952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要求以大中城市、边防口岸以及过去烟毒盛行的地区为重点，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来一次集中的彻底的扫除。根据中央指示，各地周密计划，在1200多个禁毒重点地区发动群众，集中破案，共查出制造、贩卖、运送毒品的毒犯36.9万余人，逮捕8.2万余人，其中判刑、劳改、管制的5.1万余人，处决罪大恶极的毒犯880人，给猖獗的贩毒活动以摧毁性打击，充分显示了依靠群众开展禁毒运动的威力。

在基本断绝毒品来源之后，各地积极开展戒毒工作。由各级卫生机关配制戒毒药，宣传推广有效的戒毒药方，对贫苦瘾民免费或减价医治；烟毒较盛的城市，设有戒烟所，保证戒烟毒的药品供应。通过多方面的努力，帮助旧社会过来的吸毒者逐步戒除了毒瘾。与此同时，各级政府还动员人民群众开展禁赌斗争，对公开的赌博场所一律查封，对聚众赌博、屡教不改的赌头、赌徒严加惩治，对一般参与赌博者施行教育和劝导，使在旧社会十分盛行的赌博习气很快被扫除。

经过三年左右的努力，曾在旧中国屡禁不绝、在西方国家也被视为顽症的娼、赌、毒等社会痼疾，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基本被禁绝，取得了净化社会环境、建立新社会道德的显著成果。随着土地改革和社会各方面民主改革的完成，从广大农村到各地城市，从工厂、学校到社会各界，整个社会都发生着深刻变化，各阶层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和社会环境。

三、恢复国民经济和各项建设的展开

1950年初稳定物价、统一全国财经之后，过去因货币贬值导致抢购囤积货物的社会虚假购买力突然消失，随之出现市场需求不足、商品滞销、工厂关门、商店歇业、失业职工增加等现象。党中央及时部署合理调整城市工商业，并把它列为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重要条件之一。

调整工商业和扩大城乡交流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向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转变中，长期在通货膨胀、商业投机环境下生存的私营工商业，因不适应新的变化而发生困难。1950年5月中旬，全国各地工商业者都叫喊货卖不出去。武汉有资本家写了一副对联："挂红旗五心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反映了当时工商界的心理状态。由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对发展生产、扩大就业、增加国家税收和社会积累还有相当大的作用，中央强调：调整工商业的重点是调整公私关系，同时调整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

当时城市工商业面临的困难，主要是原材料严重短缺和商品普遍滞销。调整公私关系的一项重要措施，是扩大对私营工厂的加工订货和收购包销，这是国家对私营工业最有力的扶助。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大中城市原有很多私营工厂停工或开工不足，在接受国家加工订货任务和原料配给后，纷纷恢复和扩大生产，产量逐月递增，产品也由国家收购包销。商业方面，明确划分公私商业的经营范围，要

求国营商业主要集中力量扩大批发业务，零售业务除粮食、布匹、煤炭、食油、煤油、食盐六种重要物资外，其他商品让给私商经营。另外，调整价格政策，在商品批发与零售、产地与销地之间实行合理差价，使私营商业有利可图；调整贷款政策，降低存贷利率，增加对私营企业的贷款；调整税负，降低税率，改进征收办法等。这些调整措施，使私营工商业的经营情况大为好转。

在劳资关系上，各地根据中央的指示，普遍召开劳资协商会议，解决私营企业中的劳资纠纷问题；如协商不成，由政府仲裁。基本原则是劳资两利，既要保障工人的利益，又使资本家能获得合法利润，归根结底要有利于生产。各私营企业还集体订立劳资合同，明确劳资双方各自应尽的职责和义务，要求资方积极改进经营，裁减冗员，节省开支，降低成本；要求工人努力生产，不提过高的工薪福利要求，达到“劳资团结，渡过难关”。

为了调整生产与销售不平衡的关系，在中财委的组织领导下，召开了一系列有私营工商业者参加的工商、税务、贸易、油脂、火柴、橡胶、机械、纺织、造纸、印染等专业会议，公私代表一起协商，议定各



★ 天津恒源纺织厂召开第一届劳资协商会议。

行各业的产销计划，以销定产，合理分配生产任务，克服私营企业生产的盲目性，解决了一部分产销不平衡问题。

经过半年的调整，私营企业很快摆脱困境。据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重庆、西安、济南、郑州、沈阳10个城市统计，1950年下半年私营工商业开业户净增加快，各大城市面粉、大米、棉纱、棉布等主要商品的销售量激增，商家的“霓虹灯都亮了”，城乡市场出现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繁荣景象。市场的复苏和活跃，刺激了私营工业的生产大幅度增加。1951年更被私营工商业者称为发展的“黄金年”，全国私营工业总产值比1950年增长39%，私营商业销售总额增加38.7%。同时扩大了社会就业，增加了工商税收，使国家财政收支入不敷出的状况得到改善。从1951年起，基本上收支平衡，略有节余。通过调整，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走出困境得到发展，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某些行业受到限制，实际上对私营工商业进行了必要的经济改组。

城市经济的复苏，是和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分不开的。随着广大农民在土地改革中获得土地、耕畜等生产资料，我国农业生产普遍得到恢复。农村中有大宗农副土产品需要推销出去，仅猪鬃、桐油、茶叶、鸡蛋、药材等项，平均占农业收入的10%。这是我国农民增加收入的重要来源。但是，由于多年战争造成城乡阻隔的影响，大量土产品积压卖不出去，农民手里没有钱，购买力很低，工业品也推销不畅。党中央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把扩大城乡交流放在1951年财经工作的第一位，强调这是“关系全国人民经济生活的一件大事”，“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就是为人民服务，不解决实际问题谈为人民服务，则是空话一句”[①]。这表明，切实解决民生问题，一开始就提到党和人民政府工作的很高位置。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党中央确定“边打、边稳、边建”的财经工作方针，中心的一环是稳定国内市场。1950年冬，华北区五省二市组织

---

① 陈云：《一九五一年财经工作要点》（1951年4月4日），《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7、128页。

大规模的土产交流会，率先打开市场流通局面。至1951年春，共销售总值约合70亿斤粮食的土产品，立竿见影增加了农民的货币收入。中央及时总结和推广华北区的经验，要求各大区及省、地、县都举办土产交流会或产销会议，广泛吸收各地贸易部门、合作社、私商代表及手工业生产者参加。1951年至1952年，全国各种物资交流大会此起彼应，盛极一时。各地在价格、运输、信贷、税收等方面给予各种便利，鼓励私商下乡收购土产，推销日用百货。在国营商业的带动下，依靠合作社商业，团结私商共同努力，很快为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的土产品打开了销路，并为工业提供了重要原材料。

通过扩大农副土产品的收购，到1952年，广大农民共获得127.9亿元货币收入，比起1950年的87.4亿元有较大增长，切实提高了农村购买力。农民手里有了钱，首先用于增加生产投入。在各地举办的产销会上，新式步犁、喷雾器、小型抽水机等受到农民青睐。上海、天津生产的毛巾、胶鞋、绒衣、搪瓷盆、暖水瓶等生活日用品，成为抢手货。据苏南行政区18个县的典型村农民购买力的调查，生活资料的投入1951年比1950年增加23.82%，生产资料的投入则增加45.76%。农民生产热情高涨，直接推动了农业生产的进一步恢复。土产一动，百业俱兴。通过扩大收购土产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促进市场供需两旺，城乡经济活跃，人民生活改善，成为这个时期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一条成功经验。

扩大城乡交流不仅活跃了全国经济，还有利于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在美国操纵下有45个国家加紧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和战略物资禁运。我国政府针锋相对进行反禁运斗争，积极发展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努力开辟国际航运。同时，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进行转口贸易，各级外贸部门通过港澳爱国华商，将内地收购的大量外贸农产品经香港转销国外，又用宝贵的外汇从资本主义各国购回国内建设和抗美援朝所急需的物资，在西方禁运的壁垒上打开了缺口。随着国内市场的开辟和不断扩大，许多



★ 活跃的农产品市场。

外销的土产转为内销。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虽给我国经济恢复带来很大困难，但党和政府积极应对，通过挖掘生产潜力，扩大内部需求，很快改变半殖民地经济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性，加快了我国在经济上获得完全独立自主的进程。

由于全面贯彻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基本经济方针，不但使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顺利转变为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而且有效地促进了生产发展和经济繁荣。广大人民群众得到了物价稳定、生活改善的实惠，私营工商业也获利颇丰。武汉资本家把对联改为“挂红旗五心已定，扭秧歌稳步前进”，反映了工商界对党和政府政策措施的拥护。到1952年底，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获得根本好转。

民主建政和统一战线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

大会。新生政权的民主建设从接管城市开始便有序地展开。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各方面条件还不成熟，还不可能在短期内召开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各地在接管城市的过程中，创造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一过渡形式，即在新解放地区，先由军事管制委员会从社会各界聘请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士，或由群众团体推派代表，组成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军管初期政府领导机关征询意见、传达政策、联系群众的协议机关，听取和讨论政府的工作报告，提出批评和建议，起到了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纽带作用。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大都以恢复生产、稳定经济为议题，包括原料供应、产品销售、劳资关系、粮煤调配、市场物价等许多紧迫问题，经过各界代表集思广益，多方协调，交由有关部门逐一解决。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建政，对一些受过英美式教育和西方民主政治影响的人们，是一种别开生面的教育。清华大学教授费孝通参加了北京市各界代表会议，看到许多一望而知不同的人物，有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穿长袍的，还有戴瓜皮帽的，都在听取市长的工作报告，一起讨论财政税收等问题。会议还对各界代表提交的提案，分别予以审议、安排处理。他感到参加这样的会议，就像上了几天生动的“民主课”[①]。

毛泽东对开好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十分重视，认为这“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②]。随着社会秩序基本安定，群众组织程度提高和经验的积累，1951年4月，政务院发出《关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政府必须按期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各级人民政府的一切重大工作，应向同级人民代表会议提出报告，并在代表会议上进行讨论与审查；一切重大问题应经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并作出决

① 费孝通：《我参加了北平各界代表会议》，《人民日报》1949年9月2日第4版。

② 毛泽东：《开好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一件大事》（1949年10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 1951年初，河南杞县七区云所乡的农民通过“投豆”选举代表。

定。到1951年10月，全国大多数省、市、县都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其中有17个省、69个市、186个县的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民主选举方式，选出政府负责工作人员。到1952年底，人民代表会议形成一项经常的制度，在全国普遍实行。通过这一组织形式，人民群众开始学习如何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各级人民政府也在民主建政实践中提高了行政效率和组织管理能力。

在政权的民主建设中，党要求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积极争取知识分子、工商界、宗教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反帝反封建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吸引他们参加土地改革等各项民主改革及从事适当的工作。

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①]，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6名副主席中有党外人士3名；56名政府委员中有党外人士27名；4名政务院副总理中有党外人士2名；15名政务委员中有党外人士9名；政务院所辖34个部、会、院、署、行中，担任正

①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

职的党外人士14名。

1951年3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必须配备适当数目的党外人士，并以此作为各地检查统一战线工作的尺度之一。在地方各级政府中，有相当数量的党外人士担任领导职务，其中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就有54名。党十分重视加强政权机关中党员干部与非党人士的合作，要求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要同党外人士沟通政策思想，并使他们有职有权，在职权范围内与闻一切应该与闻的事情，积极地帮助他们履行责任，做出成绩。在各级党政机关的高度重视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经受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斗争的考验，充分动员和团结社会各方面力量，为完成民主改革和经济恢复任务作出了贡献。



★ 1950年底，宋庆龄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视察东北地区，在黑龙江双城县向农民了解情况。

民族工作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党和人民政府为增强民族团结互助进行了大量工作。对于历史上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存在的纠纷，本着消除隔阂、加强团结的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和各种调解工



★ 1950年12月，中央西北访问团抵达青海。

作，使许多积怨甚深的民族纠纷，如冤家械斗、草山归属、边界争议、部落间矛盾等，陆续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组成中央访问团，吸收民主人士、大学教授参加，分赴西南、西北、中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访问，向少数民族群众宣传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了解他们的疾苦和要求，给他们带去大批急需的药品、医疗手术器械及生活用品。1950年国庆节前夕，周恩来总理特意邀请各少数民族代表，其中除有工人、农牧民、军烈属、教师、学生、文艺工作者外，还有活佛、王公、阿訇、堪布、土司、头人等共159人，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和参观访问，增强了他们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共同建设伟大祖国的信念。

在国家百废待举的困难条件下，各级人民政府还抽出必要的财力、物力帮助少数民族恢复和发展农牧业生产，努力开辟物资交流渠道，扩大农畜土特产品的贸易，初步改善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鉴于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与汉族地区有很大差别，党

确定在民族地区的一切工作，尤其是对于少数民族内部的改革，必须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严格禁止以命令主义方式在少数民族中去推行汉族地区所实行的各种政策；同时注意批判和纠正民族工作中的大汉族主义倾向，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出现了。”[①]1952年底至1953年上半年，在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政府的广大干部及人民群众中开展了一次民族政策大检查，取得了较好成效。

党中央、毛泽东高度重视训练少数民族干部，把它作为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的一项中心工作。根据中央制定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方案，1951年在北京建立了中央民族学院，在西北、西南、中南设立分院。各地除在工作中放手使用和大胆提拔少数民族干部外，还普遍开办民族干部训练班和民族干部学校，陆续培养了一大批各少数民族自己的工作骨干，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开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除旧布新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教育文化，是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发展、政治建设相适应的。为实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纲领，党领导对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社会文化事业有步骤地进行改革，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

首先是掌握舆论工具。在接管城市中，凡属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创办或直接控制的报纸、刊物、电台、通讯社，一律没收其全部财产归国家所有；私人举办的报刊、广播，经申请登记核准后可继续营业；凡外国人在中国办的报纸、通讯社等，明令分步骤停刊或取消。由此，把作为舆论宣传、大众传播重要工具的这部分文化事业，完全置于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之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全国的指导思想地位。

① 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1950年7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

对旧有学校教育事业，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对原国民党政府办的各类公立学校，一律实行接收，学校教职员除极为反动的个别分子听候处理外，均按原职原薪继续工作。对私立学校，一律维持原状，教学工作照常进行。这样，既维护了学校正常秩序和一大批知识分子的思想稳定，又照顾了教育事业必要的继承性，使原有教育事业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在此基础上发展人民教育事业。

在教育改革方面，各级学校取消反动的训导制度，废除国民党“党义”等课程。高等学校陆续开设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等新课程，使马列主义教育进入学校。针对旧社会劳动人民难有受教育机会的状况，党和政府确定了“教育必须为生产建设服务，为工农服务，学校向工农开门”的发展人民教育的方针。各地大力发展工农教育，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班）等，采取短期速成的方法，使一批工农干部、产业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达到中等文化程度，其中一部分接受高等教育，成长为新一代知识分子和各项



★ 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某部文化教员祁建华在向群众推广他创造的“速成识字法”。

建设事业的骨干。

为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1951年底到1953年，教育部参照苏联的经验，对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主要是将综合大学所属工科各院系合并为多科性工学院，新成立航空、钢铁、矿业、地质、石油、化工、林业等专门学院。经过院系调整，我国初步形成学科、专业设置较为齐全的高等院校体系，原来高等学校布局不合理的状况有所改变。调整后的高等院校大幅度扩大招生，适应了工业化建设对专业人才的急迫需要。1952年，国家决定实行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和毕业生统一分配，原有79所私立高等学校全部改为公办。

对社会文化事业，党确定了"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方针，大力倡导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有重点地发展人民的文学和戏剧、电影等各种文化事业。1951年3月，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为繁荣我国文艺事业指明了方向。通过对旧文艺取其精华、剔除糟粕的改革，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社会生活，投身于现实斗争，创作出一批以革命战争、社会改造为题材，启发人民政治觉悟，鼓励人民劳动热情的优秀文艺作品，如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歌曲《歌唱祖国》、话剧《龙须沟》、电影《钢铁战士》、小说《铜墙铁壁》等，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和欢迎。一些文艺作品还在国际上产生不小的影响，如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和歌剧文学剧本《白毛女》获得1951年度"斯大林奖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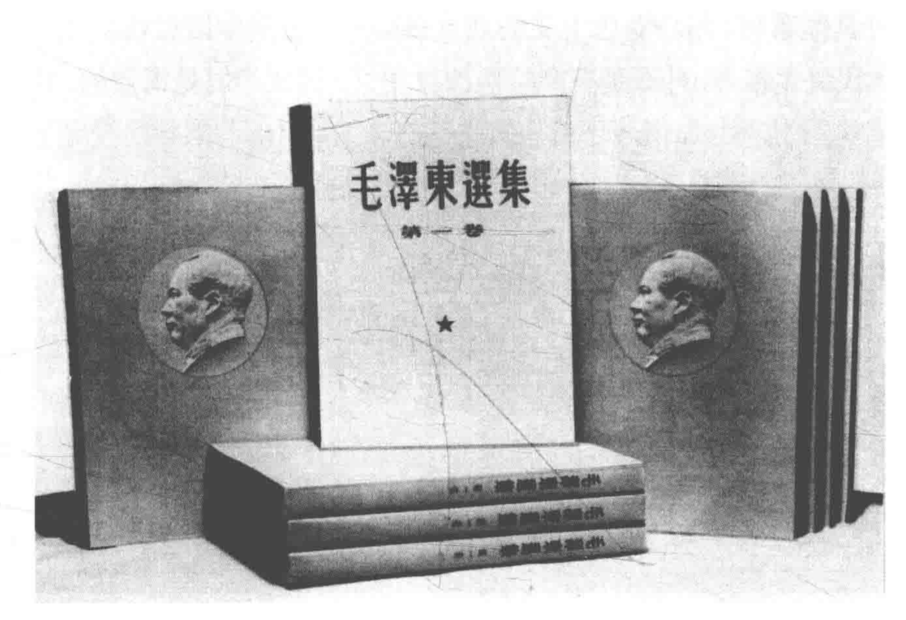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在建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在接收原"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及所属研究所的基础上，于1949年11月1日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中科院的主要任务是："有计划地利用近现代科学成就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组织并指导全国的科学研究，以提高中国的科学研究水平。"中科院成立后，集中了一批卓有成就的科学家，为他们从事科学研究提供了基础条件。同

时，在确定科学研究方向，培养并合理地分配科学人才，调整充实科学研究机构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中国科学事业由近代落伍逐步走向振兴打下了初步基础。1950年8月，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全国科普”）成立。

医疗卫生方面，针对我国人民在旧社会得不到健康保障，疾病丛生，缺医少药的状况，党和政府提出卫生工作要“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和“团结中西医”的方针。根据这些方针，广大农村、城市街区和工矿企业普遍建立起基层卫生组织，以及各种专业防疫机构和防疫队伍。同时，改变解放前中医受歧视的状况，努力消除中西医之间的隔阂，使中西医药卫生人员团结起来，共同为人民服务。全国还开展了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北京市大力治理城市环境，昔日臭水四溢的龙须沟被改造成美好家园的典型事例，广为人们称颂。在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下，全国城乡落后的卫生面貌大为改观。

旧中国的知识分子数量很少，在全国人口中仅占很小比例。新中国成立后，党十分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和改造工作，使他们绝大多数继续从事科学教育文化工作，发挥其所长。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是爱国的，其中一部分积极参加民主革命，大部分是同情革命、拥护人民政权的。他们大都有重新学习的愿望，以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

1951年9月，应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邀请，周恩来向京津两市高校教师学习会3000余名教师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他结合自己参加革命、思想转变的经历，勉励一切有民族思想、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努力站到人民的立场，再争取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周恩来的报告亲切感人，使到会的教师深受启发和教育，产生了广泛影响。10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



★ 1951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

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①]随即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推广到社会各界。同月，由中共中央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公开出版，社会各界兴起学习毛泽东著作、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热潮。大多数知识分子通过学习毛泽东著作，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肃清封建买办思想影响，批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经历了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过程。

在思想教育工作中，党要求结合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实际斗争，帮助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明辨是非、分清敌我，学会用科学的观点解释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及国际事务。这关系到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1951年在报刊上展开了一场对新上映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该影片讲述的是清末山东农民武训以“行乞兴学”受到封建统治者表彰的故事。讨论和批判这部电影，提出的不仅是如何评价武训这一个历史人物的问题，而且引申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道路。

---

① 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1951年10月23日、11月1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页。

通过具体事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帮助人们分清中国近代史上什么是人民民主革命，什么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这在当时是需要的。这次批判实际上成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部分。但由于把问题提到政治上尖锐的程度，以致批判中出现过于片面、武断的情况。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尽管有的做法比较粗糙，有的单位采取群众斗争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伤害了一部分愿意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的感情，但总的来说，这项工作适应了知识分子，也符合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知识分子贡献力量的要求，帮助大多数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清除思想上残存的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级的影响，掌握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由民族的、爱国的立场前进到人民的立场，更有效地为国家建设服务。

“三反”“五反”运动

正当全国人民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时候，各地陆续暴露出党政机关内部存在着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有的甚为惊人。根据东北、华北地区所反映的严重情况，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指出进城两年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决定开展“三反”斗争，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

1952年1月4日，中共中央下达限期发动“三反”斗争的指示，要求抓住典型重大案件的处理，推动运动发展。2月10日，河北省举行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公判大会。刘、张二人在任天津地委书记、天津行署专员期间，利用职权盗用公款，从事非法经营活动，生活腐化堕落，蜕变为大贪污犯。事情被揭露后，其上级领导因顾念他们在战争年代曾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向毛泽东呈请是否可以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泽东态度鲜明地说：“正因为他们两



★ 河北省人民法院组织的公审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现场。

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刘青山、张子善被执行死刑。公判大会震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它向全国人民表明，中国共产党绝不容忍利用执政党地位谋取私利的腐败现象，贪污腐败分子一经发现，不管资格多老、职务多高，一律严惩不贷，在人民中间树立起秉公执法、严惩腐败的形象。

“三反”运动的深入开展，暴露出党政军机关从事生产经营存在着严重问题。在过去战争年代，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民机关参加生产，对于打破敌人封锁，支援前线，保障供给，克服财经困难起过积极作用。但在建立全国政权以后，这种需要已逐渐减少，而机关生产（包括中央明令禁止的机关、部队、学校经营商业）使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受到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蚀，沉溺于追逐利润，贪图享受，以致发生严重的贪污、浪费现象。针对这一情况，中央人民政府于1952年3月12日发布《关于统一处理机关生产的决定》，要求妥善结束机关生产。这项

决定的实施，有效地抑制了机关生产、经商产生的以权谋利、侵蚀干部队伍等弊病。

1952年4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明确规定了有关贪污问题的处理方针、办法、步骤及批准权限，使有关处理工作进入法律程序。同年10月，“三反”运动结束。据统计，全国共查出被贪污的赃款赃物6亿元，有38402名贪污分子受到刑事处理[①]。这是共产党执政后惩治腐败的初战，清除了干部队伍里的蛀虫，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挽救了犯错误的人员。这对抵制旧社会的恶习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形成清正廉洁的党风政风和健康的社会风气，起了很大作用。

“三反”运动中发现，党政机关内部的贪污行为，往往是与不法商人在外部相勾结而来的。大量事实表明，有少数资本家不满足于守法经营的正当利润，而以各种非法手段牟取超额利润。中央决定在私营工商界开展一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1952年1月26日，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中城市，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私营工商业者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本家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

运动中揭露出的“五毒”行为，在资本家中不同程度地存在。更有不法资本家用废烂棉花制作急救包，用变质腐坏原料制造罐头食品等供应朝鲜前线，造成一些战士致病致残。这些情况激起社会公愤，“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成为全国上下强烈的呼声。在“五反”运动中，党和政府抽调大批干部进驻私营厂店，结合工人和店员积极分子，对重点户进行检查，发动群众进行说理斗争。对犯有一般违法行为的资本家摆明政策，申明利害，促使他们选择坦白立功的道

---

① 《安子文〈关于结束“三反”运动和处理遗留问题的报告〉》（1952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41—342页。

路。对劣迹昭著的奸商，则揭露其严重违法的事实，交由“五反”人民法庭处理。在发动群众性斗争之初，因政策界限一时不易把握，给经济社会生活带来某些冲击。中央及时指示各大城市必须“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生产、运输、金融、贸易均不能停顿”。运动后期，党和政府确定把私营工商户划为五类，其中，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户为绝大多数，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仅占极少数，分别采取不同的办法处理；对于资本家违法所得的补退工作，也规定了合理的从宽政策。同时，中央强调民族资产阶级仍有积极的一面，《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资产阶级应有的政治、经济地位没有改变。

“五反”运动于同年10月结束，有力地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在工商业者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教育，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制度和进行民主改革。针对“五反”以后私营工商业有许多厂店关门歇业或生产下降、营业困难等情况，政府及时进行了第二次工商业调整，使私营工商业在《共同纲领》轨道上继续有所发展。

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

从1949年10月到1952年底，经过全国人民三年多的艰苦奋斗，解放前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并有了初步发展。

农业的恢复是国民经济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三年来，国家用于农业的投入逐年增加，水利建设经费占全国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10%以上。国家集中力量修建的治理淮河、荆江分洪、黄河下游防洪工程等骨干项目，初步改变了旧中国江河堤岸年久失修、水患频繁的状况。各地还大力整修水渠塘堰，扩大农田灌溉面积。这些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粮食总产量从1949年的11318.4万吨，增加到1952年的16393.1万吨，增长44.8%，比历史上最高年产量的1936年增长9.3%。棉花总产量从1949年的44.5万吨，增加到1952年的130.4



★ 1952年国庆节，首都人民举行游行，庆祝国民经济恢复任务胜利完成。

万吨，增长193.7%，比历史上最高年产量的1936年增长53.6%[①]。

工业的恢复，重点放在国计民生急需的矿山、钢铁、动力、机器制造和主要化学工业，同时恢复和增加纺织及其他轻工业生产。在地区



★ 荆江分洪工程工地。

①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第145、146、168页。

的分布上，以恢复东北工业基地为主，同时兼顾内地的工业。按照中央的部署，东北各省率先恢复了工业生产，并开始初步的经济建设，所生产的机器设备和工业物资，支援了上海、天津等沿海工业的恢复。除重点恢复和改造原有企业以外，三年内国家还抽出一部分资金，有计划地新建了一批急需的工业企业，如阜新海州露天煤矿，鞍山钢铁公司无缝钢管厂和大型轧钢厂，山西重型机械厂，武汉、郑州、西安等纺织厂，哈尔滨亚麻厂等。这批新建厂后来成为我国工业的骨干企业。到1952年底，钢、生铁、原煤、原油、水泥、电力等主要工业产品都超过了历史最高年产量。棉纱、棉布、原盐、糖等轻工业产品的产量也超过历史最高水平[①]。

交通运输业也是经济恢复的重点。三年来，国家用于交通运输业的投资共17.7亿元，占全国基建投资总额的22.6%。铁路方面，基本恢复了原有的铁路网。穿越大西南腹地的成（成都）渝（重庆）铁路，于1950年6月动工，1952年6月完工。该铁路为清朝末年筹备修建的川汉铁路的一段，拖了近半个世纪未铺上一根钢轨，新中国



★ 1954年12月25日，贯通“世界屋脊”的康藏、青藏公路全线通车。

①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第249页。

成立后仅用两年就建成通车。在大西北恶劣条件下修筑的天（水）兰（州）线，也于同年9月竣工。全国公路通车里程由解放初的8.07万公里增加到12.67万公里。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工程部队在海拔近5000米的6座大雪山和悬崖深谷之间修筑康藏公路（今川藏公路），这是第一条通往“世界屋脊”的公路，堪称人间奇迹。

经过三年的努力，整个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6%，比解放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3%。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45.1%；农业总产值增长48.4%。按可比价格计算，1952年的国民收入比1949年增长69.8%。国家财政收入有了成倍增加，从1950年到1952年，财政总收入为361.07亿元，财政总支出为362.19亿元，收支平衡。财政支出的结构也有新的变化。从三年总的情况看，经济建设支出逐年增加，为125.7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34.3%，说明经济建设越来越成为财政支出的重点。文教支出有所增加，三年间支出达42.10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11.5%。城乡人民收入逐年增加，生活普遍改善。

1949—1952年社会总产值增长情况表

年份 项目	1949	1950	1951	1952
社会总产值（以1952年为100）	54.0	66.2	79.4	100.0
社会总产值（以上年为100）		122.6	120.1	125.9
社会总产值（亿元）	557	683	820	1015
其中：农业	326	384	420	461
工业	140	191	264	349
建筑业	4	13	24	57

（续表）

项目 \ 年份	1949	1950	1951	1952
运输业	19	19	24	35
商业	68	76	88	113

注：本表绝对数按当年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第20—21页。

从表中可以看出，社会总产值1952年比1949年增长85.2%，年均增长22.8%。按全国人口平均计算，1949年每人平均社会总产值101.17元，1950年、1951年、1952年分别为121.75元、143.16元、176.57元。1952年为1949年的174.53%。1949—1952年间年平均递增20.4%。

国民经济的恢复，使社会经济结构得到优化。在五种经济成分中，国营经济处于优先增长地位。国营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4.2%上升到1952年的52.8%。国营商业在全国社会商品批发总额中的比重，由1950年的23.2%上升到1952年60.5%。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商业与合作社商业的比重也由1950年的16.4%上升到1952年的42%[①]，控制了很大部分社会商品的流通过程。同期，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绝对值上也有较大增长，但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下降。三年来，工业生产力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得到加强，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现代工业的比重由17%上升到27.7%。这样，较好地完成了《共同纲领》所规定的“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的任务，为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走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三年来，党和政府坚持贯彻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从总体上把

① 董志凯主编：《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8页。

握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一中心任务，使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同时，抓紧进行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对近代中国留下的政治遗产、经济遗产、文化遗产进行了慎重、彻底的清理和改造，取得了祛除腐败政治、改组国民经济、安定社会秩序、形成全民族共识、增强社会凝聚力、保卫国家安全的巨大成功，树立了崭新国家的形象。进而保证整个国家经过新民主主义稳步地向社会主义迈进。

四、为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奋斗

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自创立时就确定的奋斗目标。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分两步走：先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然后才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由于中国经济十分落后的缘故，党在全国解放前夕设想，可能要到15年之后才能考虑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在短短3年内就根本扭转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留下的混乱局面，实现了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各方面都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绩。中共中央决定从1953年起执行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1952年我国面临的形势是，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基本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顺利实现，朝鲜停战谈判双方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协议，战争可望不久结束。形势的发展表明，国家具备了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条件。

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和积累了一些新的矛盾。在农村，主要是土改以后农民分散落后的个体经济难以满足城市和工业发展对粮食和农产品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而土改后农村中出现某种程度的贫富差距又引起党对两极分化的关注。在城市，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给经济生活带来很大影响。国家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需要把有限的资源、资金和技术力量集中使用到重点建设上来。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则要求扩大自由生产和自由贸易来发展自己。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矛盾和冲突。现实的发展，需要党采取新的方针来解决社会经济中的矛盾问题。这样，就把对国民经济实行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

推进革命转变的客观依据是什么呢？主要是三年来我国经济内部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国营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中的比重从原来的不足一半达到超过1/2，国营批发商业在全国批发商业营业总额中占据优势。通过整顿金融秩序，私营金融业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在各种经济成分中，社会主义经济已成为相对强大的因素，成为中国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物质基础。与此同时，私营工商业经过一系列调整，开始有相当一部分被纳入主要是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土改后在农村普遍开展的互助合作，初步显示了将个体农民组织起来增加农业生产的优越性。实践表明，三年以来，我国在一些方面（不是一切方面）已初步开始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党的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原来设想经过10年到15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再采取实际的步骤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时进一步看清，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实际上就是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比重中逐步增长的时期。根据认识的变化和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要求，1952年9月，毛泽东提出“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指导方针和大致设想。经过反复酝酿，1953年6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此进行讨论，毛泽东在会上首次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后

来正式表述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①]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中央政治局确认的这条总路线。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是党在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问题认识上的一个重要改变。本来，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就对"要在实际上保证中国向社会主义前途走去"的方针政策作过原则的规定。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党改变原来的设想，不是等待长期准备之后再采取实际的社会主义步骤，而是现在就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充分利用三年来所创造的经济、政治条件，实行以多种过渡形式改造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具体政策，积极而又循序渐进地完成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初步确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制度。这是党依据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政治条件的新变化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党的总路线、总任务及发展战略上的重大转变，是符合新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和规律的。

过渡时期总路线好比展翅高飞的大鸟，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它的主体，对个体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分别为两翼。因此，总路线的内容简称为"一化三改"或"一体两翼"。工业化是强国的必由之路，但在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建立起社会主义大工业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力量弱小，民族资本主要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工业资本只占1/5，而且私营工业主要是轻纺工业和食品工业，缺少重工业基础。这些工

---

① 《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02—603页。

业企业大多规模小，技术设备落后，不可能担当实现工业化的重任。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只能主要依靠办好原有的国营工业，并依据需要和可能改建、扩建这些工业，还要兴建新的、足以为国家工业化奠定基础的大型工业骨干企业。为此，国家有必要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的主体与两翼之间，改造个体经济与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间，是彼此联系、相互促进的，体现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变革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

在贯彻总路线的过程中，党探索并稳妥解决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途径问题。对个体农业，是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发展土地入股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逐步过渡到土地公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农业集体化。对个体手工业，也采取类似的方法，逐步实现手工业集体化。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党在恢复经济的实践中，创造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这些本来为帮助私营工商业克服生产困难而采取的措施，事实上引导私营企业在生产关系上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使其绝大部分成为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党从总结经验中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①]。

从国际环境来看，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新的战争危险不会在短时期内出现，为我国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党一向认为，工业化建设应当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要争取可能和必要的国际援助。由于受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苏联对我国提供的经济援助具有特殊的意义。不仅如此，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快速实现工业化的成功经验，它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在中国当时所处的历史阶段更具有现实的榜样作用。参照苏联的情

① 毛泽东：《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1953年9月7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

况，党中央估计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加上三年经济恢复，共18年。到那时，就可以基本上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经过广泛深入的学习、宣传和教育，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全党获得统一认识，也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成为团结和动员全国人民共同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新的纲领。

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

实现国家工业化，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理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实现国家独立和富强，使中国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由之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上来，积极投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基础薄弱，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占绝对优势，并且几乎全部是由传统的手工方式生产的。工业产值亦以手工生产为主，机器工业的产值始终低于手工业。在工业内部结构中，轻工业占很大比重，而以大机器生产为特征的机器制造、能源、原材料等重工业所占比重很小。工业技术水平低下，技术装备陈旧落后，如机械工业不能制造汽车、拖拉机、飞机等，许多小机械厂多半从事修理和装配业务。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下，人民生活和收入水平很低，据联合国地区组织的统计，194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仅为27美元，还不及同为人口大国的印度的57美元的一半。国内贸易的有效需求不足，特别是农村购买力薄弱，成为中国工业化的一个制约因素。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但是现代性工业产值在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占43.1%，而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只占35.5%。许多重要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不仅远远落后于

工业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印度这样的新兴独立国家。毛泽东早就讲过："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①]特别是经过抗美援朝战争同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较量，改变我国工业落后状况的要求显得尤为紧迫。

在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中国实现工业化只能主要依靠内部积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使我国有强大的重工业可以制造各种必要的工业装备，使现代工业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占绝对优势，能够完全领导整个国民经济，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我国工业的主要基础。这根本区别于西方国家靠压榨本国人民和掠夺海外殖民地完成原始积累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关于工业化战略的选择，英美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从发展轻工业开始，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才实现工业化。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打破帝国主义的包围，捍卫国家安全，在沙俄时代军事工业初步发展的基础上，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在短期内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战胜德国法西斯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这个成功经验对于后发展国家，尤其对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中国有着非常切近的示范作用。

考虑到我国几乎没有重工业，交通运输业极不发达；轻工业因能源、原材料的制约而一时开工不足，而且得不到新装备的补充和技术改造等实际国情，中共中央作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抉择。1952年1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中指出："工业化的速度首先决定于重工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以发展重工业为大规模建设的重点"；"首先保证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基本建设。特别是确保那些对国家起决定作用的，能迅速增强国家工业基础与国防力量的主要工程的完成"[②]。这个重大

①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99页。

决策，是同当时我国处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的现实国际环境分不开的。

为准备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我国从1951年就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起一面开始实施，一面继续讨论修改，到1954年9月形成草案。“一五”计划确定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突出了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初步基础的核心要点，同时要求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等。“一五”计划草案1955年3月经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讨论同意，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审议通过。大会一致认为：中共中央主持拟定的这个计划“是全国人民为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而奋斗的带有决定意义的纲领，是和平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计划”。

“一五”计划在编制和实施过程中，较好地处理了我国经济建设中的几个重大关系问题。一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不放松农业、轻工业，对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进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二是在经济发展的布局上，基本建设投资及投资金额在限额以上的工业建设单位，有一半左右安排在内地，以改变历史形成的我国工业大多集中在沿海地区的不合理状况。三是在经济建设的规模、效益和速度上，与国力相适应，确定工业、农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的指标既积极又稳妥。四是把发展生产同改善人民生活恰当地结合起来，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比较协调。五是既要争取外援，肯定苏联的援助对我国工业化的重要作用，同时强调自力更生，国家建设应以国内力量为主。1956年中央进一步提出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方针。这些对于后来国际关系发生剧烈变化时我国能够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具有深远的意义。

从1953年开始，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居于首要地位。

为保证对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组织领导，中央要求下最大决心从各方面抽调优秀干部充实工业战线，培养他们成为行家里手和领导骨干。据不完全统计，自1952年至1954年，全国抽调到工业部门的干部共有16万多名。中央和地方党的组织部门经过统一调整、重点配备、大胆提拔、加快培养等一系列努力，基本上满足了我国工业化建设初期对各方面干部的迫切需要。

在全国人民参加和支援工业化建设的热潮中，工人阶级一马当先。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号召：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劳动竞赛，保证全面完成国家生产计划。鞍钢技术革新能手王崇伦发明和改进了“万能工具胎”，一年完成了三年的劳动定额。大同煤矿工人马六孩和他的伙伴们创造了一套巷道快速掘进法，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青岛青年女工郝建秀的细纱工作法在纺织系统全面推广，各地棉纺厂不断刷新生产纪录。“每一秒钟都为创造社会主义社会而劳动”——这种充满时代精神的口号，反映了五年计划的宏伟目标正在化为千百万职工的实际行动，鼓舞着中国工人阶级忘我地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



★ 上海国棉一厂发出开展增产节约和劳动竞赛号召。

农民对工业建设是支持和拥护的。他们向往着工业发展后，能用拖拉机耕田，过上苏联集体农庄那样“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

各地农民努力增加生产，积极交售粮棉，供应各种农副产品，保证城市居民和工矿区职工的生活需要。随着基本建设的不断扩大，大批青壮农民被工矿、建筑企业吸收，加入工人阶级队伍，直接投身于国家工业建设。

火红的建设年代，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们同甘共苦，奋战在生产第一线。大批高等学校和各类专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服从国家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1952、1953两届理工科大学生全部提前一年毕业奔赴建设岗位。在团中央的号召组织下，广大青年团员通过组建青年突击队、青年志愿垦荒队、造林突击队等方式，积极投身党的中心工作。为探明我国矿产资源的状况，党和国家重视地质队伍的建设和人才培养，一批批地质工作者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为国家勘探地下宝藏。以李四光、华罗庚、赵忠尧等为代表的一批在海外卓有成就的科学家，放弃优裕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先后回到祖国参加建设。至1953年，约有2000名欧美留学生陆续回国，他们在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新的形势，新的任务，使学习知识、钻研技术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1953年经济建设开局很好，各地方、各部门都规划了许多新的建设项目。但由于缺乏经验，工农业增长的指标定得高了些，基本建设的盘子搞得大了些，导致市场供求紧张，生产和流通领域资金周转紧张。中央及时发现这些偏向，强调国民经济计划应符合实际，有可靠根据。8月，周恩来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结论中，总结上半年的经济建设工作，提出了“重点建设，稳步前进”的方针，即国家财力必须集中使用在建设的主要方面；必须有足够的后备力量，以保证完成有决定意义的基本建设。这一基本方针，对于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顺利进行“一五”计划建设，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工业建设战线喜报频传。1953年12月26日，鞍山钢铁公司的三大工程——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铁炉举行开工生产典礼。这是我国重工业建设中首批竣工投入生产的重要工程，大大加强



★ 鞍山钢铁公司外景。

了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钢铁基地，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中具有重要意义。包头、武汉的大型钢铁企业先后开始施工，为在内地建立大型钢铁基地开了头。大大小小的建设项目不胜枚举，单是限额以上的较大项目，平均起来每天有一个开工或者竣工。

新中国工业化的起步，原有的基础非常薄弱，农业生产落后，基本“靠天吃饭”，资金短缺，物资匮乏，技术人才不足等制约因素是多方面的，任务十分艰巨。但中国人民有志气、有信心，在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艰苦奋斗，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事业热气腾腾，取得扎扎实实的进展。

引导个体农业手工业走合作化道路

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三大改造中列为首位。提倡个体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党的一贯主张。在实

践上，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的农村，都普遍发展了劳动互助组织。随着土改后多数农民经济地位上升，农村开始出现中农化的趋势。中农既是小生产者，又是小私有者。其中有少数富裕中农上升为新富农。如何看待农村中出现的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党内存在意见分歧。针对现阶段要不要削弱以至动摇农民小私有基础的疑问，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①]，促使党内在引导农业互助组织走向较高级形式的问题上统一了认识。1951年9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肯定了农民对个体经济和劳动互助的“两种积极性”，要求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大量发展劳动互助组，在条件比较成熟的地区，有重点地发展土地入股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同时，不能忽视、更不能粗暴地挫伤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这个决议草案下发各地试行后，农村互助合作有了较大发展。

1952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成立了以邓子恢为部长的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指导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1953年春，全国初级农业合作社经整顿后有1.5万多个，参加农户27.5万户，比上年大大增加。运动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但也出现一些急躁现象。中央农村工作部强调互助合作关系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的根本问题，必须从小农经济的生产现状出发，绝不能一哄而起。由于贯彻了中央决议提出的“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局部地区的急躁偏向得到纠正。

同年10月，中央决定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这是因为大规模建设开始后，城镇和工矿区的发展急剧扩大了对商品粮食的需求量。而小农经济生产能力较弱，粮食供应不足，农村余粮户有待价惜售心理，私人粮商又控制了很大一部分粮食市场，造成国家粮食库存量急剧减少。党中央高度重视粮食紧张局势，中财委对可能采取的办法反复权衡比较，确认在粮食生产不能有很大提高的条件下推进工业化，只能

---

① 《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编：《〈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编写大纲》，《中国农业合作化史资料》1989年第1期。



★ 合作社农民向国家出售余粮。

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给，并严格管制私商的投机活动。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国粮食会议，确定在农村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对城市居民实行粮食计划供应；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由中央对粮食实行统一管理。11月，政务院下达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简称“统购统销”。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涉及城乡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央号召全体党员和各级干部带头执行并深入基层，把这项工作作为极端迫切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担当起来。由于党依靠土改以来同农民建立的密切联系，并在征购中考虑到农民的合理经济利益，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得到较好贯彻，初步缓解了粮食供求紧张的矛盾，在不高的水准上基本满足了工业化初期对粮食的需要。在粮食统购统销以后，接着又实行油料、棉花的统购和食油、棉布的统销，使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脱离自由市场，纳入国家计划管理的轨道。在我国工业化初创阶段，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还存在着较大的剪刀差，这实际上是为工业提供积累的一个重要来源，也是几亿农民为国家工业化作出

的重要贡献。

统购统销政策缓解了粮食紧张局面，但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增加粮食生产。当时认为小农经济增产潜力很小，而实行农业机械化又是长远目标，现实的办法主要是把个体农民组织起来，通过合作社的途径发展农业，增加生产。1953年12月，党中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强调，农业个体经济与社会主义工业化高涨的需要之间日益暴露出很大的矛盾。党在农村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须把个体经济积极性引到互助合作积极性的轨道上来，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兴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决议认为，以土地入股为特征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显示出优越性，可以成为引导农民过渡到土地公有的完全社会主义的高级社的适当形式。

贯彻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同时展开，很快在农村掀起大办合作社的热潮。1954年底，初级社从1953年的1.5万个增至48万个，参加各种互助组织的农户由1951年底的2100万户增加到7000万户，在全国农户总数中的比重由19.2%增加到60.3%。在合作社发展中，党强调互助合作搞得好不好，根本一条要看是否增产。当时的许多统计材料显示，合作社80%以上都增产增收，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到1955年春，初级社又发展到67万个。

在合作社大发展中，一些地方执行政策不稳，发展过快，引起农民的不满，农村出现杀猪宰牛、不热心积肥备耕等非正常情况。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于1955年1月至3月连续发出通知和紧急指示，分析造成农村关系紧张的原因，主要是中农群众对于党和政府在农村中的若干措施表示不满；强调农村工作的一切措施，都必须围绕发展生产这一环节，避免对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任何损害。为此，中央决定对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一次整顿。整顿的方针是：区别不同地区的情况，暂时停止发展，全力进行巩固；或者适当收缩；

或者在巩固中继续发展，概括为“停、缩、发”方针。

造成农民不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1954年受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水灾的影响，当年粮食未完成生产计划，而国家收购计划并未削减，结果全国多购了500万吨粮食。根据这一情况，中央决定削减1955至1956粮食年度的征购指标，切实执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使农民能预先知道当年生产多少，国家收购多少，自己留用多少，做到心中有数，由此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

经过认真整顿合作社和落实粮食“三定”措施，到1955年5月，农村形势基本稳定下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随之提高。这次整顿大约缩减2万个合作社，收缩与发展相抵，全国共保留65万个社。当年夏收，有80%以上的合作社增产，说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过两次较大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为我国的农业合作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我国工业基础薄弱，手工业历来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手工业的行业和品种很多，几乎包括人民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工业化建设初期，机器工业还远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发展手工业的重要性尤为突出。但手工业的生产方式是分散的，生产条件落后，作为小商品经济，抗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很弱。因此，党确定改造个体手工业的任务，就是逐步引导手工业劳动者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先从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开始，到组织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逐步过渡到高级形式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到1954年底，全国手工业合作组织达到4.17万多个，社（组）员121.35万人，当年产值11.7亿元，较1953年产值5.06亿元增长1.2倍。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组织在供销和生产两方面都很有生气，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也相应提高，体现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有计划地推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和农业、手

工业合作化同步进行的又一战略步骤。

工业方面，1953年以前，以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为主的初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已有较大发展。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特别是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之后，私营工业所需农产品原料受到国家政策的严格限制，不得不接受国家的委托加工、计划订货。加工订货主要是国家同资本家在企业外部的合作，劳资矛盾、公私矛盾以及由此引起的其他矛盾，难以获得有效的解决。“一五”计划实施后，要求进一步推进对私营工业的改造工作，以适应国家工业化建设发展的需要。

1954年1月，中央财经委员会提出《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开始转入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阶段。公私合营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其特点是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在企业内部的合作，公方占有相当股权，公私双方共同经营企业，公方代表居于领导地位，企业的利润实行“四马分肥”，即分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资方红利四个部分，资方红利大体只占1/4。这样，企业的利润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所有，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公私合营企业因而具有了更多的社会主义性质。

中国的私营工业，多数设备陈旧，经营落后，技术更新能力很低。国营工业因为接收官僚资本企业，机器设备相对先进，后来新建的企业多采用苏联的新设备，加上工人发挥主人翁精神，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私营企业。另外，由于在原料、市场等方面受到很大限制，不少私营企业渐感经营困难，主动要求公私合营，使得扩展公私合营的工作进展顺利，1954年公私合营企业由上年的1036户增加到1746户。企业实行合营后，国家派干部加强领导，投资进行新建、扩建，整顿经营管理，工人劳动积极性高涨，生产迅速提高。按可比产值计算，公私合营企业的产值1954年较1953年增长25.5%。合营工厂私股分得的红利，大都比私营时期的利润多，这促使更多的资本家要求实行公私合营。

扩展公私合营的工作，一般是选择规模较大的企业入手，而我国



★ 荣毅仁和上海部分工商业者座谈私营工商业的改造问题。

私营工厂500人以上的仅占8.9%；500人以下100人以上的占15.5%，其余大多数都是中小型企业。这些中小企业设备简陋，工序不全，处境更加困难，资本家纷纷要求公私合营。但是，国家为保证重点建设，不可能分散力量向这么多中小企业投入资金和委派干部，扩展公私合营工作遇到了新问题。1954年12月至1955年1月，国务院有关部门召开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决定采取“统筹兼顾、归口安排、按行业改造”的方针，由国营企业让出一部分原料和生产任务给私营企业，以解决公私之间的矛盾；在扩展方式上，除实行个别合营外，可按行业采取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的办法实行合营。这就加快了改造私营工业的步伐。到1955年底，公私合营企业增加到3193户，其产值占全国私营工业（包括公私合营在内）总产值的49.7%。工业方面扩展公私合营的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商业方面，首先是对私营大批发商的改造。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后，原来经营粮、棉、油等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私营批发商，全部由国营商业所取代，整个市场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市场对社会经济的调节作用受到限制，旧的自由市场的活动范围大大缩小，国营商业对

市场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得到加强。私营零售的主要部分，已不能像过去那样从私营批发商或生产者方面进货，而必须依靠从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方面进货，来维持它们的营业。

市场关系的变化和改组，为改造私营商业创造了前提，同时不可避免地使商业中的公私关系趋于紧张。许多大城市中的私营批发商得不到货源没有买卖可做。供销合作社对一般土产一时无法全部经营，私商又难于下乡，致使某些农副土产品的流通出现阻塞现象。针对这种情况，1954年7月，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要求对私营商业不能盲目排挤，不给生活出路，以免增加失业人口，造成社会混乱。根据中央的指示，各地对私营批发商采取代理、转业、吸收人员等各种方法进行安排。到1954年底，在批发方面，国营商业所占经营比重已达到88%以上。

随着私营批发商逐渐被国营商业所代替，中央明确了改造私营零售商业的主要形式是代销、经销，由国营商业掌握商品货源，执行国家规定的零售牌价，私商赚取代销费和批零差价。1955年4月，中共中央再次发出指示，要求使城市的私营零售商逐步过渡为国营商业的分销处、门市部；对农村的小商贩，则根据自愿的原则，使他们逐步过渡为供销合作社商业。到1955年秋，对私营商业及城乡小商贩的改造工作有了很大推进，私营商业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在32个大中城市降至25%，在农村集镇降为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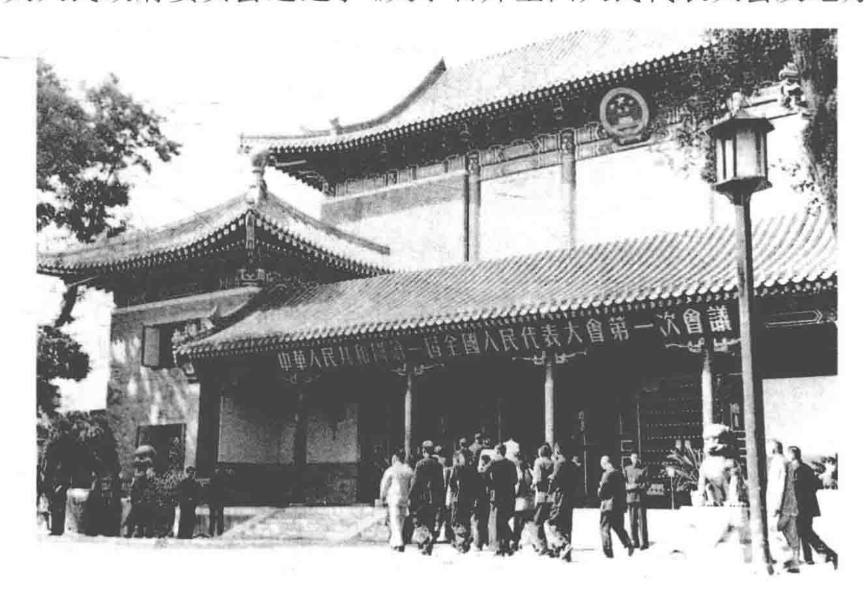
党在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中，紧紧抓住有利于生产和流通的中心环节，依据国家的需要、企业改造的条件、供产销平衡的可能、干部和资金的准备，以及资本家的自愿，积极稳步地前进。尤其根据生产形势和市场变化，着力统筹兼顾，统一安排。在把私营工商业逐步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同时，生产发展不受影响，市场保持稳定，有力保证了有计划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五、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和各项工作的推进

1953年12月，毛泽东带领宪法起草小组的几个成员来到杭州西子湖畔，用两个多月的时间集中研究国内外各类宪法，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初稿。这是为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准备的一项最重要工作。

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52年9月，此前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已经届满。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



★ 参加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代表步入会场。



★ 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致开幕词。



★ 刘少奇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同时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和以周恩来为主席的选举法起草委员会。这两个起草委员会由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及其他各方面人士组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经过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选民登记、基层选举、召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一系列紧张有序的筹备，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

这次大会的首要任务，是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会上，毛泽东致开幕词《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刘少奇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大会一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是中国人民100多年以来为新中国诞生而英勇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的历史经验的总结，肯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并且用法律的形式把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全国人民在

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下来。这是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一个重大的贡献。

宪法进一步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政治制度，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宪法明确了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向和途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①]宪法还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使中国人民的基本人权在新中国第一次获得了宪法的保障。

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它体现了两大原则，即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把中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政治制度用根本大法形式确定下来，并指明了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奋斗的正确道路。刘少奇在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国家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必须在遵守宪法和一切其他法律中起模范作用。

宪法确立了国家体制的格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大会依据宪法的规定，选举和决定了国家领导工作人员。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等13人为副委员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的确立。这是党带领中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50—451页。

制度保障。

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任务宣告结束。1954年1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举行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并通过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指出：人民政协作为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仍然需要存在。它的基本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通过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的团结，更广泛地团结全国人民，并向有关国家机关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就国内外重大事项和重要人事安排进行协商，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会议选举毛泽东为全国政协名誉主席，周恩来为主席，宋庆龄等16人为副主席。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解决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作用和任务的问题，解决了政协与人大、政府之间的关系和相互配合问题，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我国长期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



★ 1954年12月21日，毛泽东主持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开幕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以根本大法确立中国国内各民族间平等友爱互助的关系，保障各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中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据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除汉族外，少数民族共3532万多人，占全国人口的6.06%，但分布的地区约占全国总面积的60%。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境内各民族逐步汇合成为统一的中华民族，在经济上、文化上、政治上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中国各族人民过去共同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苦难。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国家在一些少数民族中进行种种阴谋活动，策动所谓“民族独立”，妄图分裂中国。从这种实际情况出发，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就确定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是联邦制，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以保证祖国统一和各民族团结，共同抵御帝国主义侵略，共同发展经济文化事业；同时保证各民族的平等地位，满足各少数民族自己当家作主的愿望。这是党根据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特点，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一项重大创造。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1952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全国初步建立起一批民族自治地方，组成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利，民族区域自治迈出法律化、制度化的重要一步。根据几年来的实践，1954年宪法将民族自治地方规范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县以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设民族乡。到1956年，全国共建立27个自治州、43个自治县。最早成立于1947年5月的内蒙古自治政府，在1949年12月改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告成立。拟议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筹备工作也在进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于1956年4月在拉萨成立，1965年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随着5个民族自治区和相关自治州、自治县的先后成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得以实现。这对于中国在任

何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始终保持国家完整统一、促进民族团结互助和民族发展进步，具有重大而长远的意义。

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治制度的确立，构成了我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体系，这为我国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相应的经济制度，从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根本政治保障。

国家法制建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即着手进行，先后制定了婚姻法、工会法、土地改革法等一批法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根本大法，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还制定了有关国家机关的一批重要法律，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以及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等。随后，还开始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起草工作以及民法起草的准备工作。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了一个新的开端。

宣传思想工作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

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重点就转向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来宣传和教育全国人民。

1954年5月，党召开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要求过渡时期党的宣传工作必须结合各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结合国内和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向全党和全国人民经常地、生动地、切合实际需要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宣传社会主义建设。中央强调，进行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不是空洞的，而要同实际问题和干部群众的思想密切地结合起来，对实际工作中的许多理论问题，对干部群众中的一些思想问题，要加以科学的说明和有针对性的解释。同时在党和国家工作的一切环节上加强思想工作，“必须在全部思想战线上和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严肃斗争”。

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也随之兴起。在

文化艺术方面，1954年1月，中共中央就加强和改进各级党委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作出批示，指出文化工作的首要任务是积极地发展适合群众需要的新的文学艺术和电影的创作，同时对民间原有各种艺术和文化娱乐形式应广泛地加以发掘、利用、改革和发展。各级党委宣传部和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抓紧对文艺创作的领导，引导作家按照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前进；克服在领导创作上的简单行政方式和粗暴态度。根据中央批示的精神，以及毛泽东为戏曲发展提出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文化部先后举办全国戏曲、话剧观摩演出，其中浙江昆苏剧团进京演出昆曲《十五贯》，出现"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盛况，使历史剧很好地起到现实的教育作用。新编京剧《将相和》、电影《上甘岭》、小说《铁道游击队》、话剧《战斗里成长》《万水千山》、音乐交响诗《嘎达梅林》等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相继问世。这些作品以崭新的内容和民族的形式开创了中国文艺的一个时代，受到人民群众广泛而热烈的欢迎，成为新中国文化建设出现高潮的重要标志，有些至今还是我国文艺发展的骄傲。

在教育方面，1953年1月，党和政府提出了"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明确了教育工作的重点是高等教育，中心是培养人才，特别是培养高、中级技术人才。经国务院批准，沿海地区一些高等学校的专业、系迁至内地组建新校，有的学校全部或部分迁至内地建校，以逐步地解决沿海和内地教育资源不平衡的问题。到1956年，全国高等学校发展到227所，成人教育、职工教育和工农群众的业余文化教育都有很大发展，为各条战线培养了一大批骨干。

科学工作在党的领导下也取得新的进展。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中国科学院成为国务院领导的国家最高学术机关，其组织形式也相应地改变。经国务院批准，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建立4个学部，即：数理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以便更好地团结全国科学家，领导并推进中国的科学事业。中科院第



★ 1955年6月7日，周恩来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致词。

一批聘任233位学部委员，国民政府时期“中央研究院”留在大陆的院士绝大多数受到聘任。中央要求，以中国科学院作为全国科学研究的中心，指导建立地方科研机构，同时发展高等学校和产业部门的科研机构，逐步形成比较完整的科研体系。到1955年底，全国科学技术人员已达40余万人，专业的科研机构超过800个。这支力量在国家各项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1953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到23‰。党中央慎重研究控制人口增长过快问题，于1955年3月1日在给卫生部党组的批示中明确指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①]。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作出的关于

① 《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7页。

提倡节育的第一个政策性文件，为我国制定人口政策和后来确定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在推进文化建设中，党还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了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1954年，毛泽东从支持两位青年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评文章开始，领导发动了一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广泛批判。这次批判提出的问题，不仅是如何评价和研究《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而是要从哲学、文学、史学、社会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对五四运动以后思想文化领域最有影响的胡适一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清理和批评。这项工作在新旧社会转变时期是必要的，对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有积极意义。但是，采用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容易流于简单和片面，实际上出现了把这些问题当作政治斗争并加以尖锐化的倾向。

当时在思想理论界还发生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胡风是长期参加左翼文化运动的进步的文艺理论家、诗人。对其文艺思想，进步文艺界历来就有不同意见和批评。到1955年，针对胡风提出的改进文艺领导工作的意见书，批判运动猛烈展开，并且迅速发展为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这种把文艺思想争论当作政治斗争来进行，特别是并没有经过核实证据就把胡风和同他有联系的一批文艺工作者（其中有共产党员和党外进步作家）当作“反革命集团”来斗争的做法，完全混淆了敌我、敌友的界限。这个历史教训值得深刻汲取。

军队和国防的现代化建设

建立巩固的现代化国防，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来保卫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的成果，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是党在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特别是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央军委系统地总结同高度现代化装备的美军作战的



★ 1955年11月，解放军在辽东地区首次举行规模浩大的陆、海、空军协同抗登陆作战演习，刘少奇和彭德怀在军事演习现场。

经验，推动人民解放军适应现代化战争的要求，逐步实行由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战略转变。

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实现诸军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是建设现代化国防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之一。遵照中央军委的指令，人民解放军进行大幅度精简整编，全军总员额从1950年的550万人减少到1955年的350万人，减少了军费开支，向国家各方面的建设输送了大批骨干力量。同时，借鉴苏军领导体制，对军队领导机关的组织编制进行了调整，在原有陆军的基础上先后组建了空军、海军、防空军、公安军等军种，以及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防化兵等各兵种的领导机关及其所属部队。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人民解放军初步发展成为一支军兵种较为齐全的军队。在此期间，还创办了军事学院和一批各军兵种的高等院校，以培养中高级指挥和政工人才；并成立军事科学院，加强对军事科学和现代战争的研究。这为建设现代化



★ 1951年秋，朱德在视察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时讲话。

的国防奠定了基础。

为适应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需要，1951年总参谋部制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队列条令、纪律条令草案，1953年中央军委正式颁布，在全军试行，统一了全军的制度，提高了全军的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1955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第一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及国防部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薪金、津贴暂行办法》，全军先后实行薪金制、军衔制和义务兵役制。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粟裕等1040名将领被分别授予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

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在新的历史阶段，军队建设的内容变了，但军队的性质并没有改变，人民解放军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1954年4月，中共中央、中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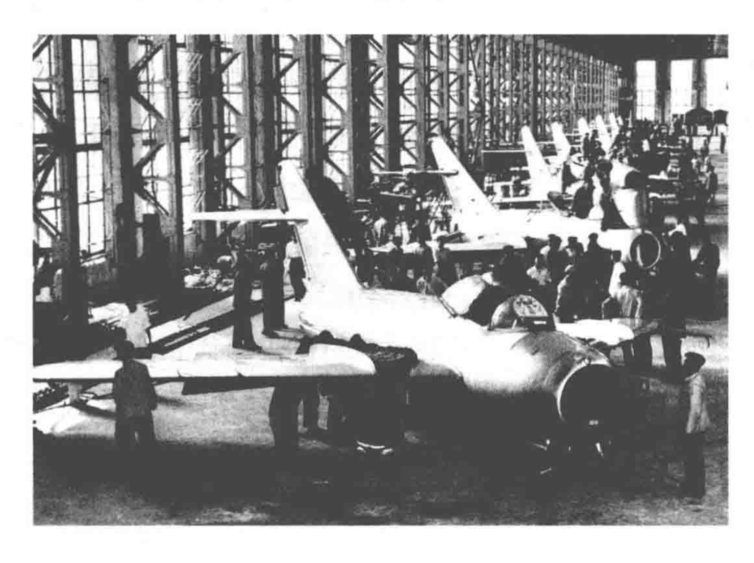
★ 1955年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元帅军衔及勋章典礼在中南海举行，毛泽东将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授予朱德元帅。

军委颁布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对军队政治工作的性质、任务、职责、组织形式、工作作风以及各方面的关系，作了明确规定。毛泽东在审批条例草案时，特别加写“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一语。这对于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和革命化建设，发挥人民解放军作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坚强柱石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1953年12月至1954年1月，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提出建设国防现代化的方针，即国防现代化必须与国家工业化的水平相适应，国防建设既不能停步不前，也不能急躁冒进。国家武装部队的总数应保持一个适当的数量，既要避免减弱我国的防御力量，又要避免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会议提出要用五到十年左右的时间逐步达到武器装备现代化、编制体制合理化、军事制度和军事训练正规化。这个宏伟的奋斗目标尽管受当时的条件限制没有完全实现，但对指导人民解放军加快现代

化、正规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加强国防工业建设，提高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1952年8月，主管国防工业的第二机械工业部成立，归口管理兵器、坦克、航空、电信工业，并对国防工业实行集中统一管理。1953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审定了国防工业“一五”建设计划的安排，批准新建的航空、无线电、兵器、造船等大型骨干工程共44项，改建扩建老厂的大中型工程共51项。这一批由苏联援助我国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大型军工企业，使我国常规武器的生产具备了一定规模，逐步在全军装备了统一制式的武器。1955年1月，中共中央、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把发展国防尖端技术提上国防现代化的议事日程，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定。同年7月，中共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中央原子能事业领导小组（简称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工作；1956年4月任命聂荣臻为主任组建领导导弹和航空事业发展的航空工业委员会。10月，中央决定成立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主管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工作。历史证明，重点突出尖端技术的发展，是一项很有远见、很有胆略的战略决策，对于中国国防科技事业发展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 1956年，国营第一一二厂仿制成功第一批喷气式战斗机。

1956年3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根据国际局势总的趋向缓和，但帝国主义企图发动侵略战争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的估计，提出了在国家军事工作中做好随时应付突然事变的一切准备的积极防御战略，即：在战争爆发之前，应该不断地加强我国的军事力量，继续扩大国际统一战线活动，从军事上和政治上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当帝国主义不顾一切后果向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人民解放军要能够立即给予有力还击，在预定设防地区阻止敌人的进攻，并适时地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最后彻底消灭全部进犯之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明确的国防战略方针。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是由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的，它的制定为人民解放军执行战备任务和进行军事训练指明了方向，使我国的军队正规化和国防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争取有利于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

1953年朝鲜停战以后，亚洲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但是，美国不仅不想从朝鲜半岛撤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且其海军舰队继续盘踞在台湾海峡，干涉中国内政，并企图从印度支那地区扼制中国。党中央要求在外交方面展开积极的活动和斗争，为国内建设创造更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

1954年4月，在苏联的推动下，由美、苏、英、法、中及有关国家外长参加的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召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重要会议。由于美国的阻挠，会议未能就政治解决朝鲜问题达成协议。5月，在中方协助下，越南人民抗击法国侵略的战争取得奠边府战役大捷，导致法国主战派内阁倒台。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抓住机遇，在英、法及苏、越等国代表团之间进行了卓越的外交斡旋，终于促使会议达成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法国从越南、老挝、柬埔寨撤军，并确认三国的民族独立地位。日内瓦会议的成功，使亚洲局势和



★ 1954年4月26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步入日内瓦会议会场。

国际局势进一步缓和，增强了我国南部边境的安全，为国内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周边环境。

为发展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尤其是邻近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1953年12月，我国政府在同印度就两国间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印度与中国西藏地方关系问题的谈判中，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印度方面的赞同。其表述几经斟酌，最后确定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应邀访问印度和缅甸，分别与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它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开展活动，突破美国的孤立和遏制政策，扩大对外交往的有



★ 1954年4月29日，中印双方在北京举行《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签字仪式。

力武器。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截然对立的时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相处中实行对等的约束和自我约束。它不仅包含了处理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原则，同时也包含了处理经济关系的内容。经过后来实践的检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也逐渐在国际社会中被普遍接受。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创举，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在亚洲、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形势下，1955年4月，亚非29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会议，讨论保卫世界和平、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等共同关心的问题。美国竭力破坏会议的召开，台湾特务机关竟以周恩来为目标策划政治谋杀，在中国代表团包乘的飞机上安置定时炸弹，制造了飞机中途爆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等8名中国代表团成员和3名外国记者不幸罹难。在此严峻形势下，周恩来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毅然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万隆会议。

会议开始时，围绕亚非新兴独立国家究竟如何处理与相互对峙的两大阵营的关系这个核心问题，与会各国间的一些矛盾和分歧暴



★ 1955年4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

露出来，出现对共产主义的攻击，也有一些国家对中国表示疑虑。针对紧张、复杂情况，中国代表团审时度势，从容应对，周恩来在发言中鲜明地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指出亚非各国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基础就是“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不同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存在，“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呼吁各国撇开分歧，为着反对殖民主义的共同利益而加强团结合作。周恩来的发言当场获得绝大多数国家代表的赞同，大会的紧张气氛顿时缓和下来。随后，中国代表团积极开展会外交往，与各国代表团举行广泛的谅解性会晤，推动《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吸收中国代表团的建议，形成了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体现和引申，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在亚非会议上，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用搁置分歧、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创造了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和平解决争端、团结谋求进步的范例，受到与会各国的高度赞扬，由此打开了中国与亚非国家广泛交往的大门。会议期间，周恩来还发表声明：中国政府愿

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个声明促使中美两国于1955年8月开始大使级会谈。虽然会谈历时两年多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却为以后中美关系的改善打下了初步基础。经中方一再争取，会谈在双方平民回国问题上达成协议，多年来受美方限制不能回国的著名航天火箭专家钱学森等得以返回祖国。周恩来评价说：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一件事来说，会谈也是有价值的。此外，经过中国政府多方面的努力，至1956年8月底，回国工作、学习的华侨达23万余人，其中包括大量高级知识分子。

几年来复杂的外交斗争和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展示了新中国外交的特有风采。中国在通过协商解决国际争端，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缓和等方面，日益显示重要作用，国际地位不断提高。通过扩大与世界许多国家的联系和交往，推进我国与许多亚非拉国家建交，为建设社会主义争取到了较为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

加强执政党建设和为增强党的团结而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党十分重视在执政条件下党组织自身的建设。从党的基本队伍来看，绝大多数党员在革命胜利的形势下，能够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积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使党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威信。但是，党的组织状况及干部思想作风方面也存在和出现不少问题。党中央特别关注党内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针对党内一部分人滋长的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严格地整顿全党的作风，首先是整顿干部作风。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对全党整风工作作了具体部署。1950年下半年开始，全党整风运动分批进行，于年底结束。各地在整风中，将由上而下地整顿领导，同由下而上地检查工作相结合，有针对性地克服上级机关的官

僚主义和中下级机关的命令主义，纠正干部、党员中的居功自傲情绪和“革命到头”思想，加强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为在广大新区进行土地改革做了组织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随着政治形势、财经状况的基本好转，1951年2月，中央发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提出以三年时间进行一次整党。中央指出：我们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这是主要方面，必须加以肯定，并向各级干部讲明白。但是存在着问题，必须加以整理，并对新区建党采取慎重态度，这方面也要讲明白。因为在中国革命胜利的新形势下，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员的条件必须更加提高，才能担负起比过去更伟大更艰苦的革命任务和经济文化建设任务。三四月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决定对全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在全体党员中进行一次关于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八项条件的教育，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途的教育。在此基础上，对每一个党员进行认真的审查和登记，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和不够党员条件的党员进行组织处理。整党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分期分批进行，1952年又结合“三反”运动进行，到1954年春基本结束。经过



★ 1951年4月9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作《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总结报告。

整党，有41万人被开除出党或被劝告退党。同时，各地积极而又谨慎地发展新党员，党员人数由整党前的580万发展到636.9余万，党的队伍进一步扩大，组织成分和党员素质有了明显改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得到加强，更加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提高了党的威信。

同革命战争年代相比，党在执政条件下自身建设中发生的问题，有些是与权力和地位交织在一起的。正当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时候，党内发生了高岗、饶漱石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破坏党的团结的严重事件。高岗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53年，党中央正在酝酿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考虑党和国家领导机构调整及领导人选问题。在个人野心膨胀的高岗看来，这是他获取党和国家的更大权力的机会。为此，他在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会议期间及会后，四处活动，散播流言，攻击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破坏党中央的威信。同年九十月间，饶漱石在党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也有针对刘少奇的非组织活动。

高岗的阴谋活动，其实质是利用党内某些本属正常的不同意见和看法，挑拨中央领导成员之间的关系，并故意将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错误夸大为系统的、严重的缺点或错误，以破坏党的团结，制造党内分裂。1953年12月，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初步揭露了高岗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1954年2月，党召开七届四中全会，针对高岗、饶漱石问题，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强调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要求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提高维护党的团结的自觉性，同一切破坏党的团结、损害中央的威信、妨碍中央的统一领导的言论和行动作坚决斗争。决议告诫全党：党的团结的重要保证之一是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必须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作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不适当地过分地强调个人的作用，反对骄傲情绪和个人崇拜；全党高级干部的重要政治活动和政治意见应该向

所属的党组织报告和反映，其中关系特别重大者，应直接向党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或中央主席报告和反映；如果避开党组织和党中央，进行和散布个人或小集团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意见，这在党内就是一种非法活动，就是违反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的活动，必须加以反对和禁止。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对高、饶二人采取教育挽救、等待他们醒悟的方针。但高岗拒绝党的教育和挽救，自杀身亡。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担任的一切职务。为了加强对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监督，这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的监察委员会，董必武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的监察委员会负责检查和处理党员违反党的章程、党的纪律、共产主义道德和国家法律、法令的案件等。原有的中央及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撤销。

总的来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党继续保持了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奋斗作风和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党对党员的教育和把腐败分子清除出党的队伍的工作抓得比较紧。党中央从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以来形成的坚强团结，在执掌全国政权的条件下继续保持下来。清除了制造党内分裂的分子，全党的团结进一步增强了。

六、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

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运动形成猛烈发展的群众性浪潮，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大大加快步伐。至1956年底，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起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经过1955年春季以来的整顿，我国农业合作社基本上保持健康发展的势头。但是，1954年夏秋，我国几大地区遭受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农业受灾严重，总产值仅比上年增长3.3%。供应工业的农产品原料不足，又导致1955年工业增长速度由上年的16.3%降至5.6%，反映了农业滞后对工业发展的严重制约。为了基本上解决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年年增长的需要同小农经济主要农作物产量一般很低之间的矛盾，同时考虑到社会主义必须占领农村阵地，抑制当时认为富农经济发展导致的“两极分化”趋向，从1955年夏季起，党中央、毛泽东要求加快农业合作化的步伐。

根据中央农村工作部报中央政治局批准的计划，1955年春至1956年春，全国农业合作社由现有的65万个发展到100万个。1955年6月，毛泽东从南方视察回京，认为需要增加1倍，即增加到130万个左右，基本上使全国20几万个乡，每乡都有1个至几个合作社，以作榜样。

7月31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对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历史、指导合作化运动的基本方针，作了正确的总结和系统的阐述，并提出在我国条件下必须先有农业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的重要观点。但是，报告着重批评了对发展速度有不同意见的邓子恢及其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认为他们在全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面前像“小脚女人”走路，是一种“右倾错误的指导方针”。会后，毛泽东的报告层层传达，一直到农村党支部，农业合作社迅猛发展。到10月，全国农业合作社总数接近130万个，基本实现了翻一番。10月，党召开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进一步形成高潮。1956年1月，入社农户由上年6月占总农户的14.2%猛增到80.3%，基本上实现了初级社化。同



★ 广东农民踊跃报名加入农业合作社。

年6月，毛泽东以国家主席的名义公布《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推动初级社向高级社转变。大批刚刚建立的初级社尚未进行土地入股、生产资料折价，甚至来不及进行生产安排，就卷入了并社升级的浪潮。到1956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87.8%。就是说，原来预计18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仅用7年时间，提前11年完成了。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大大加快。1955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会议，认为在新的形势下，现存的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关系必须向着社会主义更进一步转变，计划用两年时间分期分批完成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客观地说，从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全行业公私合营，是几年来党和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经济运行中计划性不断强化的必然结果。在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绝大多数农民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形势下，资本家从原料和市场两头受到严格控制，除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外，别无出路。而国家只有实行全行



★ 1956年1月15日，在首都各界群众20多万人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上，工商界代表向毛泽东呈送喜报。

业公私合营，才能从全局出发统筹安排生产计划，保证重点建设。这些因素使全行业公私合营成为大势所趋。各地的私营企业职工包括部分工商业者，纷纷敲锣打鼓，要求批准公私合营。1956年1月10日，北京市率先宣布私营工商业全部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截至1月27日，全国已有118个大中城市和193个县的私营工商业户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到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被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商业的轨道。

手工业合作化也大大加快了。各地改变过去按行业分期、分批、分片改造的办法，而采取手工业全业一起合作化的办法，到1956年底，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已占全体手工业人员的91.7%。

1955年夏季以后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由于用在党内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方法来加速实现农业合作化，在指导方针上出现急于求成和实际工作中的偏差。但是，从社会主义改造必须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的要求来看，农业合作化的完成，使农村土地由农民个体所有转变为合作社集体所有，解决了土地公有的问题，有利于对土地利用的合理规划，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广大农村普遍建立起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奠定了我国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制度基础，开启了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

从方向上看，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和加快建设工业化的客观需要的。在几亿人口的中国实现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样深刻的社会变革是在保证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情况下完成的，基本上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这是很难做到而确实做到了的事情。

生产关系的急剧变革往往会在一段时间内引起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而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出现过一部分群众生产积极性受影响的情况，但总的来说并没有破坏生产力，而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1956年与1955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增长6.4%；工业总产值增长28.2%。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技术改造逐年都有所发展，粮食产量逐年都有所增长。原有私营企业在接受改造的过程中，生产增长和效益提高也是明显的。这主要是党和政府在改造的不同阶段，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适时调整政策，对生产和流通许多环节实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结果。

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中，创造了一系列适合中国特点的由初级到高级逐步过渡的形式，使个体农民、手工业者和私营工商业者能够循序渐进地改变旧有的生产方式。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不由国家付出大批赎金，而是在相当一段时期让资本家继续从企业分得一部分红利和股息的办法，不仅有利于资本家接受改造，而

且能继续发挥私营工商业在扩大生产、搞活流通、维持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浪潮中，有些资本家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抱头痛哭，内心充满矛盾，这符合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但是，在社会主义大势所趋下，党并没有采取斗争地主的办法对待民族资本家，还继续支付定息[①]，给予工作安排，保留他们的代表人物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因此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是能够接受改造的。对这一点，曾被称为“纺织大王”的一位民族资本家，历述了他如何一直梦想兴办工业，救国图强，可是在旧社会受尽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压迫和勒索，解放初期由于政府贷款、委托加工和收购产品，才使企业摆脱窘迫局面，盈利逐年增加。他看到整个国家出现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气象，真诚地说：“五年计划开始了，全国兴建了许多大工厂，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一切实现得比梦想还要快，多么令人鼓舞！没有共产党，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那能有今天？”[②]这一席话，生动体现了党对民族资本家采取团结和改造政策的显著效果。党争取到大多数民族资本家对社会主义改造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从而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曾经设想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以新的实践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独创性经验。

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在过渡时期中，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到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主要是在1955年夏季以后，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从后来我国社会主义的实践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

---

① 资本家的定息，由国家根据合营时核定的私股资产按固定利率付给。1956年底，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经过清产核资，私股股额核定为24.1864亿元。从1956年1月1日起，国家按照年息5%（略高于银行利率）的固定利率，给114万户私股股东发放定息，每年定息金额为1.2亿余元。原定定息7年不变，1962年决定延长到10年。1966年9月定息取消。

② 新华通讯社主办：《新华社新闻稿》，1956年1月21日。

济已经占优势的情况下，可以适当保留一部分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使社会主义经济更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另外，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有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的。但是计划经济体制扩大到全部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又出现过于集中、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问题。上述问题的发生，从根本上说，源于当时历史条件下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苏联模式的影响，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就是“由目前复杂的经济结构的社会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社会”[①]；认为在整个社会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根本属性和特征。尽管在改造后期，党对私营工商业轻率并厂并店，手工业盲目集中生产、统一核算等问题有所觉察，也提出一些调整措施，但由于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措施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这样，对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方面进行调整和改革，成为摆在党的面前的重要任务。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确立的意义

1956年在中国大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农业、手工业个体所有制基本上转变成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公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基本上转变成为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公有制。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不再是原来企业的所有者，而是按照他们的能力被接受为企业的职员，国家对公私合营企业可以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进行管理。原私人企业的工人摆脱了雇佣劳动者的地位，成为企业的主人。加上几年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全面开展，国营经济有了巨大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中，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公有制经济已经占据主体地位。反映到国民收入的结构

① 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1954年9月15日），《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2页。

上，1956年同1952年相比，国营经济的比重由19.1%上升到32.2%，合作社经济由1.5%上升到53.4%，公私合营经济由0.7%上升到7.3%，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合计达92.9%。在工业总产值中，社会主义工业由56%上升到67.5%，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由26.9%上升到32.5%。在商品零售额中，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由42.6%上升到68.3%，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和由原来的小私商组织的合作化商业由0.2%上升到27.5%，私营商业由57.2%下降到4.2%。这标志着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初步建立起来。

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随着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建立起来的。1956年，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一五"计划建设也取得巨大成就。工业方面，钢、生铁、钢材、水泥、纯碱、客车、棉纱、棉布等几十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增长迅速。工业技术水平也有很大提高，建立了一系列旧中国根本没有的新工业部门，我国已经能够把自己制造的许多设备、材料用以发展工业，装备农业和交通运输业，加强国防工业。这些大规模的工业建设，绝大部分由国家投资和经营，属于社会主义的性质。农业方面，由于国家增加了投资和贷款，农业合作化过程中，主要农作物生产和农田水利建设，仍取得很大成绩。1956年，工业总产值（包括手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51.3%，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奠定了物质基础。

经济是整个社会的基础。伴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和发展，我国确立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以及党和国家工作的各个方面，都因适应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而得到加强和改善，进一步促进了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的经济建设的发展。

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发挥着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核心作用。工人阶级作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领导阶级，其领导地位得到加强，工农联盟以及工人阶级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在社会主义基础上进一步巩固。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同新中国的根本性质相联系的。这个制度能够在中国成为适宜的政

治制度，是因为它体现了国家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要求，便利人民群众经常通过这样的政治组织参加国家的管理，行使自己的权力，从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国人民正是用这样的根本政治制度来保证国家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同时，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基本政治制度的继续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基本政治制度的逐步完善，体现了几年来国家基本制度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

在思想文化和社会进步方面，马克思主义在全国的指导思想地位进一步加强。在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同时，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提倡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同时需要吸收外国的一切有益的文化成果，努力创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建设工作已初步开展。广大人民逐渐树立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意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等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新型的社会关系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道德规范正在形成。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些日益强大的政治因素不仅保障了我国顺利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且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担负起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历史任务。

总的来说，经过几年努力，一个新国家和新社会初步展现在人们面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符合我国国情，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集中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新建立的生产关系还需要不断进行调

整。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以当时的估计至少需要经过两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才能打下一个基础，特别是对农业的技术改造和实现农业机械化，还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也需要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进行调整和改革。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表明，建设社会主义将是一个需要党和人民长期努力的历史过程。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第七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的良好开端和曲折发展

本章提要

从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以党的八大召开为标志，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果。这期间，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培养了一大批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这是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在此期间，发生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严重失误。党觉察失误后，作了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经过全面调整，国民经济得到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

一、党的八大和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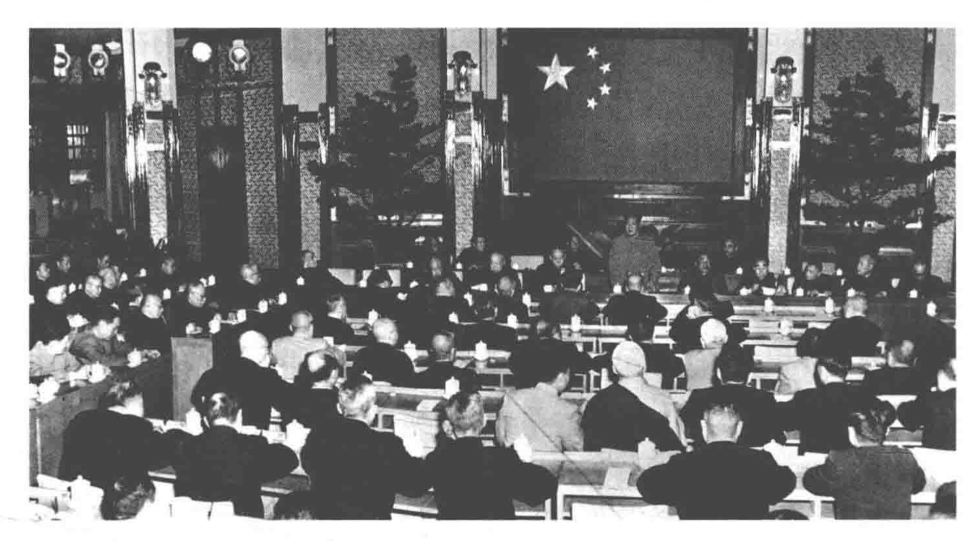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应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应当怎样巩固和发展？这是一个全新的历史性课题。全党和全国人民精神振奋，急切地想做出一番新的伟大事业，努力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远比在中国进行民主革命要艰难和复杂得多。在开始建设的时候，党号召过"学习苏联"。这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并且有收到积极效果的一面。然而，苏联经验并不都是成功的，苏联成功的经验并不都适合中国的情况。学习苏联终究不能代替对自己道路的寻求。这就犹如攀登一座人迹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荆斩棘、开辟道路。在新的使命面前，党难以事先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只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总结自己的经验，借鉴外国的经验，在实践中探索前行。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后，这种探索有了一个良好开端。

"十大关系"和一系列新方针的提出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面临的形势：在国内，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发展生产力这一方面来，新建立的生产关系还不完善，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开始暴露出问题，实际生活中

出现不少新的社会矛盾。国际上，1956年2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尖锐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造成的严重后果，但也存在严重的偏差，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极大震动和思想混乱。中国共产党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领导苏联党和人民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历史，同时认为，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对于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破除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迷信，解放被教条主义束缚的思想，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具有重要意义。1956年9月党的八大的召开，标志着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取得初步成果。《论十大关系》的提出，则是这一探索的开始。

为了准备召开党的八大和迎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1955年底至1956年春，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进行了大量周密而系统的调查研究。先是1955年12月至1956年3月，刘少奇为准备起草八大的政治报告，分别与中央和国务院37个部门的负责人座谈。接着，1956年2月14日至4月24日，毛泽东分别听取国务院35个部委关于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汇报，度过了紧张繁忙的43天。在毛泽东听取汇报期间，正值苏共召开二十大。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和错误，对于正在寻求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警示。4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他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有过不少成功的探索和实践，但也不是没有缺点，没有片面性，这说明我们还没有完全地系统地掌握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还要在今后长时期内探索符合客观规律的正确道路。开始我们模仿苏联，因为我们毫无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只好如此，但这也束缚了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



★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1]。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毛泽东经过充分细致的调查，逐渐形成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全局性长远性指导意义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经政治局同意后，又于5月2日向最高国务会议作了报告。

《论十大关系》提出的基本方针，就是“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毛泽东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报告论述的十个问题即十大关系，一方面是从对我国经济建设问题的总结中提出来的，另一方面是从对苏联经验的鉴戒中提出来的。毛泽东指出了苏联存在的弊端，如片面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在国家和农民的关系问题上把农民挖得很苦；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都没有；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等等。毛泽东认为，中国可以而且应当找出一条有别于苏联、符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4页。

路。他在报告中有一段著名的话："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1]这就明确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这一根本思想。

"十大关系"前五条主要讨论经济问题，从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来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第一至第三条讲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报告肯定过去我国在处理这些关系上没有犯大的错误，同时强调今后要更多地注意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尽量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从长远看，这样反而能够更好地发展重工业、内地工业和加强国防。这里涉及的实际上是开辟一条与苏联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第四、第五条讲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并开始涉及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报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依靠群众，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这就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若干新方针。

"十大关系"后五条主要讨论政治关系，涉及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都属于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的问题。报告提出，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必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既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在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明确宣布在进入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搞苏联那样的一党制，确认

①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要继续存在、发挥作用。必须加强党内的团结，在处理党内矛盾时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赞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反革命是消极因素，我们尽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中，要向外国学习，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但也要抵制和批判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这就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若干新方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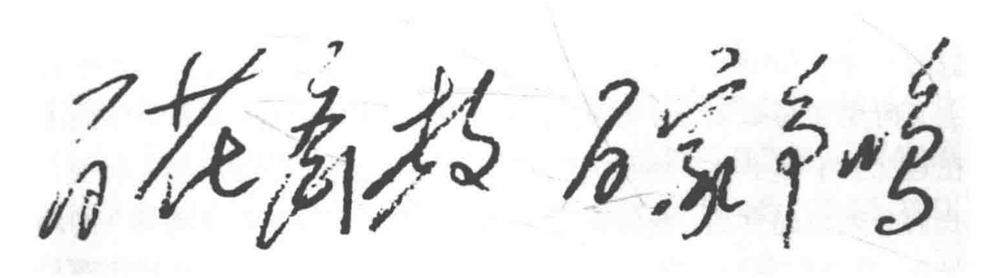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代表作。毛泽东在报告中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提出的基本方针，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社会政治稳定的需要，对当时和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作用。毛泽东回顾这段历史时多次说过：前几年经济建设主要学外国经验，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

在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报告前后，党还根据国内外的新形势和国家建设的新任务，在其他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世界范围内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而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仍处于初创阶段，科技人才在数量、质量上远不能满足国家建设的要求，对知识分子的使用也存在许多问题。党深切认识到发展科学技术和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紧迫性、重要性，果断作出了两项重大部署。一是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时间在1956年1月14日至20日。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报告，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宣布他们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估计和判断，奠定了社会主义时期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基础。周恩来还强调：世界科学技术在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大的进步，已经把我们远远地抛在后面，我们必须急起直追。他代表中央郑重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动员令。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进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技术落后的命，革愚蠢无知的命，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

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举国上下，无不振奋。二是集全国之力，历时数月，编制出追赶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组织领导下，数百位著名科学家投入到浩大的编制工程中。根据“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和“以任务为经、以科学为纬”的原则，规划纲要从13个方面提出了57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616个中心问题。对某些特别重要而在我国却很薄弱甚至空白的学科，如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自动化、远距离操纵技术等，还特别制订出1956年四项紧急措施。在中央宣传部指导下，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组织一批专家，编制了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我国科学技术事业从此进入一个有计划的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在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号召不久，党中央确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新中国成立初期，受苏联学术批评中粗暴作风和教条主义的影响，科学文化的某些领域存在着推崇一种学派、压制另一种学派，乱贴政治标签等现象。1956年4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讨论《论十大关系》时，提出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区分开来，为了发展文化和科学，要贯彻毛泽东过去分别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两个口号。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了这一点。他



★ 毛泽东题词手迹。

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5月2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知识界会议上，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代表党中央对“双百”方针进行了详尽阐述，引起了强烈反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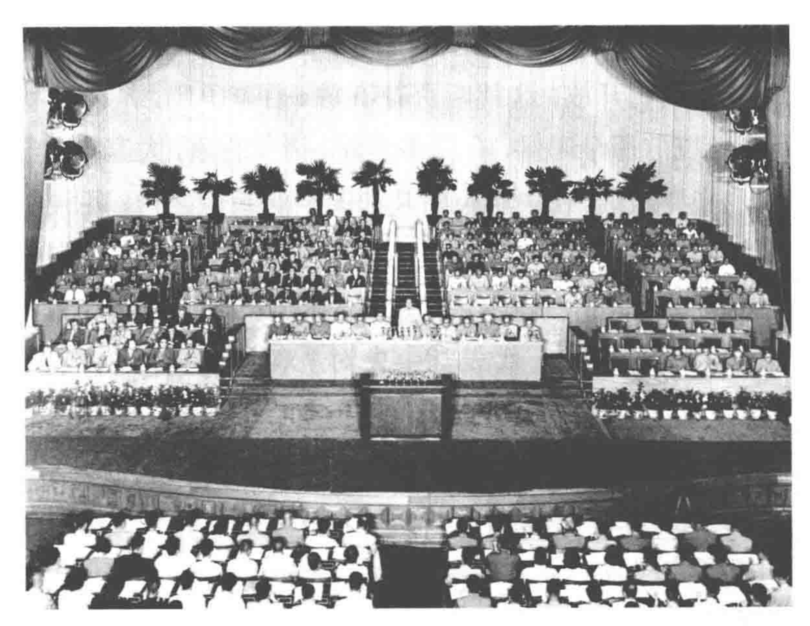
这年6月，党还提出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宣布“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倡议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为了民族和祖国的利益实现第三次合作。

《论十大关系》和一系列新方针的提出，展现了党为寻找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解放思想、多方探索的生动景象，为党的八大的召开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这是党在全国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显示了党的团结和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1026人，代表着全国1073万党员，党员人数比党的七大时增加了8倍。应邀列席大会的，有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还有苏联、南斯拉夫、法国等50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等的代表团。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受到了极大重视。

召开八大，是在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确定的。此后，党中央召开一系列会议，准备大会的各项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是起草八大政治报告。中央成立由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七人组成的政治报



★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

告起草委员会，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工作。政治报告以《论十大关系》为指导思想，突出经济建设的主题，集中了党在探索过程中提出的新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毛泽东在修改政治报告稿时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①]。八大政治报告凝聚了全党的经验与智慧，达到了当时可能达到的最高认识水平。

9月15日下午，毛泽东宣布党的八大开幕。他在开幕词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他强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他还说：已经得到解放的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

① 毛泽东：《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1956年8月、9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43页。

我们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工业化的国家。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全面建设高潮，全党“必须善于学习”。“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毛泽东充满激情的话语，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雄心壮志，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共鸣。

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代表们在闭幕会上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

党的八大正确分析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规定了党和全国人民在新形势下的主要任务。大会宣布：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些论述的着眼点，在于把我国生产力发展还很落后这一基本国情突出出来，强调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要集中力量去发展生产力。这个着眼点，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党的八大坚持了1956年5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1956年初，由于三大改造提前完成的压力，由于想利用国际缓和形势加快建设步伐，也由于缺乏经验和对客观规律重视不够，我国经济建设出现了忽视综合平衡、层层抬高计划指标的急躁冒进势头，导致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受到一定影响。党中央、国务院及时作了反冒进的努力，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初步遏制了冒进倾向。党在反冒进中形成的正

确决策被八大所确认。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四条重要意见：应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重点建设与全面安排相结合；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正确处理经济与财政的关系。大会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要求到1962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的计划增长75%左右，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一倍左右，农业总产值增长35%左右，钢产量达到1050万—1200万吨，粮产量达到25000万吨左右，国民收入增长50%左右。大会还提出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在我国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战略设想。这是党为全国人民描绘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宏伟蓝图。

党的八大还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大会《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一方面突出地提出反对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批评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思想作风；另一方面，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突出个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报告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组织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是党章中的根本问题，是需要在党内反复进行教育的。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一个党和它的党员，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八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每届任期五年，每年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1]。党章增加了“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一款。这是因为这年夏天毛泽东已向

---

① 这次代表大会会议是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但后来除1958年5月召开八大第二次会议以外，八大再没有举行过全国会议。

中央提出，他准备在适当的时候不当党的主席。他还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并且建议修改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连选只得连任一届。这些可以说是初步酝酿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准备实行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重要设想。

党的八大是一次解放思想、民主开放的大会。大会的进程、大会的主报告和代表们的发言，通过新闻媒体的迅速传播，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所了解。在9月17日的大会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向八大敬献了一件象牙雕刻的工艺品，表现的是长征途中红军胜利渡过大渡河的情形。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致词说：我们用这件礼品来象征我们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舟共济”，胜利地过渡到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会议期间，有100多人作了大会发言或书面发言。对这些发言，毛泽东在会前强调要有丰富的批评，要有分析，肯定成绩，批评错误。他说：“如果我们开一次会没有批评，净讲一套歌功颂德，那就没有生气，那无非只有一个‘好’字就行了，还要多讲干什么？”[1]在探索新风的推动下，大会充分发扬民主，思想非常活跃。代表们围绕即将展开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个重点，建言献策。陈云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即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国家市场三者为主体，而以个体经营、自由生产、自由市场三者作为补充。他的发言受到大会的重视，为大会决议所采纳。这是在理论上突破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

★ 董必武在八大发言的部分手稿。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6页。

重要尝试，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董必武着重谈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问题，建议尽快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劳动法、土地使用法等法律，逐步完备社会主义法制。他还说：党员应当成为遵守法纪的模范，违反国法就是违反党纪。“对于那些故意违反法律的人，不管他现在地位多高，过去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代表们在发言中提出的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思想和认识，体现了党的八大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所取得的探索成果。

党的八大选举出97名中央委员和73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第八届中央委员会。9月28日，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由上述6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讨论中央委员候选名单的预备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讲到，中央委员会的结构要反映党的历史发展，现在转到搞建设，搞经济，中央委员会将来应该有许多工程师、科学家和从工人中成长的干部。这是毛泽东根据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展开的新形势，对党中央领导集体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党的八大是一次成功的大会。它宣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并明确提出了党在今后的根本任务。大会制定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方针和新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时间很短，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尚未充分显现出来，党在理论上和思想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不够成熟，一些新的观念和方针还未能牢固确立并取得深刻的共识。但是，这次会议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毕竟站在了比较高的历史起点上，并取得了初步成果。历史证明，这些成果对于党的事业的发展有长远的重要意义。

党的八大后的进一步探索和“一五”计划的完成

以《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为标志，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

路的探索有了良好开端。怎样完善和发展已经形成的方针政策，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党的八大以后，为了解决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遗留问题，中央按照“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方针调整经济关系，取得初步进展，并且产生了一些搞活经济的新思路。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自由市场活跃，个体工商户明显增长，出现了人们称之为“地下工厂”的较大的手工业个体户和手工工场，还出现了“地下商店”。如何对待社会主义改造后出现的这类事物？1956年12月，毛泽东提出：地下工厂，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只要有市场、有原料，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夫妻店，可以雇工，可以开私营大厂。私人投资开厂，定息也有出路。华侨投资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把这称作“新经济政策”①。刘少奇也认为：各地地下工厂不少，有些资本主义或小生产者，有什么不好呢？这对人民有利，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周恩来提出，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这表明当时党努力建立自己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时，已经开始考虑：一定限度的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在国家领导下也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主体的补充。这是对党的八大确定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政策的新发展。

党的八大以后，党对农业集体经济的内部关系进行了调整。1957年9月，在邓子恢主持下，中央农村工作部先后代中央起草了三个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这些指示提出：调整社队规模，一般一村一社，作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生产队以20户左右为宜，10年内不予变动；社对队实行“包工、包产、包财务”，超产提成，减产扣分，深远山区也可以包产到组、到户；队对组实行按片按季包工到组，田

① 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1956年12月7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

间零活包工到户；大活集体干、小活分开干，取代“干活一窝蜂”等浪费劳动力的做法。这些都是朝向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创造性的尝试。从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四川、安徽、浙江、广东、河北等地农村出现了包产到户的生产经营方式。

党的八大以后，以简政放权为内容的改革逐步展开。根据党中央、国务院1957年提出的精简机构改革方案，国务院机关进行了较大幅度的精简，裁撤、合并了一批职能部门和办事机构。为了解决管理体制上暴露出来的中央集权过多的弊端，中央于1957年1月10日决定成立以陈云为组长，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为委员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在中央政治局之下，统一领导全国经济工作。7月，中央经济工作小组提出首先在工业、商业、财政三个方面划清管理权限，并制定初步方案。1957年九十月间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陈云主持起草的关于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文件，决定下放一部分中央直属企业给省、市、自治区管理，扩大地方财权和物资分配权，扩大地方计划管理权，商业价格分级管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得到了必要的合理调整。

党的八大以后，为编制1957年经济计划，党在一个阶段内提出了反冒进的主张。1956年初的冒进势头虽然受到初步遏制，但急于求成的思想没有真正解决，到年终结算，出现了1953年以来的第一个财政赤字年度。而在编制1957年经济计划时，各地区、各部门汇总起来的指标仍大大高于实际可能。围绕这个问题，党的高层领导产生了不同意见。毛泽东强调1956年财政开支和基本建设投资中不正确的部分不到“一个指头”，主张1957年的预算指标可以高一点。周恩来和不少领导同志则主张宁可放慢一些脚步，稳当一点。在这前后，陈云反复强调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像我们这样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为争取1957年经济稳定发展而进行的反冒进，集中在1956年11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提出1957年计划应实行“保

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毛泽东在11月15日的大会上讲话说：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尽管毛泽东对反冒进持不同看法，但仍服从多数人的意见，同意实行这个方针。由于党中央领导集体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实事求是、民主讨论的作风，全会制定了稳健的1957年经济计划，保证了这一年的经济工作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

到1957年底，我国全面完成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就。

五年间，全国实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88.47亿元。在施工的1万多个建设单位中，限额以上的有921个，全部建成投产的有428个，部分建成投产的有109个。许多建设项目在很长时期内都是我国现代化工业的骨干，其中有不少是旧中国没有或能力极薄弱的制造工业，如



★ 1956年7月，中国第一批国产汽车——“解放”牌载重汽车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试制成功。

飞机、汽车、发电设备、重型机器、新式机床、精密仪表，等等，初步改变了过去工业门类残缺不全的旧貌。一批煤矿、电站、油矿等能源基地和工业化原料基地的新建、扩建，大幅度提高了工业生产能力。所有这些，为我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

五年间，工农业有较大幅度增长，初步改变了我国工农业总产

值中以农业为主的局面。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124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52年增长67.8%。其中，农业总产值537亿元，增长24.8%，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56.9%下降到43.3%；工业总产值704亿元，增长128.6%，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43.1%上升到56.7%。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粗钢535万吨，增长296%；煤1.31亿吨，增长98.5%；发电量193亿千瓦小时，增长164%；粮食19504.5万吨，增长19%；棉花163.9万吨，增长26%；油料419.7万吨，增长0.07%。

五年间，各项事业获得较快发展。1957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2.67万公里，比1952年增加16.6%；公路里程25.46万公里，增加一倍；宝成铁路、鹰厦铁路、武汉长江大桥和康藏、青藏、新藏公路相继建成通



★ 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铁路桥长1315米，公路桥长1670米。

车。整个"一五"计划期间，全国高等学校毕业生达27万，超过1912年至1947年36年间21万毕业生总和的28.5%；1957年全国科研机构580多个，研究人员2.8万人，比1952年增长2倍多；城乡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状况有了显著改善。

五年间，全国物价基本稳定，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1957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达108元，比1952年提高24.5%，其中城

镇居民为222元，比1952年提高31.7%，农民为82元，提高16.8%。到1957年底，全国职工总数达3101万人，比1952年增长93.4%，城市失业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国有职工的年平均工资达637元，比1952年现价增长42.8%；1957年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比1952年增长3.1倍。



★ 1954年10月11日，周恩来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在苏联援建项目议定书上签字。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我国大规模现代经济建设的开端。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为中心的工业建设，使我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前进了一大步。“一五”计划时期是新中国经济效益最好的时期之一。就是与同期世界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相比，中国也不逊色。“一五”计划的完成，对中国工业化起步具有决定性作用，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一五”计划时期的巨大成就雄辩地证明，党的八大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完全正确的。

1953—1957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与主要国家比较

	中国	苏联	美国	英国	西德	法国	日本
年平均增长速度（%）							
1953—1957	18.0	11.6	3.6	3.8	10.1	7.9	15.0

（续表）

	中国	苏联	美国	英国	西德	法国	日本
比上年增长速度(%)							
1953	30.2	11.9	8.1	5.7	8.7	1.0	22.5
1954	16.3	13.2	−6.7	6.0	12.0	10.0	8.0
1955	5.6	12.4	12.9	5.1	15.1	9.1	8.1
1956	28.2	10.6	3.1	0.5	7.7	10.8	23.3
1957	11.4	10.0	0.0	1.8	5.8	9.0	16.1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7页。

二、全党整风和反右派斗争

1956年夏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大的波折，发生了波匈事件。国内也出现了一些群众闹事等未曾预料到的问题。面对这些复杂的新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深入思考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提出

苏共二十大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表示不满，弥漫着动荡不安的气氛。1956年6月，波兰波兹南地区由于工人的某些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引发流血冲突。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匈牙利布达佩斯等地发生20万人的示威游行，并演变成反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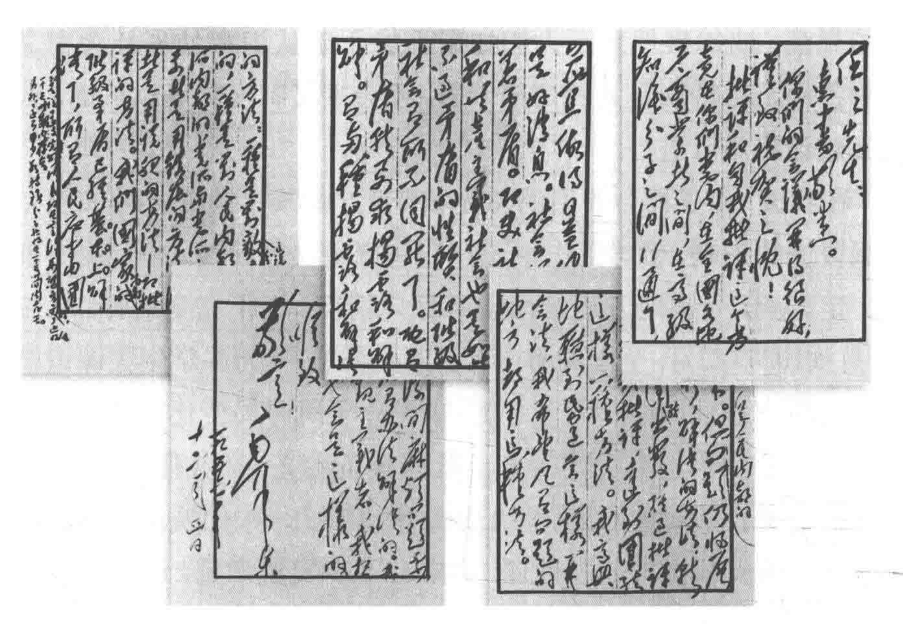
府的暴乱。波匈事件警示人们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社会主义制度将难以巩固，社会主义建设将难以进行。

在我国，由于社会改造的急促和变化的深刻，经济建设未能完全克服冒进的影响，领导工作中还存在官僚主义等问题，加上波匈事件的一定影响，一些地方连续出现不稳定情况。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全国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请愿。农村发生闹退社、闹缺粮的风潮。知识分子对时局变化最为敏感，在“双百”方针提出后，思想活跃，批评教条主义，在文化、教育、科学等问题上发表不同意见。有些人对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及干部作风上的问题提出公开批评，其中有不少尖锐意见，还有一些错误的政治言论。对这种新情况，党内许多干部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他们还想用老办法来对待新问题。“你不听话，就‘军法从事’。”这种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待人民，无助于矛盾的解决，只能使之激化。

如何吸取苏联和波匈事件的教训，积极面对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出现的新矛盾，成为全党特别是中央领导关心的重大课题。波匈事件后，在10月21日至11月9日的20天时间里，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十多次会议进行讨论，会议常常通宵达旦。其间，毛泽东明确提出：波匈事件应使我们更好地考虑中国的问题。根据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就成为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①]。紧接着，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在同年11月召开，波匈事件仍是主要议题之一。应邀赴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磋商后回国的刘少奇在通报中苏两党关于波匈问题商谈经过时说，波匈两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照搬苏联经验，过多地建设重工业，牺牲轻工业和农业，人民生活很苦；而国家领导人又学苏联一套，享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



★ 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在给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任之）的信中，对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形成了若干重要判断。

受特权，引起群众不满。由此，刘少奇提出了如何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避免“站在人民头上，脱离人民”的特殊阶层产生的问题[1]。毛泽东则运用矛盾学说来分析国内的群众闹事。他说：“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2]他把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这类矛盾产生的根源，归结为官僚主义，提出了必须警惕和防止干部特殊化和脱离人民群众的问题。

形势的发展和新矛盾的大量出现，要求并推动着理论的发展。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思考，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逐渐成熟。1957年2月27日，他在有1800多人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讲话稿经补充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编：《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644页。

②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5日。

修改后，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在6月19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毛泽东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过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

社会主义制度下存不存在矛盾，这是斯大林长期没有弄清和解决的问题。在领导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斯大林一直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去世前一年才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但也没有把它当作全局性的问题提出来，没有认识到正是这种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过程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在我国，也有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在面临种种社会矛盾时显得缩手缩脚，往往无所适从，处于被动地位，乃至作出错误的判断和处置。毛泽东不仅把长期被回避的这个问题鲜明地提了出来，而且把它上升到新的理论高度。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论断，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实际上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敌我矛盾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决不能用解决敌我矛

盾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

毛泽东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升到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高度，指出：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就是说，重点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要"向自然界开战"。围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主题，毛泽东还系统分析和阐明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政治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社会经济方面实行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利益，找出一条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在科学文化工作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与民主党派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汉族和少数民族方面一定要搞好关系，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同时应当克服地方民族主义；对知识分子应当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给予信任，善于团结，同时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重要的理论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卓越贡献。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第一个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大大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全党整风

根据党的八大精神和现实生活中党内外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央决定从整顿党的作风入手，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1956年11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郑重宣布在1957年开展全党整风。

为进一步传达、贯彻毛泽东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1957年3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有800多位党内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先后召开5个座谈会，了解宣传和科学文化工作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为思想文化领域贯彻“双百”方针鼓劲。他在3月12日的讲话中，进一步论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估计。毛泽东说：在500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还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要好好地团结他们。知识分子也要进行改造，同工农群众结合。毛泽东还明确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基本性的也是长期性的方针；领导我们的国家应该采取“放”的方针，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中进行传达和讨论，引起热烈的反响。1957年3月5日至20日，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召开，传达、贯彻、讨论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共有406名委员和列席人员在会上发言。他们表示，毛泽东的讲话对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日趋完善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将起决定作用。各民主党派也相继举行中央全会或工作会议，研究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各地党委则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在党内外广泛听取反映，征询意见。一时间，人们焕发出巨大的政治热情。《人民日报》驻上海记者报道：毛泽东的讲话在上海进行了普遍的传达和讨论，“它已形成了上海知识界思想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给初春的上海，更增添了蓬蓬勃勃的生气”。

传达和讨论毛泽东这两篇讲话的过程，也就是分析和认识人民内部矛盾、揭露和检查工作中问题的过程。从共产党方面来说，整风运动实际上已经开始。中央连续发出党内指示，党报相继发表社论，推

动这一进程。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分赴各地视察，沿途宣讲，要求党的干部充分认识到我国正处在从革命到建设的社会大变动时期，要充分理解党采取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在一系列的宣传动员下，党外人士和人民群众积极帮助共产党改进作风的热情日益高涨。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普遍、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指示》强调，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次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应该多采取个别谈心或开小型座谈会和小组会的方式，一般不要开批评大会或斗争大会。这次整风，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采取“开门”形式，既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欢迎党外人士对党和政府、党员干部中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毛泽东后来还指出：党希望通过整风，达到这样的目标：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


人民日報

全党重新进行一次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整风的主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①]。

5月1日，《人民日报》公布党中央的整风指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构、文化艺术单位的党组织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欢迎大家“鸣”“放”（这是在讨论和实行“双百”方针中形成的简化词语）。5月8日至6月3日，中央统战部召开13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座谈会。5月15日至6月8日，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25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广大干部群众包括许多有影响的党外人士积极响应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了大量的批评和建议。这些座谈会提出的绝大多数意见，虽然尖锐，但比较中肯，也富有建设性。比如，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胡子昂提出党群关系“敬而不亲，亲而不密”；民革中央常委王昆仑提出统战部“统上不统下”是事实，但“上”是不是都统够了，也是个问题；民革中央副主席张治中在书面发言中谈及中共与党外人士关系，建议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从制度上求得保证，从生活和交往上培养感情，从加强学习、宣传教育和检查工作上贯彻政策。这段时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内外思想十分活跃的时期。

党衷心欢迎这些善意的批评和建议。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以《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为题，刊登了中等初等学校教师代表座谈会的发言摘要。毛泽东阅后批语：“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开展整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天下第一大事”。5月中旬，中央在一份党内指示中指出：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

①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29—430页。

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党员不信任和不尊重党外人士，高人一等，盛气凌人，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

这些都说明，党确实诚心诚意希望通过整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包括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克服党内的不良倾向，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以此推进党的作风建设。然而，随着整风运动的迅猛开展，许多复杂情况出现了。

反右派斗争

整风运动仅进行半个月，各方面人士在各种座谈会和报刊上，广泛而集中地对党的工作提出许多批评意见。这种局面是党执政以来未曾遇到过的。

5月中旬以后，各种批评意见急剧升温，情况愈趋复杂。极少数人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公然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极力抹煞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对肯定党领导新中国取得成绩的人，称为“歌德派”。他们的言论和主张，在社会上和人民群众中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这种异常现象，不能不引起党的高度警觉。知识分子队伍中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抱有敌对情绪，这是党本来清醒估计到并且多次指出过的。但是，他们这时发动猖狂进攻，则是党没有预计到的，因而对形势的认识和判断发生了变化。

5月14日，党中央发出一份党内指示，要求各地的报纸继续充分报道这些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

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这是整风运动开始后，党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出暴露右倾分子面目的问题，虽然还没有使用“右派进攻”的提法，但已经把“右倾分子”和“反共分子”并列提出来。两天后，党中央又发出党内指示，在强调党外人士的批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诚恳、正确的同时，就如何对待右翼言论作了部署。“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指示要求，对于这些错误言论，放手让他们发表，暂时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暴露其反动面目。从5月19日起，北京的高等学校贴出大字报。由于报刊上和社会上言论的影响，许多大字报带有鲜明的和尖锐的政治性。中央当时认为大字报可以揭露问题，暴露右派，锻炼群众，利多害少。于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通称“四大”）在高等学校和党政机关迅速蔓延，人为地加剧了全国性的政治紧张空气和不稳定状态。

5月中旬，毛泽东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他措辞严厉地分析了整风鸣放的形势和党内外的思想状况，第一次提出“右派猖狂进攻”的问题：“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这篇文章标志着党中央、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发生变化，运动的重点开始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此后，中央召开一系列会议，为大规模反击右派做准备。5月25日，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接见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他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次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登了这段讲话。这实际上是党在整风鸣放

的重要时刻公开发出的反击右派的预警。

6月8日，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指出：这是一场大战，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公开批评整风鸣放以来的错误言论。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由此猛烈展开。战场被认为既在党外，又在党内，就是说，在共产党和共青团内也要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从夏季到秋季，党用很大的力量来指导开展反右派斗争。1957年7月，毛泽东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讨论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关系，提出了整个整风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大鸣大放阶段，反击右派阶段，着重整改阶段，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的安排。九十月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主要也是讨论整风和反右派斗争。1958年夏季，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完全结束。

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在短短的七年里实现这样深刻的社会变革，不能不引起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不同反应，人们对这个变革需要有一个观察、适应的过程。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中国要不要共产党领导和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一小部分人仍存有崇尚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倾向。在国际国内政治气候的影响下，这种倾向就会突出地表现出来，以致发生极少数人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事件。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对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潮进行批判，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整风开始时，中央反复强调不要用对敌斗争的办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在出现极少数右派分子进攻的局势下，由于党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应对这种复杂局面的政治经验，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把历史转变时期新出现的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把大量思想认识问题当作政治问题，加上以往长期激烈的阶级斗争历史形成的政治经验和惯性力量，党的各级领导走上开展对敌斗争的群众运动的熟路，

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史上的一大教训。

反右派斗争结束时，全国共有55万多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其中，只有极少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许多人只是对党的工作和党的干部提出批评意见，批评或者是正确的，或者有片面性，甚至言辞过激、言过其实，但并不是敌视党和社会主义。还有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的现实和理论提出一些问题和想法，即使方向有偏差，也应该通过讨论和教育来解决，不应该当作反社会主义加以打击。许多领导干部自以为是，听不得不同意见或逆耳的批评，往往把这些意见和批评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在运动中还规定了划右派的具体指标，并且一再被突破。结果，许多对党忠贞的同志，许多同党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朋友，许多有才能的知识分子，许多政治上热情而不成熟的青年，由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遭受了长期的冤屈和磨难，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和党的事业的巨大损失。

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使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遭受挫折。在党的建设方面，同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以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主观愿望相反，给党内政治生活带来消极影响。在经济生活方面，一些适合当时农村生产力情况的有益探索遭到严厉批判；重新放开一些私营经济的新设想被弃置。在政治思想和文化生活方面，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两大方针，受到极大损害。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最严重后果，是动摇和修改了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随后，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进一步断言：“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

要矛盾。”对八大主要矛盾论断的修改，不仅偏离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也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一次又一次犯扩大化甚至无中生有、一直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的理论根源。党的八大二次会议还宣布我国社会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右派分子同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被称为一个剥削阶级；“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另一个剥削阶级；工人和农民是两个劳动阶级。这样，知识分子一般地被列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归入第二个剥削阶级的范围。这种离开社会成员经济基础所作的阶级划分，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不符合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结构的实际状况，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和社会发展。

探索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需要经历复杂的考验。当时面临的主要是两大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速度。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党在这两大问题上一再发生严重失误。这两方面的失误又相互影响，愈演愈烈，使探索过程出现重大的曲折。

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纠“左”过程中的曲折

为了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党中央在1957年冬提出了15年赶超英国钢产量的发展目标，在1958年正式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当时被称为“三面红旗”。它们的提出和推行，表明党力图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打开一个崭新的局

面。实践证明，这个努力是不成功的。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

反右派斗争后，党认为这场斗争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经济建设应该搞得更快一些。为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党中央、毛泽东酝酿并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自1955年下半年后，毛泽东一直在探索如何以较高的速度来发展经济。从1955年底到1956年初，他提出各行各业都要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在经济建设上实行多快好省的方针；为尽快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他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中长期农业发展规划——《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①]。在整风反右中，毛泽东更加确信1956年的反冒进是错误的。在1957年九十月间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指责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和“农业四十条”，给右派进攻以口实。这次会议只讲多快，不讲好省，实际上改变了八大确认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后，《人民日报》在1957年12月12日发表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引起毛泽东的重视。

1958年1月和3月，党中央先后在杭州、南宁和成都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继续批评反冒进，并多次谈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问题。他在成都会议上说：社会主义建设有两条路线，一条多、快、好、省，一条少、慢、差、费。社会主义建设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干劲十足，轰轰烈烈，坚持群众路线；另一种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

---

① 简称“农业四十条”。它提出，从1956年起，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斤增至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208斤增至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400斤增至800斤。棉花每亩平均产量按各地情况，由35斤分别提高到60斤、80斤和100斤。

戚戚”[①]。他把“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并提，称之为“总路线”，并在修改的文件中对总路线作了明确的表述：“我们今后的任务，是要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毛泽东认为，尽管总路线开始形成了，但是尚待完善和证实。这条总路线究竟对不对，还要看五年。然而，仅过了一个多月，这条总路线就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确定下来。

1958年5月5日至23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创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告，对这条总路线的解释是，现在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实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当时文化革命的含义是发展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认为“建设速度的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还提出工业和农业、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大型工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党和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体现了党中央、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如果既能保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精神状态，又能保持科学冷静的头脑，尊重客观规律，把多快与好省统一起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可以顺利发展的。但是，由于这条总路线是在批评反冒进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在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制订的，忽视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因而存在严重缺陷。在宣传和经济工作中实际上又片面地强调一个“快”字，提出“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于是，盲目求快就压倒了一切。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后接着举行的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

① 此句出自李清照词《声声慢》。

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选了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三名政治局委员。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大跃进”运动，是在批评反冒进和酝酿、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过程中发动起来的。

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不久，党中央于1957年10月25日公布了全会通过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各方面的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是党中央提出“大跃进”的先声。

社会主义阵营内的赶超浪潮，也推动我国领导人对“大跃进”的发动。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此前不久，苏联把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太空。这既给全世界社会主义者以巨大鼓舞，也一度引起西方国家的震惊和危机感。莫斯科会议对国际形势作出了“社会主义在向上发展，而帝国主义却在衰退”的过于乐观的估计，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肯定和接受赶超发展战略的同时，相继提出各自的赶超目标。苏联提出要在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提出中国在15年钢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随后在12月召开的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致词，向全国人民宣布了15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口号。

1957年冬，各地区、各部门贯彻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并根据“农业四十条”和15年赶超英国的要求，纷纷召开会议，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组织农民日夜奋战，掀起了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投入农田水利建设的劳动力，11月为

六七千万人，12月为8000万人，到1958年1月增至近1亿人。在尽快改变落后面貌的热情激励下，广大干部群众干劲十足，发出了“抓晴天，抢阴天，小风小雪是好天，汽灯底下是白天，争取一天当两天”等豪言壮语。这场农田水利建设高潮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再次提出15年赶超英国的目标，同时还提出：在这以后，还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再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且超过美国，以便逐步地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1958年上半年，党中央召开一系列会议，为“大跃进”做了进一步准备。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主持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领导方法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提出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的思想。在成都会议上，党以很大的精力集中讨论经济问题，制定了40多个文件。如《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明确提出在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下，注意兴办为农业服务和为大工业服务的新企业，发展县、乡、社办工业。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还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口号。当时党力图打开新的思路，寻求用更好的方法和更快的速度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但这两次会议对主张反冒进的中央领导人进行了不应有的批判，实际上否定了从经济恢复到“一五”计划时期党和人民所积累并由八大所总结的成功经验，否定了党中央的集体决策。这就很难不助长脱离实际的臆想和“跃进”，很难不助长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发展。

在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批判“反冒进”、鼓动“大跃进”的气氛下，一系列不切实际的口号和理论观点不断提出，各地区、各部门的原定计划指标一再被突破。到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时，全面“大跃进”的号角吹响了。这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通过了15年赶超英国的目标，通过了提前5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目标，通过了“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会后，“大跃进”运动

在全国范围内从各方面开展起来。其主要标志是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地大幅度提高计划指标和缩短完成时间。毛泽东提出，计划可以搞“两本账”，地方的第二本账可以高于中央的第一本账。这导致计划指标的层层加码。

在农业方面，提出“以粮为纲”的口号，要求5年、3年以至一两年达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规定的粮食产量指标。高指标带来高估产，引发严重的浮夸风。1958年夏收期间，各地虚报农业亩产量，通过“并田”造假，竞放高产“卫星”。广西环江县红旗农业社“发射”的全国最大一颗水稻高产“卫星”，亩产竟报13万多斤。报刊舆论不断宣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批判所谓“条件论”“悲观论”和“粮食增产有限论”。农业生产上盲目推行深耕密植等所谓先进经验，瞎指挥盛行一时。

在工业方面，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要求7年、5年以至3年内提前实现15年钢产量赶超英国的目标，并发动全民大炼钢铁运动。1958年8月，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决定1958年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这是一个严重脱离实际的高指标。会后，为了在余下4个月的时间里（前8个月只生产钢400万吨）完成钢产量翻番的任务，全国掀起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动员9000多万人上山，砍树挖煤，找矿炼铁，建起几百万座小土高炉、小土焦炉，降低生产标准，用土法炼铁炼钢，甚至把家庭做饭用的铁锅和其他铁器砸碎，用作炼铁炼钢原料。现代化的大中型钢铁企业，也打破各种规章制度，大搞群众运动，打乱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同时，电力、煤炭、运输、文教等部门掀起“全民大办”，形成所谓“以钢为纲，全面跃进”，“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局面，甚至科学研究、写诗作画，都要“大跃进”、放“卫星”。经过几个月蛮干，到1958年底，共生产钢1108万吨，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其余的根本无法使用。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以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由于大批农村劳动力被占

用，当年粮食等主要农作物“丰产不丰收”，人民生活开始发生严重困难。

“大跃进”运动是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挫折。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初衷，是希望用最快的速度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中国迅速强大起来。全国人民意气风发，艰苦奋斗，要为民族振兴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有所作为，这种精神是可贵的，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工业建设、科学研究和国防尖端技术的研制，以及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许多工作，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布局和发展的。但是，由于对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估计不足，对掌握经济规律和科学知识的必要性认识不足，搬用战争年代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指导经济建设，加上党内领导层的民主生活不正常，党未经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凭主观愿望和意志办事，提出了许多违背科学的高指标，结果事与愿违，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失，教训非常深刻。

在“大跃进”运动迅猛发展的同时，农村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

人民公社化运动最初是由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小社并大社引起的。在1957年冬至1958年春的农田水利建设中，许多地方为了加强集体协作的力量，开始突破原有农业合作社的规模，实行并社。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认为这是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有效组织形式，给予肯定，并在1958年上半年萌生出改变农村基层组织结构的想法。7月，《红旗》杂志披露毛泽东关于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的思想。河南、山东等地闻风而动，建立了人民公社。

在各地争先建立人民公社的形势下，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在提出要为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同时，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这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

方针”。决议一方面肯定公社目前还是集体所有制，不忙于改为全民所有制；另一方面又提出快则三四年，慢则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就可以实现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并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北戴河会议后，全国农村出现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只用了1个多月就基本实现公社化。到年底，全国74万个农业合作社被2.6万个人民公社代替，全国农户的99%以上参加了公社。

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规模大。将原来一二百户的合作社合并成为四五千户以至一二万户的人民公社，一般是一乡一社，有的甚至是数乡一社。作为“共产主义试点”的河北徐水县和河南修武县成为一县一社。所谓公，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高。原来几十个上百个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不同的合作社合并后，一切财产上交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社员的自留地、家畜、果树等都被收归社有。在各种“大办”中，政府和公社还经常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土地、物资、劳动力和农民的财物。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这种“一平二调”就是刮“共产风”，实际上是对农民的剥夺，给农村生产力带来灾难性的破坏。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它既是一个经济组织，也是一级政权机构；既要负责全社的农、林、牧、副、渔业生产，也要管理工、农、商、学、兵（民兵）等各方面的工作。人民公社划分为若干个生产大队，生产大队又划分为若干个生产队，实行三级管理。公社统管全社的生产安排、劳力调配、物资调拨、产品分配和经济核算，生产大队负责生产管理和部分经济核算，生产队只是一个具体组织生产的基本单位。

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供给制主要有粮食供给制、伙食供给制和生活基本资料供给制三种形式，社员都到公共食堂吃饭，甚至“吃饭不要钱”。工资制是在供给部分外，根据多

劳多得的原则，象征性地发给社员少量的工资。供给制被认为是按需分配原则的体现，具有共产主义因素，要求逐步扩大实行的范围。有些公社提出“八包”“十包”等，即社员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教育医疗等所需费用都由公社供给。到1958年10月底，全国农村建立公共食堂265万多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占农村总人口的70%至90%。这种制度完全脱离我国农村的实际，造成严重的平均主义和物资的巨大浪费，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人民公社大力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将所有劳动力按军队编制组成班排连营，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式组织工农业生产，动辄夜以继日，连续作战。还强调公社生产自给，努力扩大公社内部的产品分配。农村原有的集市贸易、小商小贩以至家庭副业都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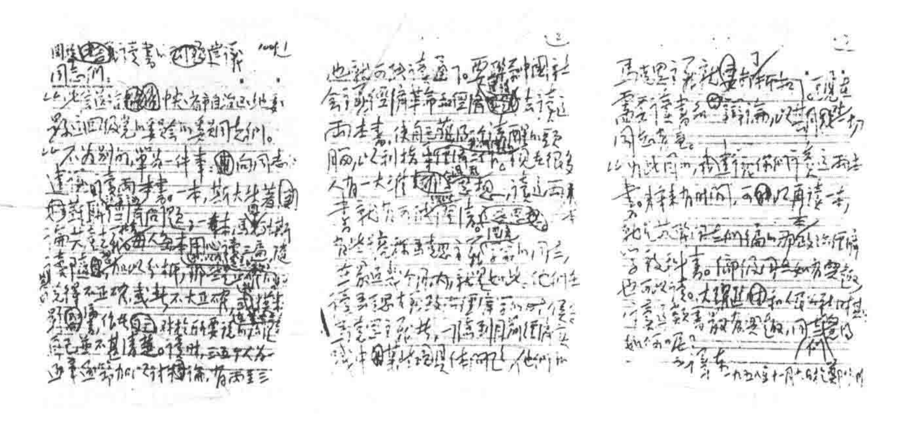
这些情况表明，初期的人民公社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色彩。“大跃进”运动最大的失误是急于求成，在建设速度上盲目求快；人民公社化运动最大的失误是片面追求提高公有化程度。两者的共同教训，是背离了党一向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脱离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违背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九个月的初步纠“左”

1958年秋冬，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严重后果开始显现出来。有的农村发生杀牲口、砍树、藏粮等现象；有的地方遭灾歉收后仍高报产量，导致征了过头粮，发生饿死人的事情；还有的地方，人民公社的牌子刚刚挂出，就急忙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搞“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党中央了解到出现的问题后，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积极领导全党整顿人民公社，调整高指标，作了初步纠“左”的努力。

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

也是较早通过初步调查研究觉察到运动出现问题并努力加以纠正的领导人。从1958年10月中旬起，毛泽东赴河北、河南、湖北等省调查研究。11月2日至10日，他在郑州主持召开有中央和地方部分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召开这次会议，是因为他发觉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很多人“急急忙忙往前闯”，有一大堆混乱思想，大有很快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业，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认为，需要对这些同志做说服工作，让大家冷静下来，“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11月21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两次会议批评了急于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企图过早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思想倾向，为接着在武昌举行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做了准备。



★ 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信，题为《关于读书的建议》。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召开，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是由毛泽东主持起草、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讨论的基础上重新改写的，集中体现了党对初步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的思想认识。《决议》对人民公社的兴起给予极高评价，同时强调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

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决议》确认人民公社目前基本上仍然是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不等于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更不等于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无论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决议》还强调要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和存款，在公社化以后仍然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这些规定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后，各地相继开展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刹住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但是，“共产风”仍然很猛，有些地方甚至到了“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的地步。党和政府同农民的紧张关系还没有真正缓和。毛泽东在调查中发现了问题的症结，决定从公社所有制的分级问题入手，调整农村集体经济内部的基本核算单位，进一步纠正“共产风”。

1959年二三月间，中央政治局在郑州召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指出人民公社的主要问题是我们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他说，公社一成立，就取消生产队所有制，实行完全的公社所有制。“一平、二调、三收款[①]”，引起农民的很大恐慌。这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在他的提议下，会议确定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遏制“共产风”的14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②]其中最重要的是，明确了生产队（相当于原来高级社的规模）所有制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会议还决定取消一些地方出现的一县一社的体制。三四月间，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

① “三收款”是指银行收回农村贷款，实际上多数银行并没有收回，后来一风吹了。

② 毛泽东：《郑州会议纪要》（1959年3月5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肯定了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而且承认大体相当于初级社规模的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同时决定清算公社成立以来的账目，退赔平调的资金物资。通过这两次会议，党中央在纠正“共产风”、整顿人民公社所有制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上海会议后，全国农村陆续进入春耕。此时，春荒缺粮的报告陆续上报到了中央。为纠正“大跃进”以来农业生产方面的一些错误做法，调动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积极性，毛泽东在4月29日直接给省以下直到生产小队的各级干部写了一封《党内通信》。他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切中时弊地谈到包产、密植、节约粮食、播种面积、机械化、讲真话等影响农业生产的几个关键问题。讲真话是全篇的点睛之笔。他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①]这封信写出了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的心声，获得了他们热烈的拥护。

党中央在调整农村生产关系的同时，对钢等产量指标作了进一步修改。毛泽东从加速经济建设和增强国家实力考虑，很重视钢铁工业的发展。“大跃进”提出“工业以钢为纲”，“钢铁元帅升帐”，赶超英国也以钢产量指标为标志。纠“左”开始后，如何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着眼，安排好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特别是钢产量指标，就成为党中央、毛泽东关注的焦点之一。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对北戴河会议提出的1959年钢产量2700万—3000万吨的高指标能否完成放心不下，多次找中央政治局常委、有关部门负责人谈话，反复考虑，最后下

① 毛泽东：《党内通信》（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

决心将指标压低到1800万吨。这次大幅度的调整，表明毛泽东和党中央正着手纠正在高指标问题上的主观主义错误，发热的头脑开始冷静下来。接着，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又作了“压缩空气”的努力，但还很不彻底。全会通过的1959年计划指标，除钢产量降到1800万吨至2000万吨、基本建设投资由500亿元降到360亿元外，其他大体保持北戴河会议的高指标。

1959年新春伊始，高指标引起的比例失调、原材料供应紧张等问题暴露出来。第一季度工业生产大幅下滑，计划执行情况很不理想。4月初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将1800万吨钢产量指标压到1650万吨，但这个指标很快也保不住了。下一步要退到哪里？受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委托，陈云领导中央财经小组连续展开调研。5月中旬，陈云拿出明确方案，将1959年钢产量指标降为1300万吨。他致信毛泽东：“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正如少奇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此前不久，陈云还提出粮食要省吃俭用，组织猪、鸡、鸭、蛋、鱼的生产与供应，安排日用必需品的生产等主张。这些缓解困难局面的有效措施，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并被采纳。

五六月间，党中央陆续发出一系列紧急指示，将1959年钢产量指标降为1300万吨；农村恢复自留地制度，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畜家禽，鼓励社员充分利用屋前屋后的零星闲散土地种植庄稼和树木，不征公粮，不归公有。

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经过近九个月的紧张努力，“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受到初步遏制，形势开始有所好转。这段时间的初步纠“左”，是全党从错误中学习，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一些新的探索的过程。每一次政策和生产指标的调整，都是对最初设想的“一大二公”人民公社模式的部分否定，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着“大跃进”的失误。在这个过程中，党中央、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得到了一些新的认识。主要包括：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

产力的性质；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必须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服务；要以“农、轻、重”为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综合平衡是整个经济工作的根本问题，国民经济应当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这些认识是纠“左”取得初步成效的重要原因，也是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成果。但是，由于党在“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的认识局限，对错误的严重性缺乏足够的清醒，纠“左”是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前提下和框架内进行的，因此，“左”倾错误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初步好转的形势还很不巩固。

“反右倾”斗争和继续“大跃进”的严重后果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江西庐山召开。毛泽东认为，总的形势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按照他的原意，这次会议是要统一全党对形势的认识，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纠“左”，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的任务。

在讨论中，大家表示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也有不少与会者从不同角度强调“大跃进”以来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前一段纠“左”虽有成绩，但还很不够，要求进一步深入进行。而另外一些与会者则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护短，甚至认为纠“左”已经过头，使干部群众泄了气，出现了右的倾向。

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对形势深感忧虑，本着对党和人民负责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在7月13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陈述自己的意见，希望得到毛泽东的理解和支持，以利于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这封信在肯定1958年成绩的基础上，指出“大跃进”以来工作中发生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他认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这种矛盾就其性质来看，“是

具有政治性的”。信中说：我们犯错误的原因，客观上是缺乏建设经验，主观上是由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上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浮夸风和片面性，“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要彻底克服“左”的思想，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彭德怀的信反映了客观实际，基本内容是正确的。作为一名政治局委员，给党的主席写信反映意见，也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

两天后，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全体与会者。小组讨论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有些人认为彭德怀夸大错误，低估成绩，有埋怨泄气情绪，甚至认为这是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成绩，是否定毛泽东的。也有不少人表示基本上赞成，认为彭德怀指出的缺点错误实际上存在，只是有些问题的提法和分寸需要斟酌。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支持彭德怀的基本观点。张闻天在三个小时的发言中，系统剖析了“大跃进”以来的严重问题，强调要多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探讨缺点和错误产生的原因。他还提到胜利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听不进不同意见。所以，发展党内民主作风很重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意见。

彭德怀的信和张闻天等人的发言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毛泽东认为，自第一次郑州会议后，中央一直在带领全党努力纠“左”，而彭德怀、张闻天并未参与这种努力，他们在庐山的论调，实际上是怀疑、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向他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战书”，是右倾的表现。当时党内外、国内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不少批评和议论，毛泽东把这些批评和议论都看作是对党的攻击，并且把它们同庐山会议上中央领导层内部的争论联系起来，又把国内的批评和争论同国际上对中国的攻击和指责联系起来，于是得出结论：党正处在内外夹攻之中，右倾已成为当前的主要危险。在这种错误判断下，毛泽

东决心发起反击。

7月23日，毛泽东召集大会发表讲话，说：现在是党内外夹攻我们，有党外的右派，也有党内那么一批人，把我们讲得一塌糊涂，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他逐条批驳彭德怀等人提出的不同意见。7月26日，毛泽东又在一封党的工作人员向中央反映意见、批评工作中犯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信上写了一段批语，认为现在党内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现在是应该反右的时候了。毛泽东讲话后，庐山的气氛骤然紧张，会议主题由纠"左"转为反右。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8月2日至16日，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举行。全会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认定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结成"反党集团"，犯了"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决定把他们调离国防、外交和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同时保留他们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的原职，"以观后效"。会后，"反右倾"斗争在全党全国展开，历时半年，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和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干部有300多万人。

"反右倾"斗争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在政治上，它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升级，并直接延伸到党内和党的高层领导中来。党内意见分歧被当作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来看待和处理，伤害了许多同志，进一步发展了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的"左"倾错误。在组织上，从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一言堂"、家长制等现象进一步滋长和蔓延，大批敢于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受到打击，党内高层成员由于提出批评和不同意见而遭到批判和组织处理，而那些说假话、见风使舵的人却得到赏识和升迁。这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党内的言

路，使得党难以防止、抵制或及时纠正后来发生的更大失误。在经济上，打断了纠“左”的积极进程，许多已被指出的、有待纠正的错误重新发展起来。

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反右倾，鼓干劲”的要求下，全国掀起继续“大跃进”的高潮。大办钢铁，大办粮食，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各种名目繁多的“大办”一哄而上。庐山会议确定1959年钢产量指标调低为1200万吨，作为政治任务，靠拼设备、拼资源的蛮干，到年底完成1387万吨。为了实现“比上年更好的大跃进”，1960年钢产量指标又提高到1840万吨，这个指标被不顾一切地“保住”了。与此同时，“共产风”又大刮起来，农村人民公社出现了急于从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的过渡。为促进这种过渡，用平调生产队的劳力和财物“大办”各种社有经济的做法又在盛行。农村公共食堂也被作为有助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大事，要求全国大办。城市人民公社在许多中小城市挂起了牌子。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再度泛滥，持续更长的时间，造成更大的危害。

继续“大跃进”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局面进一步加剧。首先是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调。1958年至1960年，积累率分别达到33.9%、43.8%、39.6%，大大超过“一五”计划期间已经较高的平均积累率24.2%。其次是工农业比例失调。1957年至1960年，工业总产值由704亿元增加到163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1.3倍；而农业总产值却由537亿元减到45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下降22.8%。再次是工业内部的比例失调。钢铁工业的畸形发展，挤占大量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使其他部门无法正常生产。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增加大量职工和投资，造成财政收支不平衡以及社会购买力和可供商品的比例严重失调，出现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市场紧张。

在继续“大跃进”期间，遭到最大破坏的是农业生产，受害最重的是农民。由于“左”倾错误的一再发展，尤其是高估产高征购，甚至

连农民的口粮和种子粮也被征走，造成极为严重的恶果。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农副产品产量急剧下降，人民的吃穿用全面紧张。据后来统计，1959年我国粮食产量仅为16969.2万吨，相当于1954年的水平。1960年粮食产量为14385.7万吨，棉花产量为106.6万吨，均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产量为194.1万吨，比1949年还低。党和人民面临着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许多地区因严重缺粮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非正常死亡人口急剧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等原因，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几倍。原本希望快一些让人民群众过上较好的日子，结果却出现如此空前的灾难。这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和教训。

四、对国民经济和社会政治关系的调整

受到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严重困难的教训，全党逐步清醒过来。党中央、毛泽东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1960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这两件事为标志，党的指导方针发生了重要转变。

八字方针的提出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难时，农业和农村首当其冲。1960年10月底，河南信阳地区大批饿死人的情况反映到北京，引起中央的震惊和严重

关注。危机迫在眉睫，必须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同年11月3日，党中央发出由周恩来主持起草并经毛泽东改定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迈出了克服严重经济困难的重要一步。

《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来坚决纠正“共产风”，并规定了12条措施。主要是：重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坚决退赔；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实行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恢复农村集市，等等。《紧急指示信》仍主张坚持部分供给制，坚持办好食堂。这两个不足之处，成为后来纠“左”的重点和难点。

《紧急指示信》发出后，各级党组织负责人和干部深入农村，向广大农民宣读、解释，同他们一道为纠正错误、落实政策、扭转农村形势而努力。毛泽东密切关注《紧急指示信》的执行情况。他在为中央起草的一个批语中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自己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①]

克服困难，需要集中全党的智慧和力量。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全会以及为准备这次全会而召



★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① 毛泽东：《永远不许一平二调》（1960年11月28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页。

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多次讲话，号召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要求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他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的传统的。最近几年，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还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可能要搞半个世纪。今后搞几年慢腾腾，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全会通过了1960年8月周恩来、李富春主持研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时提出的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战略转变。此后，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由“大跃进”转入调整时期。

会后不久，中央在3月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其中附有失散多年、不久前被重新发现的毛泽东1930年5月写的《调查工作》（后来公开发表时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①]，要求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联系实际深入学习。信中指出：最近几年工作中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战争年代进行的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全党各级领导同志，决不可忽略和忘记这个付出了代价的教训。信中强调：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是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中央发出的这个指示，实际上向全党干部提出了端正思想路线的问题。党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在一定程度的恢复，使党在60年代前期重新掌握了工作的主动权。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以后，中央领导人相继到基层调查。由于农村

①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首次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 1961年1月，毛泽东组织和领导三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和广东农村调查。毛泽东与他组织、领导的调查组成员合影。

的经济困难最突出，调查的重点放在农村。毛泽东直接组织和指导3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他怀着急于了解农村真实情况的心情，1月25日晚离开北京，经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南昌、长沙，于2月13日到达广州，一路考察。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也纷纷下到基层。其中，刘少奇在湖南农村的调查达44天。这些调查研究，有利于党中央集思广益，调整政策，迅速作出符合群众要求的正确决断。《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就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后结出的第一个硕果。

在1961年初南下调研过程中，毛泽东发现《紧急指示信》没有完全解决两个重大问题。其一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其二是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为系统解决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毛泽东于3月在广州主持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在条例起草、修订、再修订的一年零六个月时间里，全党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开始一个又一个地纠正1958年以来农村工作的错误。6月的修正草案取消了农民强烈反对的公共食堂和部分供给制；9月，毛泽东提出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



★ 1961年3月，党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和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到相当于原来初级社规模的生产队。1962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规定：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是在一个长时期内，例如，至少30年内实行的根本制度。"农业六十条"在仍保持人民公社总体框架的前提下，纠正了公社化以来一直突出存在的若干错误，解决了当时群众意见最大最紧迫的一些问题，从而在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以及遏制"共产风"再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调整方针的初步贯彻

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各领域的调整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工业领域调整的一个方面，是降低钢产量等指标。按最初的设想，是在维持1960年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已经达到的产量指标上进行调整，1961年的计划指标不再提高，也不降低。因此，八届九中全会通过的1961年计划数字，钢为1900万吨，与1960年大体持平，略高一点，粮食为20500万吨，比当时估计的1960年产量18500万吨增加10.8%。由于对农业实际产量的估计和可能增产的期望过高，所以下

不了降低工业指标的决心。这就不能不使工业方面的困难更加严重。1961年计划执行的结果，上半年工业出现大幅度滑坡。在周恩来的督促下，经济和计划部门经过努力，重新查清了1958年、1959年、1960年粮食实际产量的底数。农业情况见了底，工业问题困难的症结也就暴露出来，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提出的1961年计划不可能继续维持。1961年八九月间，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作出《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指示》说：我们已经丧失了一年多的时机，再不能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就坚决退下来。如果不下这个决心，仍然坚持那些不切实际的指标，既不能上，又不愿下，我们的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就会陷入更被动、更严重的局面。根据这个精神，国家计委大幅降低了1961年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指标，基本建设投资由167亿元降为78亿元，钢由1900万吨降为850万吨，粮食由20500万吨降为13500万吨。年底执行计划的结果与这些指标大体相符。

工业调整的另一方面，是整顿企业秩序。为此，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这个条例在邓小平主持下，由李富春、薄一波具体负责制定，1961年9月由中央颁布试行。为起草好条例，11个调查组受中央委托深入工矿企业调研，发现了诸多问题：管理混乱，责任制和经济核算制废弛，设备损坏严重，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降低，等等。为克乱求治，"工业七十条"确定国家对企业实行"五定"[1]，企业对国家实行"五保"[2]；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职工代表大会制和以厂长为首的全厂统一的生产行政指挥系统的运行和职责，作了详细规定。"工业七十条"系统地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工业管理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国营企业管理的若干指导原则，受到广大干部和职工的

---

① "五定"，即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定人员和机构；定主要原材料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协作关系。

② "五保"，即保证产品的品种、质量、数量；保证不超过工资总额；保证完成成本计划；保证完成上缴利润；保证主要设备的使用期限。

拥护。它的颁布施行，对于恢复和建立企业正常的生产秩序，对于工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于国营企业管理也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党中央还注意解决城乡手工业和商业政策问题。1961年6月，中央发出《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手工业三十五条”）和《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即“商业四十条”），用以纠正“大跃进”以来取消农村集市贸易和小商小贩，将集体性质的手工业和商业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错误。

在全国粮食十分短缺的严重局面下，党中央下决心减少城镇人口，压缩城镇粮食销量。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举措。由于“大跃进”期间下放招工管理权限，致使职工人数和城镇人口增长过快，造成职工工资总额和社会购买力急剧膨胀，引起粮食、副食品供应紧张，农业劳动力大幅减少，影响了农业生产。在1961年五六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提出，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是从城市压缩人口下乡。陈云很赞成，明确指出，面前摆着两条路要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那就是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1960年底1.29亿城镇人口的基数上，3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1961年减少1000万人；1961年至1962年度城镇粮食销量争取压缩到2400万吨—2450万吨，比上年度减少150万吨—200万吨。会后，全国精简职工队伍，动员城镇人员到农村安置，参加农业生产。这项工作经过精心组织，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达到了预期目的。1961年精简职工950万人，全国职工总数比1960年实际减少798万人；减少城镇人口1000多万人[1]。

同经济工作的调整相配合，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也进行了调整。“大跃进”以来，在知识分子中进行了许多过火的和错误的批

①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判，拔“白旗”、批“白专”道路、破“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不仅造成正常工作、学习秩序的混乱，也造成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紧张。中央先后颁发《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即“科学十四条”）、《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条”）、《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即“文艺八条”）等条例。其中心内容，就是要调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以恢复正常秩序，保证各方面工作的顺利进行。在1961年7月讨论“科学十四条”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指出：党怎样做工作？就是要创造一个生动活泼、人心舒畅的局面，一个出科学成果的局面。党的领导干部要和知识分子交朋友，关心帮助他们；就是要老老实实当好勤务员，为科学家服务，替他们解决困难①。“科学十四条”和“高教六十条”废除了“白专道路”的提法，在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反响。有的大学生说：“看到人民公社六十条以后，就盼望高等学校也定出一个六十条来，现在果然盼到了！”

在上述几个重要条例施行的过程中，党注意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逐步探索出一套较为系统的发展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的方针政策和具体制度。虽然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心情较为舒畅了，专心从事业务工作的条件大有改善。电影导演谢晋在讨论“文艺十条”和“电影三十二条”时提出，希望把这两个条例刻成碑，树在制片厂的大门口，以便领导者与创作者时时对照②。这些话代表了广大知识分子拥护这些条例、希望政策不要再随意变动的殷切而又隐含着担忧的心情。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47页。

②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电影》（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5页。“电影三十二条”即《关于加强电影艺术片创作和生产领导的意见》。

端正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方向，势必要对我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作出正确判断。1962年3月，周恩来在广州向出席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及全国话剧、歌剧和儿童剧创作座谈会的代表作《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发挥科学和科学家的作用。这个讲话精神是和1956年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一脉相承的。在会上，陈毅还动情地说：经过十二年的考验，尤其是这几年严重困难的考验，证明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是爱国的，相信共产党的，跟党和人民同甘共苦的。八年十年十二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那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他宣布给广大知识分子“脱帽”（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冕”（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随后周恩来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再次肯定这一论断。但是，当时中央内部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认识并不统一，“左”倾观点没有得到认真清理。

七千人大会及其后的进一步调整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和省、地、县委四级主要负责人以及重要厂矿和军队的负责干部，共7118人，通常称为七千人大会。这次空前规模的大会，是在经过一年调整形势有了转变，但是困难还很大、党内外还有很多思想疑虑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目的是进一步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认识，增强团结，动员全党更坚决地执行调整方针，为战胜困难而奋斗。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七千人大会先将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草稿发给各组讨论。这个报告比较系统地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着重指出了工作中发生的工农业



★ 七千人大会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在一起。

生产计划指标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在农村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的界限、急于过渡、刮“共产风”和分散主义严重滋长等缺点和错误。报告草稿认为，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缺乏建设经验；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妨碍了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

1月27日，刘少奇在第一次全体大会上讲话，对书面报告作口头说明。针对党内思想疑虑最大的几个问题，他坦诚地指出：关于国内形势，我们在经济方面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1959年到1961年工农业减产，导致人民吃穿用不足，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事实就是这样。关于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他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作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从全国讲，恐

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的缺点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也可能是七个指头。关于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中的失误，有的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关于“三面红旗”，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地作出结论。这些看法，使党朝着勇敢地正视现实，实事求是地认识“大跃进”以来实际工作和指导思想的错误，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会后，刘少奇在整理讲话稿时曾感情激动地说：“犯了那么大的错误，给人民带来那么大的损失，我们这是第一次总结。只一次不行，以后每年要总结，一直到十次、八次，才能深刻地接受错误的教训。”①

刘少奇的报告和讲话，受到热烈欢迎。大会原定1月底结束，由于与会者纷纷表示还有许多话要说，毛泽东建议延长会期，在北京过春节，“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大会进入了充分发扬民主、开展党内批评的阶段。与会者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敢于揭露和批评。党的各级领导人从毛泽东到省委书记，都主动承担责任，带头进行检讨。这种状况，在党的民主生活中是不多见的。

在1月30日的大会上，毛泽东发表长篇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他总结“大跃进”的教训，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让人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毛泽东还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今后要下苦功夫调查它，研究它，弄清楚它的规律；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1898—196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22页。



★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作长篇讲话。

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这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建设长期性的进一步认识。

邓小平、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作自我批评。邓小平主要讲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周恩来讲克服目前困难的主要办法。朱德在山东组的全体会上发言，提出要纠正"左"的偏向，恢复和发展生产。陈云在大会结束后陕西组的全体干部会上讲了话，重点是讲加强党内民主生活。

林彪在大会上也作了发言。除详细阐述军事工作外，他还说：三年以来，我们在物质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这几年发生错误和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弯路会少

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林彪的发言带有浓厚的个人崇拜色彩。这对会议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克服缺点错误产生了消极影响。

七千人大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取得了重要成果。会议发扬党内民主，实质上是党内关系的一次调整。虽然会议仍肯定“三面红旗”，没有能从根本指导思想上清理“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但对待缺点错误的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及发扬民主和进行自我批评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在动员全党团结奋斗战胜困难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视察南方，组织调整工作的重任落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及处于经济领导工作第一线的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的肩上。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央于2月下旬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对形势作了进一步的分析，认为当前经济困难比七千人大会时所作的估计要严重，必须有一个恢复时期，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的大幅度的调整。刘少奇指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过去，现在处在“非常时期”，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国民经济将进一步恶化。陈云就如何克服困难提出了系统的意见，主张把十年经济规划分为恢复阶段和发展阶段；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争取快，准备慢”；目前第一位的任务是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这些意见得到与会者的热烈赞同。陈云的讲话经中央批准下发，成为当时经济工作的指导性意见。西楼会议后，中央决定恢复“大跃进”开始后不久就停止工作的中央财经小组，统管全国经济工作。

5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中央财经小组起草的关于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作出了大刀阔斧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部署。周恩来在会上说：在困难面前，就要有“毒蛇噬臂，壮士断腕”的决心，才能把国民经济调整好。会议决定：进一步大力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缩短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从人力财力物力

各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战线，加强农村基层的领导力量。仅第一项措施，中央要求1962年全国职工人数再减少1056万—1072万人，城镇人口再减少2000万人[①]。经过努力，1961年至1963年6月，全国共精简职工1887万人，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人，还有100余万名干部到基层劳动和工作。周恩来曾说过：这项工程等于一个中等国家搬家。“关这么多厂，拆这么多‘庙’，精简这么多人。这件事情，在中国，没有哪个政权能够这样做，只有我们才有这样做的群众基础。”[②]国家还千方百计解决人民吃、穿、用的问题，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减少粮食收购量，增加粮食进口，农村的粮食压力得到大大缓解。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62年3月、4月制订“银行工作六条”[③]和“财政工作六条”[④]，改进银行、财政管理体制，坚持财政、信贷、市场、外贸的平衡。由于中央的决心大，工作力度强，措施切实果断，到1962年底，我国农业生产开始回升，国家财政实现收支平衡，城乡人民生活状况开始好转。但是，经济困难只是刚迈过谷底，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仍然很重，有待全党和全国人民继续努力。

在农业政策的调整中，党对农业生产责任制进行了大胆探索。60年代初，为渡过难关，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在一些地方自发地搞了起来，并得到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默认或支持，安徽省委还在全省范围内进行试验。到1962年7月，全国已有不止20%的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效果大都较好。邓子恢经过广泛调查后，于1962年5月致书党中央、毛泽东，肯定包产到户的做法，随后又到不少地方讲演，进行宣传。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对包产到户也表示赞成。邓小平还用民

---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62—463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76页。

③ “银行工作六条”，即《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

④ “财政工作六条”，即《关于严格控制财政管理的决定》。

间谚语“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来表明自己的支持态度。但这种探索没有得到中央的正式认可。

七千人大会后，社会政治关系方面的调整加快了步伐。3月下旬，刘少奇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向党外民主人士通报七千人大会情况，说明几年来国内工作的缺点错误，责任在中国共产党，主要责任在党中央。接着，在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和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对政府工作的缺点错误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党外民主人士深受感动，纷纷表示愿与共产党同舟共济，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民革中央副主席张治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言说：我当过十几年国民党的中央常委，从来没有听到蒋介石讲过自己的缺点错误。中国共产党主动承担责任、自觉检讨错误，体现了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诚态度和负责精神。此后，中央还在四五月间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和民族工作会议，对几年来工作中“左”的错误进行检查和纠正。

党中央还采取重要步骤，对1957年以来政治运动中产生的偏差进行不同程度的纠正。1962年4月，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书记处制定和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随后，又提出对全国县以下的干部来个“一揽子”解决的办法。到1962年8月，在“反右倾”斗争中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绝大多数得到平反。关于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工作，在1959年国庆前夕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开始分批进行，到1962年大部分已摘去帽子。对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来说，单摘去帽子并没有从根本上澄清是非，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的政治处境和工作、生活安排有所改善。

五、经济上调整任务的完成和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发展

随着调整工作的深入进行，经济上的调整取得显著进展，但中央领导层对形势估量和工作指导上的分歧逐渐扩大，加之50年代后期开始的中苏两党争论不断激化，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程中发生新的波折。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此前，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一个月的工作会议，又在北京召开了近一个月的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北戴河工作会议的原定议题是讨论农村、粮食、财贸等方面的工作，毛泽东在会议一开始就提出阶级、形势、矛盾的问题，要求大家讨论。这个题目随之成为八届十中全会的主题。

在北戴河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多次讲话，分析中国国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他把党内一些认识上的分歧，当作阶级斗争的反映，并且同苏联赫鲁晓夫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指责联系起来，把他不同意而实际上是比较符合客观情况的一些意见，看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表现，斥之为“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就西楼会议和五月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形势的估计，以及各地出现的包产到户和党内一些同志对包产到户的支持，毛泽东说：现在有些人把形势说成一片黑暗了，他们思想混乱，

丧失信心，看不见光明。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只能单干。这股风越到上层越大。他批评邓子恢说：你这次搞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又飞走了。当时彭德怀向中央递交了长篇申诉书，毛泽东认为这是搞翻案活动，不能给他平反，把干部甄别平反也看作“翻案风”。会议期间，发生了围绕小说《刘志丹》而引起的政治批判。康生硬说这部小说是“为高岗翻案”，得到毛泽东同意。会议将关心过小说写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同彭德怀、高岗联系在一起，把参加过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打成“反党集团”。会议决定成立两个专案委员会，分别对彭德怀和习仲勋进行审查。会后，以邓子恢为部长的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撤销，包产到户和甄别平反工作停止下来。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开展的错误批判，是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左”倾错误理论发展的结果。在修改全会公报时，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他还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这些论断的核心思想，是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阶级都将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这样，就把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这一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再一次尖锐又极端简单化地提到全党面前。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阶级斗争仍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正视这个事实，正确地加以处理，对此保持清醒的认识，是完全必要的。但八届十中全会发展了自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为党在这个问题上“左”倾错误

的再度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全会结束前，刘少奇鉴于1959年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斗争妨碍了实际工作中纠“左”的教训，提出这次全会批判彭德怀等人的情况，只传达到党的高级干部，不向下传达。中央接受了这一提议。毛泽东也提出，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要把经济调整工作放在第一位。全会通过了关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关于商业工作等几个决定以及“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等几个文件。全会提出，继续贯彻执行八字调整方针，继续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这些对巩固前一阶段经济调整的成果，继续进行调整具有积极意义。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党全国的工作出现这样一种复杂情况：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一步步发展；经济上的调整和恢复工作大体上仍能按原计划进行，直到1965年胜利完成。这两者是相互矛盾的，但矛盾被暂时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错误批判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党中央决定在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

较早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是河北、湖南等省。河北保定地区在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时进行了“小四清”（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查出一些干部有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等行为。湖南省则结合纠正所谓“单干风”开展运动。这些做法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在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推荐这两个省的经验，强调“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并提出在农村进行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5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

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前十条”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甚至把党变修、国变色、全国发生反革命复辟看成是面临的现实危险，认定“四清”和“五反”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要求各地训练干部进行试点，为普遍开展社教运动做准备。9月，中央根据试点中提出的问题，又制定《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后十条”在肯定“前十条”的基础上，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同时也规定了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等比较正确的具体政策。1963年冬到1964年春，全国有一大批农村社队进行“四清”，少数城市开始“五反”的试点。

正当“后十条”下发、社教运动全面铺开之时，中苏两党论战不断升级，党中央把“四清”和“五反”看作是与国际上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相配合的国内反修防修的重大战略措施。在运动中，一些试点单位总结出“阶级敌人篡夺领导权”或干部“和平演变”的典型材料。1964年五六月间，毛泽东提出：全国有1/3左右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而在敌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手里。刘少奇提出，恐怕有些地方1/3还打不住。中央决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主持修改“后十条”。9月中旬正式下发的“后十条”修正草案，对形势作了更加不符合实际的严重估计，认为阶级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决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把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完全撇到了一边。

从1964年下半年起，许多地方的社教运动实行“大兵团作战”，搞秘密的“扎根串连”，重复老解放区土改中曾经发生过的“搬石头”的做法，开展夺权斗争。中央又相继向各地推广河北抚宁县“桃园经验”和天津小站大队夺权的经验，“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起来。1964年秋冬至1965年春，全国各级干部有一百五十六十万人参加工作队。天津小站大队仅1000多户，工作队员竟有500多名。

1964年底至1965年初，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二十三条”部分纠正了1964年下半年各地在“四清”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左”的偏差，肯定农村基层干部的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提出要尽快解脱他们，逐步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工作方法要走群众路线，不要搞神秘化，也不要靠人海战术；“四清”要落实到建设上面，增产要成为搞好运动的标准之一。但是，它又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进一步发展。

“二十三条”规定，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称为“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到1966年春，全国约有1/3的县、社进行了“四清”，国营工业、交通系统、高等学校进行了试点。“四清”运动虽然对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把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都当成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使不少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在1962年七八月间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四清”运动开展过程中，党内也对一些高级领导干部进行了错误的批判。1963年、1964年，毛泽东在同外国党领导人的谈话中，先后点名批评原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邓子恢关于农村工作的主张被概括为“三自一包”（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场、多搞自负盈亏、包产到户），是“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王稼祥1962年春向中央建议：为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加紧建设，有必要争取对外关系的相对缓和；在同美国、苏联和印度的斗争中要注意策略；对外援助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这些建议总的精神是正确的，向中央提建议在组织原则上也没有错，但被歪曲为“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要和，对各国人民革命的支援要少），是“修正主义的国际纲领”。李维汉关于统战工作的许

多主张，被说成是“向资产阶级投降”。他们被视为“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受到严厉批判，王稼祥、李维汉被撤销职务。

文化领域的错误批判，从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就已经开始，但在全国大规模的展开，是在毛泽东作出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之后。1963年12月，毛泽东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964年6月，毛泽东又批示：全国文联和所属的“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由于错误地强调“修正主义上台”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毛泽东没有能够实事求是地全面估计文艺界的形势，对文艺界的工作基本采取否定态度，导致发动群众运动和政治斗争来解决文艺问题。两个批示后，文艺界掀起大批判浪潮。《李慧娘》《谢瑶环》《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等一批戏剧、电影、美术、音乐作品和文艺理论观点遭到批判。

1964年夏，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由文艺界扩展到其他方面。哲学界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经济学界批判孙冶方的“生产价格论”和“企业利润观”；历史学界批判翦伯赞的“非阶级观点”和“让步政策论”等。在批判运动中，许多同志包括一些重要领导干部和卓有成就的作家、学者，或被撤销领导职务，或被中断正常的工作。

随着意识形态领域批判的加紧，整个知识分子队伍的大多数再次被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造成人人自危的紧张气氛。在“左”倾批判日益加剧的时候，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试图加以控制。1965年3月，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戏台上

只演兵，只演打仗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自己上台。他提出要赶快刹车，但终究没能刹住。

三年继续调整的决策和三线建设布局

1962年上半年，全党集中力量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到1963年夏，各项建设事业呈现出明显的健康发展势头。在1963年9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决定从1963年起，再用三年时间继续调整，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之间的过渡阶段，“三五”计划推迟到1966年开局。

1963年至1965年的调整，在工业领域取得了以下重要进展：大力加强影响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薄弱环节和部门，增加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产品，维修和更新设备，恢复和提高老企业、老基地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自力更生开发技术同适当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相结合，有重点地发展对国民经济有重大作用的新兴产业，填补缺门，提高国家工业整体水平和经济实力；加强管理，调整关系，推进工业企业的专业化和协作，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在企业管理、物资管理、劳动管理等方面进行探索，试办托拉斯（按行业或根据生产性质组织联合经营的大型公司），试行按经济区域组织物资供应等。这些探索为后来的改革提供了某些有益的启示。在农业领域，农村生产关系得到一些调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农业产量有较大的恢复性增长，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在城市建设方面，1962年和196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接连召开两次城市工作会议，决定提高城市基础设施的投入，注意适当解决职工住房不足、文教卫生设施不适应需要等问题。1963年至1965年，城市建设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由“二五”期间的2.3%上升到2.9%，超过“一五”期间的投资比

例[①]。非生产性建设投资比重由“二五”期间的14.6%上升到20.6%[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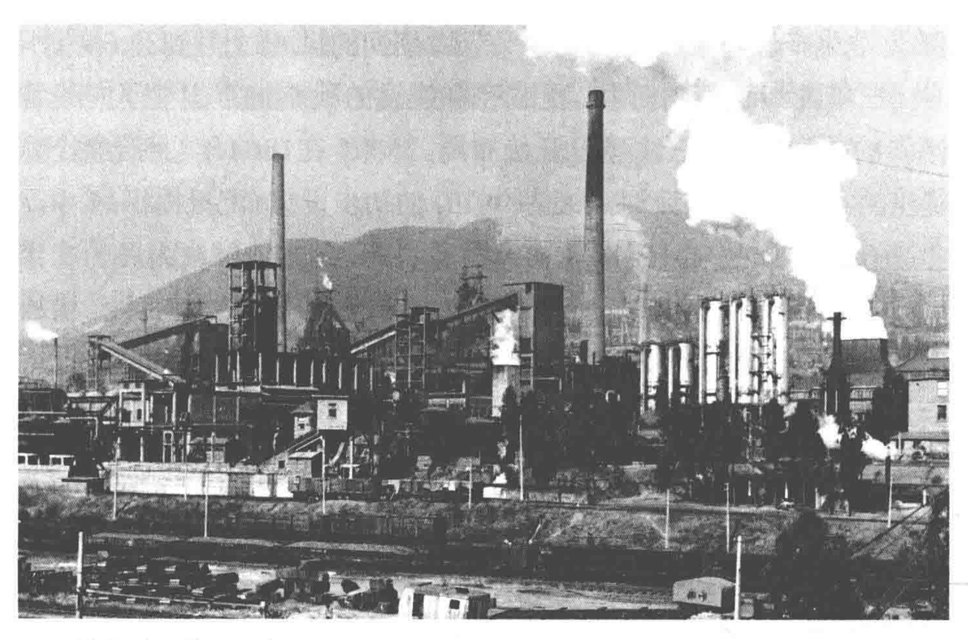
三年继续调整的后期，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发生了向战备倾斜的重大转变，三线建设开始布局。本来，在1964年4月国家计委提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汇报提纲）》中，“三五”计划的中心任务是：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加强基础工业，增加产品品种和产量，继续提高产品质量；同时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商业、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事业。当时人们形象地把这个计划称为“吃穿用计划”。

60年代前期，国际形势出现新的动荡，美国对越南北方的侵略战争逐步扩大，我国周边形势日趋紧张，备战问题摆到党的重要议程上来。1964年五六月间，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专门讨论“三五”计划时，高度关注国家安全的毛泽东，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战略布局考虑，将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③]，提出三线建设问题。他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我们把三线的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那时打起仗来就不怕了。有了准备就可能不打了。据此，中央改变“三五”计划的最初设想，作出了开展三线建设、加强备战的重大战略部署。10月，中央下发《一九六五年计划纲要（草案）》，提出三线建设的总目标是：采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广袤的三线地区由此在国家计划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

①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城市建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7页。

②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0—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67页。

③ 一线指东北及沿海各省市；三线指云、贵、川、陕、甘、宁、青、晋、豫、鄂、湘等11个省区，其中西南（云、贵、川）和西北（陕、甘、宁、青）俗称大三线；二线是指一、三线之间的中间地区；一、二线地区各自的腹地又俗称小三线。



★ 攀枝花钢铁公司外景。

地位。据不完全统计，1964年下半年至1965年，在西南、西北三线部署的新建、扩建和续建大中型项目有300多个。日后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四川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甘肃酒泉钢铁厂、成昆铁路等铁路干线、重庆兵器工业基地、成都航空工业基地、西北航空航天工业基地和电子、光学仪器工业基地、核工业新基地，以及湖北十堰的第二汽车制造厂等，都是其中的重点项目。

1965年夏，三线建设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并在1965年至1966年形成一个小高潮。这时三线建设的主战场在西南大三线。国家不仅大幅增加对三线建设的投资，还对一、二线经济建设采取"停""缩""搬""分""帮"①等措施。这实际上是国民经济布局的一次大调整。1965年，三线建设完成全部搬迁计划的40%，建成和部分建成的项目接近在建项目的40%。1966年除继续进行已上马的重点

① "停"即停建一切新开工项目；"缩"即压缩正在建设的项目；"搬"即将部分企事业单位全部搬迁到三线；"分"即将部分企事业单位分出一块或两块迁往三线；"帮"即从技术力量和设备方面对口帮助三线企业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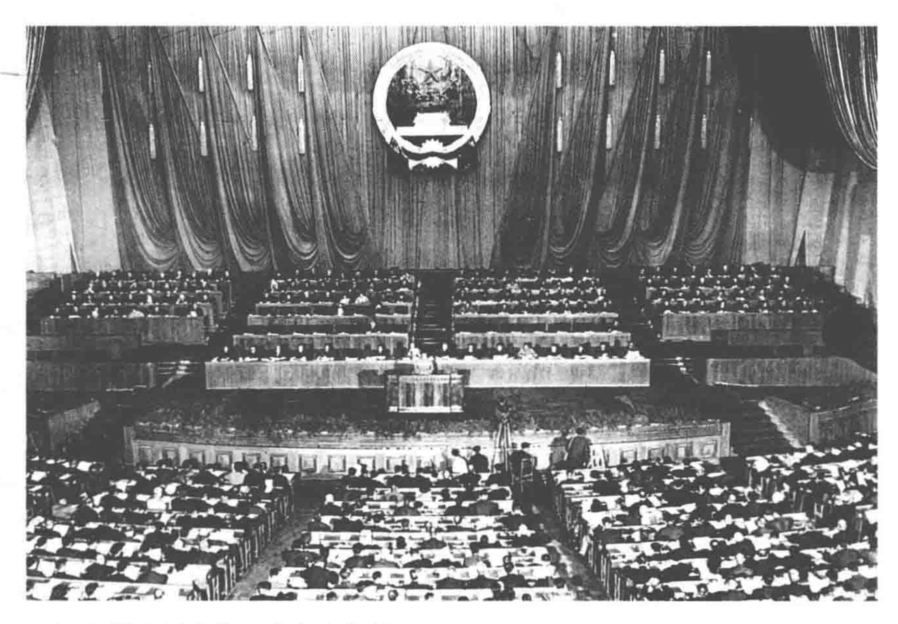
项目外，贵州、甘肃、四川的一些大型项目开始上马。

三线建设开展之时，编制和调整“三五”计划的工作也在紧张进行。1966年3月，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三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后来被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思想成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遵循的重要指导方针。

由于对战争作了立足于准备应对“早打”“大打”的估计，三线建设在部署上要求过急，铺开的摊子过大；注重战备要求，忽视经济效益，增加了建设费用，造成了不少浪费。但是，从总体上看，三线建设的实施，是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步骤，对于提高国家的国防能力，对于改善我国国民经济布局、推进中西部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和“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宣布

由于党在经济工作方面采取了比较符合实际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国



★ 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场。

民经济调整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提出新的奋斗目标的时机已经成熟。

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会上宣告：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我们已经开始取得了建设工作的主动权”，1966年将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

令全国人民备受鼓舞的是，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郑重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中央还确定了分两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即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第一步，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农业大国，在工业化战略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分两步走的战略构想，使社会主义的建设目标以“四个现代化”的形式清晰地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这是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作出的重大决策。“四个现代化”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成为凝聚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以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而具有自己特殊的历史地位。

到1965年底，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全面完成。工农业生产总值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得到改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恢复正常；财政收支平衡，市场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严重困难局面，依靠党和人民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得到改变。这个成就的取得是多么不容易！

六、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世界冷战格局中，国际局势的发展充满动荡和曲折，世界上各种力量出现分化和改组，中国面临来自多方的公开的和潜在的侵略威胁、战争挑衅和军事压力。党和国家在十分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开展外交工作。在同美国对抗，同苏联论战的过程中，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关系成为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

中国和亚非拉国家关系的发展

亚非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运动，自50年代中期以后处于高涨之中。积极支持亚非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运动，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任务。1956年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反对英法侵略的斗争，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古巴、巴拿马等国人民反对美国武装干涉的斗争，中国都给予热情的声援。中国在国际上得到的支持也主要来自亚非拉国家。中国同大批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拉丁美洲的古巴就是在1960年9月同中国建交的。中古建交揭开了中拉关系的新篇章。

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前期，根据形势的发展，毛泽东提出“中间地带”问题。他认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非拉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



★ 1959年5月15日，毛泽东接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来中国访问的代表团，并与他们合影。

联控制的问题[1]。从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战略出发，争取“中间地带”成为当时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等多次出访亚非国家，阐述中国的对外政策，增进国家间的友好关系，展现了中国外交的软实力。亚非国家领导人也频频访问中国。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在访问非洲时提出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及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受到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热烈欢迎。中国对亚非拉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迅速取得成效。1960年1月至1963年3月，中国根据和平共处、睦邻友好的原则，通过互谅互让的平等协商，先后同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五国签订协定或条约，妥善解

① 毛泽东：《两个中间地带》（1963年9月，1964年1月、7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页。

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中日之间通过民间渠道，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发展了两国人民的交往和友谊。1964年中法建交，是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打开外交局面的重大成果。

60年代初期，中国南面的周边形势因中印边界冲突变得严峻起来。中印之间过去从未正式划定边界，只存在一条根据双方行政管辖所及而形成的传统习惯线。1959年8月以后，印度军队多次侵入中国领土，引起边界武装冲突。1962年10月，印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历时33天，收复了1959年8月以后被印军侵占的中国领土。中国军队取得重大胜利后即在全线主动停火，主动后撤，又遣还全部印军战俘和归还缴获的武器及军用物资。中国力求控制并平息边界冲突的行动证明，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是以中印两国人民友好大局为重的。

中美对抗和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

就中美关系而言，这十年间有两个问题最尖锐：一是美国武装插足台湾，干涉中国内政；二是美国武装侵略越南，威胁中国安全。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逐步确立了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并采取一些措施打破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的僵局，但这些努力未能得到美国的积极回应。1955年3月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生效后，美国加强对台军事援助，加紧制造“两个中国”，并纵容蒋介石集团对大陆沿海的骚扰和破坏。台湾海峡局势从1957年起再度紧张起来。年底，中美大使级会谈由于美国企图单方面降低谈判级别而中断。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多次声称美国将继续实行对华政策三原则，即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继续对中国实行封锁和贸易禁运。在此背景下，党中央和毛泽东调整政策，从争取缓和转为加强对美斗争。1958年夏，中东地区掀起了推翻亲美政权的风暴。党中央和毛泽东抓住时机，在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期间决定以炮击金门的方式把台湾

问题提出来。

8月23日下午5时30分，福建前线部队奉命向金门国民党军实施大规模猛烈炮击，历时两个多小时，发出近三万发炮弹。次日，又进行炮兵和海军的联合打击。连续几天的炮火，基本实现了对金门的封锁。

金门炮声一响，美国急忙增兵台湾海峡，一方面扬言要“保护”金门、马祖等有关阵地，并从9月7日起派军舰进入金门海域为国民党军护航；另一方面又要求重开中美大使级会谈。针对美方的举动，中央决定继续对金门实施炮击，以打击国民党军的方式反对美军的护航行动，同时恢复两国大使级会谈。随着金门炮击的进一步发展，美国进退两难，美蒋在金门、马祖撤军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美国企图从金门、马祖脱身，换取中国同意对台湾和澎湖不使用武力，实际仍然是要搞“两个中国”。为粉碎美国分裂中国的图谋，同时考虑到国民党集团也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党中央审时度势，决定把金门、马祖暂留台湾当局手中。这意味着将过去设想的先收复金门、马祖，再解放台湾的“两步走”方针，改变为“一揽子解决”台、澎、金、马问题。10月6日和26日，《人民日报》发表由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名义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和《再告台湾同胞书》。这两份文告向台湾当局和台湾同胞晓以民族大义，指出双方都同意“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第二份文告还宣布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码头、海滩和船只，以利金门诸岛得到充分的供应。此后，台湾海峡的斗争就从以军事形式为主转向以政治和外交形式为主，中美之间的僵局一直持续多年。

炮击金门沉重打击了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嚣张气焰和美国搞“两个中国”的企图，有力表明了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和决心。这次炮击也使得美国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比较充分地暴露出来。在大规模炮击停止之后，毛泽东请人给台湾领导人带话，表示：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的控制，



★ 1965年7月20日，周恩来、彭真等到机场迎接从海外归来抵达北京的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等人。

我们可以同他合作；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可以照原有方式生活，军队可以保存，继续搞三民主义。“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台湾的小枝在同美国的大枝连，总要被压断的，将来要变成殖民地或被托管的。他们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你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你那一套[①]。1963年1月，周恩来将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原则概括为“一纲四目”转达给台湾当局。“一纲”是：只要台湾归回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台湾领导人意见妥善处理。“四目”是：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台湾领导人全权处理；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台湾领导人意见协商决定，然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64—465页。

后进行；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1]。“一纲四目”的祖国统一构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为重的胸怀和面对实际、从现实出发的精神，对两岸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65年，美国急剧扩大侵略越南的战争，严重威胁中国安全，中美两国再次走到热战边缘。中共中央严正表明援越抗美的立场，并下达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国军民“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有所准备”[2]。应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要求，中方向越南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后勤保障等支援部队。1965年6月至1968年3月，先后入越的部队达32万余人，他们同越南军民一道，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越南北方的领空和交通运输线。援越抗美斗争，体现了中国人民反对侵略威胁、维护世界和平的大无畏精神。

中苏论战和反对大国沙文主义

在同美国霸权主义展开斗争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坚决顶住了来自苏联的巨大压力。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之



★ 1958年7月31日至8月3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问中国。8月3日，毛泽东、赫鲁晓夫签署会谈公报。

① 张治中给陈诚的信，1963年1月4日。

②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1965年4月1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7页。

间的矛盾和冲突日渐加剧。这些矛盾和冲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分歧；另一方面是苏联党以“老子党”自居，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和外交上服从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

1958年，苏联提出要在中国领土和领海上建立中苏共有共管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这些涉及中国主权的要求，当即遭到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的坚决拒绝。毛泽东后来说，中苏闹翻实际上是在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1959年8月，中印第一次边境冲突，苏方不问是非曲直，发表偏袒印度的声明，把中苏分歧公之于世。9月底，赫鲁晓夫访美后赴北京参加中国国庆10周年庆典。为了压中国向美国让步，以利于苏美改善关系，他在同中方领导人会谈时，要求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中国当然不能接受，会谈不欢而散。这年12月，毛泽东在思考国际形势和对策时提出了“修正主义是否已经成了系统”的问题。

1960年4月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集中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观点，点名批判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实际上对赫鲁晓夫的某些观点进行不指名的批驳。6月，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激烈攻击，中国共产党未向这种压力屈服。会后，苏联政府突然于7月照会中国，单方面决定立即召回在我国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这一系列蓄意恶化中苏关系的行为，使中国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增加了当时的严重经济困难，也极大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给两国关系造成难以弥合的创伤。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后，两党之间意识形态的争论愈演愈烈。苏共领导人、苏联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和公开信，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党。中共中央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总称为《关于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的论战》的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通常简称“九评”），全面批评苏共的对外对内政策。“九评”的基本结论是：“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故乡，在具有几十年建设社会主义历史的苏联，也发生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党和国家领导的事件，也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这是帝国主义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结果。“九评”指名批判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全面批评苏共“全民党”“全民国家”及各种内政外交政策。与此同时，苏联方面也发表了一系列论战文章。中苏论战达到高潮。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中共抱着改善关系的愿望，派周恩来赴苏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但勃列日涅夫继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声称苏联将继续坚持原来的立场。其后，还向中苏边境不断增兵，并且向邻近中国的蒙古派驻苏军。1966年3月苏共召开二十三大，中国共产党决定不派代表出席，中苏两党关系基本中断。

中苏论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并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和许多国家共产党的分裂。这场论战严重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进而又影响到对国内形势的判断。党认为苏联出了修正主义，中国国内也可能出修正主义，于是在国内造成反修防修的巨大声势。回顾这场论战的历史，邓小平总结说：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①]。我们过去也并不都是对的，对别国党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这些外国同志也说，正确的并不都在他们方面[②]。“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③]

---

① 邓小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② 邓小平：《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9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44页。

在中苏两党发生意识形态分歧之后，苏联领导人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这使得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斗争。正如邓小平所说：“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①]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坚持各党各国独立自主的原则，反对大党大国对其他党、其他国家的不平等做法和霸权主义，坚决顶住来自苏联的巨大压力，维护了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党的尊严。

七、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总结

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十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无可否认的巨大成就，但也历经曲折甚至遭受过严重挫折。无论是成就还是失误，都是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获得和发生的。正确地加以总结，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都是党的宝贵财富。

十年建设成就和探索中积累的主要经验

十年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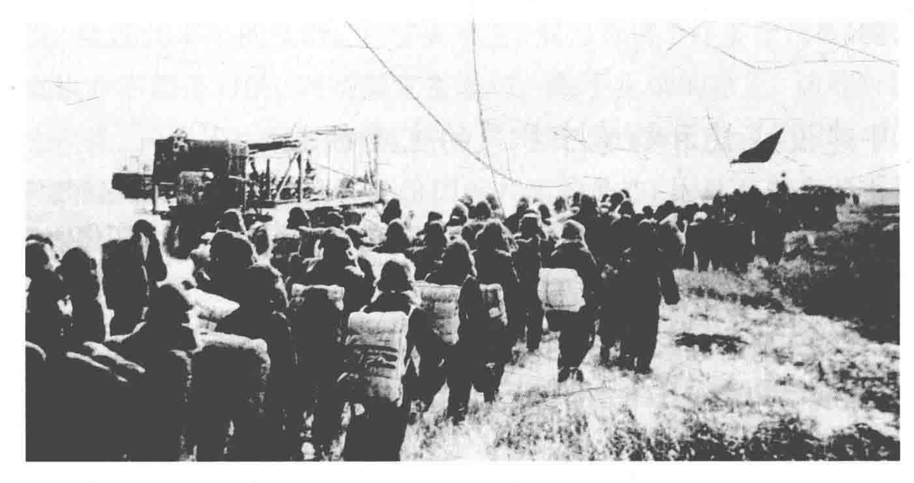
在工业建设方面，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一五”时期以156项工程为中心的一大批建设项目在这一时期竣工投产，为初步建成具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打下了基础。以1965年同1957

---

① 邓小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4—295页。

年相比，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按原值计算，增长了1.76倍。这一时期，武钢和包钢等十大钢铁厂、有色金属冶炼厂、几十个煤炭企业和发电厂等一批重要企业新建和扩建起来；电子、石油化工、原子能、航天等新兴工业部门从无到有或从小到大逐步得到发展；在机械工业方面分别形成了冶金、采矿、电站、石化等工业设备制造以及飞机、汽车、工程机械制造等十几个基本行业，并且能够独立设计和制造一部分现代化大型设备；支援农业的工业有了很大发展，从1957年到1965年，农业机械总动力由121万千瓦增加到1099万千瓦，化肥施用量由37.3万吨增加到194.2万吨，农村用电量由1.4亿千瓦小时增加到37.1亿千瓦小时；三线建设进展顺利，工业的地区布局和门类结构进一步改善。尽管这个时期发生了“大跃进”运动，给工农业生产和其他事业造成极大的破坏和浪费，但多方面的建设也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十年间，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取得了突出成就。1959年东北松辽盆地发现工业性油流后，党中央在1960年经济困难之时果断作出石油大会战的决定。几万名来自全国30余个石油厂矿、院校的石油职工和退伍军人在茫茫大草原上艰苦奋战，在3年多时间里建设起我国最大的石油基地——大庆油田。随后，还开发了胜利油田和大港油田。到1965年底，我国实现石油全部自给，大庆油田提供的高产原油起了决定性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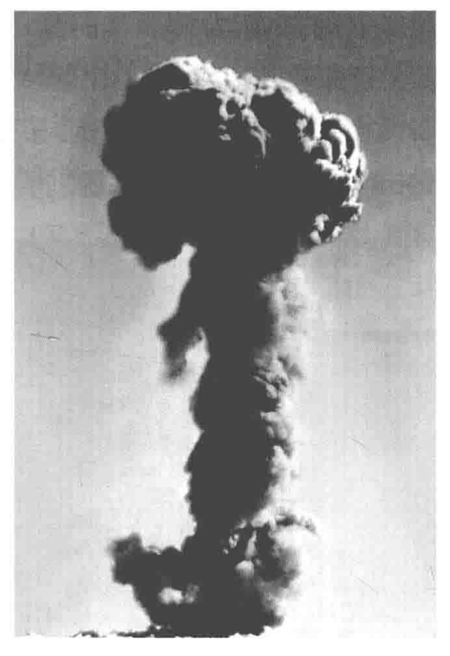


★ 参加石油大会战的队伍向大庆地区挺进。

交通运输业有了长足发展。从1958年到1965年，全国新增铁路营业里程9698公里。全国除西藏自治区以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了铁路，福建、宁夏、青海、新疆等省区第一次通了火车。公路、水运、航空等事业也有较大发展，全国大部分县、镇通了汽车，沿海港口新增34个万吨级泊位，远洋航运开辟了通往东南亚、欧洲和非洲的3条航线。

农田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广大人民群众坚持长期不懈地大规模兴修水利，发展农田灌溉，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这一时期建成的安徽省的淠史杭、内蒙古自治区的三盛公、北京市的京密引水等以灌溉为主的大型枢纽骨干工程，以及各种类型的水库，不仅在当时发挥了作用，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发挥着效益。1963年至1965年，全国平均每年增加灌溉面积50.2万公顷。到1965年，全国有效灌溉面积达3305.5万公顷，比1957年的2733.9万公顷增加571.6万公顷，增长21%[①]。此外，在植树造林、推广优良品种、控制水土流失、建立气象预报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

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成绩十分显著。1958年9月，经党中央批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合并，正式成立全国科技工作者的统一组织——中国科学技术协会。1956年制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提前完成，新的十年（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在1963年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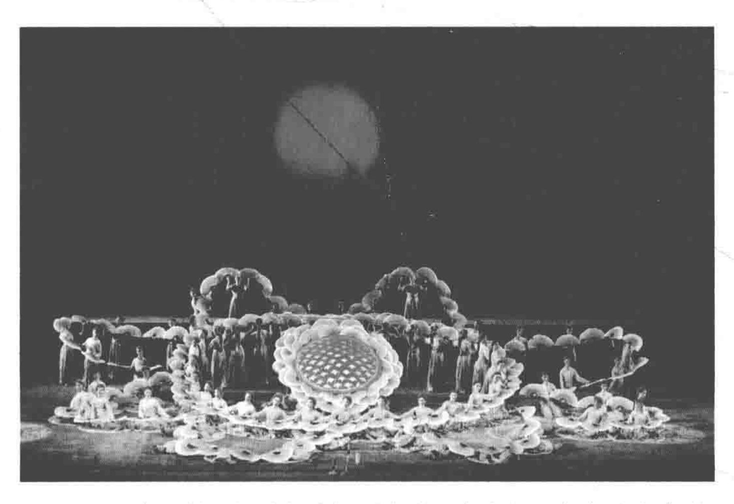


★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①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农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447页。

定。为了抵御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打破大国的核讹诈、核垄断，党中央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作出研制“两弹一星”、重点突破国防尖端技术的重大决策。1962年11月，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首，包括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在内的十五人专门委员会，负责组织和领导“两弹一星”的研制。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此外，基础科学研究也有进展。例如，1965年我国在国际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

教育、卫生、新闻出版、文化艺术、体育等项事业的成就相当可观。1957年至1966年，全国高等学校毕业生累计达139.2万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累计达211.1万人，分别为1950年至1956年的4.9倍和2.4倍。医疗卫生机构由12万多个增加到20.7万多个，全国城乡的卫生医疗网基本形成。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天花、霍乱、血吸虫病、疟疾、鼠疫、麻风病等疾病，或被灭绝，或得到有效防治。十年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取得巨大成绩，《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于1960年9月出版，1965年还出版了《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鲁迅全集》新的注释本10卷本于1958年全部出齐。1958年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着



★ 1964年10月，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首次公演。

手制定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的长期规划。中华书局从1959年起开始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到1965年，《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的新点校本先后出版。1965年，全国图书总印数为21.7亿册，刊物总印数为4.4亿册，报纸总印数为47.4亿份，分别比1956年增长21.9%、25.7%和81.6%。1966年，全国拥有78座电台、13座电视台，全国96%的县通了有线广播。全国文化艺术、文物单位由1956年的14408个增加到1965年的27210个。十年间，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大量涌现，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更是这一时期的经典。群众性体育活动普遍开展，中国运动员共获得13项世界冠军，打破和超过145项世界纪录。

党的民族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迈出较大步伐。许多地方建立起钢铁、机械、电力、煤炭、石油、化工、轻工、交通运输、森工等中小型工业项目，内蒙古、新疆、广西、青海等省、自治区还兴建了一些大型的现代工业基地。少数民族地区结束了没有现代工业的历史，单一的经济结构开始得到改变。一批高等学校在民族地区建立起来，当地建设所需的各类专门人才得到培养，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得到长足发展。继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后，1958年3月和10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相继成立。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



★ 1959年4月22日，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在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郑重宣告：“我们西藏永远是中国的西藏。”

大规模武装叛乱，波及西北、西南五省区。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西藏人民的支持下，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彻底平息了叛乱，并且着手实行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百万农奴和奴隶翻身得解放。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这是党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变革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

十年间，我国培养了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的专门人才。到1966年，全国仅自然科学技术工作者队伍即达245.8万人[1]。大批人才在经济、教育、科技、文艺、医疗卫生、体育等各个领域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其中大部分人在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成为各方面的骨干力量。

党的建设得到加强，党的队伍得到进一步发展。1956年八大召开时，全国共有党员1073万，到1965年底发展到1895万，党员人数增加了76.61%。党进一步关注执政党建设问题，在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上取得了一定成绩。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前期，党中央、毛泽东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出发，提出要防止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强调大力培养和提拔新生力量，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并开始采取切实措施，将一批优秀中青年干部提拔到省、地、县各级领导岗位。这对于党和国家的长远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军队建设取得显著成绩。在政治思想建设上，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军开展“两忆三查”、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和“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加强部队革命化建设，涌现出南京路上好八连、硬骨头六连、雷锋等先进典型；各级领导下连队当兵，全军出现了深入基层、狠抓基层的新气象。在军事训练中，在全军推广郭兴福练兵法，掀起群众性的大练兵、大比武热潮，促进了军事训练的深入开展和部

---

①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人事管理》（下），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



★ 1964年6月，在人民解放军开展全军大比武活动中，毛泽东观看国产自动步枪。

队战斗力的提高。在科研工作中，成功研制原子弹和一大批海、陆、空军现代化武器装备，建立了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赖以发展的国防工业体系。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保卫国家安全作战中，胜利完成了平定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和炮击金门、粉碎国民党军窜犯袭扰等作战任务，扎实做好抵抗外来侵略的准备，履行了神圣使命。人民解放军在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和抢险救灾、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赢得了全国人民的爱戴和拥护。

党在领导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经过十年探索，形成了许多正确的认识成果，也积累了一些可贵经验。

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建设社会主义；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要扩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注意科学地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民主方面的某些形式和方法；在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上既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又重点反对大汉族主义，发展和巩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大力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国家政治生活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既要反对保守又要反对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改善人民生活与经济建设应当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要从全国有六亿人口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要勤俭办一切事业；要注意发展农业多种经营；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科学的部分。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提出生产关系的变革不能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尊重价值规律，坚持按劳分配；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正确处理好中央同地方的关系，给地方和企业以一定的权力，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提出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在企业内部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两参一改三结合”[①]的管理体制；试办托拉斯，改善企业经营管理；在农业方面试行生产责任制；实行两种劳动制度[②]。

关于教育、科技、文化工作。提出在繁荣文艺、发展学术方面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实行两种教育制度[③]；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指出科学技术现代化在我国现代化中具有关键性作用。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提出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提出实现“四个现代

① “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工人群众、技术人员、领导干部三结合。

② 两种劳动制度，即全日制的劳动制度和半工半读或半农半读的劳动制度。

③ 两种教育制度，即全日制的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或半农半读的教育制度。

化”的总任务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步骤；经过“大跃进”的严重挫折后，对社会主义的长期性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设想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估计建设社会主义强国需要一百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关于党的建设。着重提出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加强党内监督，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20世纪60年代前期，党中央还总结“大跃进”的教训，先后制定一系列工作条例草案，比较系统地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或比较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

上述探索中积累的正确和比较正确的认识、基本经验和政策思想，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的实践中取得的。这些成果中的相当一部分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仍然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实践中发挥作用，并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进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对实行改革开放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总结这十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各项工作，正如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创业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投身于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抒写了无数改天换地的壮丽诗篇，展现了十分可贵的团结奋斗的精神风貌。在建设进程比较顺利的时候，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锐意进取，斗志昂扬。在国内发生严重经济困难时，党中央以

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及时把情况告诉人民，公开进行自我批评，努力调整政策，纠正错误。尽管党的工作出现那么大的失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遇重大挫折，物质生活遇到很大困难，广大人民仍然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把战胜困难、争取经济好转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党的领导身上。因为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党。在艰苦的岁月里，领袖和人民，干部和群众，总是休戚与共，同甘共苦，一起渡过难关。



★ 王进喜和工人们用身体搅拌水泥，制伏井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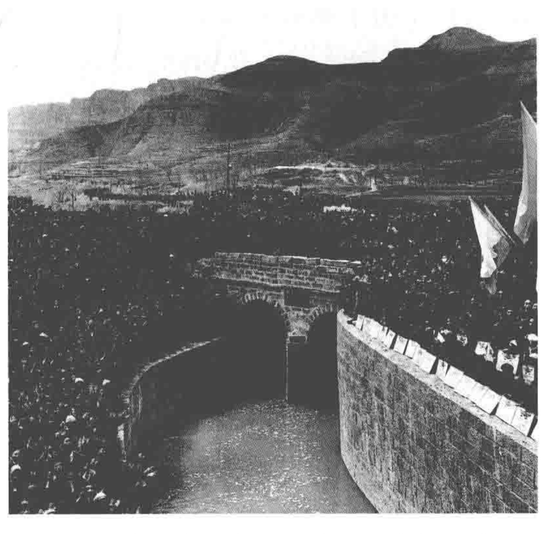
★ 1963年，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在遭到特大洪水灾害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重建家园。

在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中，党和人民顶住外来的种种压力，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涌现出无数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人物，形成了具有特定内涵的时代精神。以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石油工人、科技人员和干部，喊出了“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口号，吃大苦，

耐大劳，坚持“三老”“四严”“四个一样”[①]，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精神风貌，铸就了铁人精神。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等共产党员，带领群众艰苦奋斗，向“七沟八梁一面坡”的贫瘠土地开战，连年战胜严重自然灾害，使生产获得很大发展。全国上下掀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热潮。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自己，带领全县人民摆脱贫困面貌，鞠躬尽瘁，“生也沙丘，死也沙丘”，展现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形象。河南林县人民在县委领导下，经过几年苦战，开凿太行山，引漳河水入境，修建了“人造天河”红旗



★ 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



★ 1966年，林县人民在总干渠分闸工地庆祝红旗渠一期工程竣工。

① “三老”“四严”“四个一样”，即对待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对待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白天和黑天干工作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干工作一个样，领导在不在场干工作一个样，有没有人检查干工作一个样。



★ 沈阳军区工程兵某部运输连班长雷锋。



★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

渠，彻底告别“水缺贵如油”的历史，创造了人间奇迹。沈阳军区工程兵某部运输连班长雷锋，理想信念坚定，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甘当螺丝钉”，勇于奉献，乐于助人，表现出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以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华罗庚、邓稼先、茅以升等为代表的一批著名科学家辛勤工作，为祖国的科技事业和经济文化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那时开始形成的“两弹一星”精神，至今仍给人们勇攀科学高峰以强大动力。

中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前期，是一个艰辛探索和积极进取的年代，是一个艰苦奋斗和意气风发的年代。带有那个时代特色的社会风尚和精神面貌，铭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史册上，弥足珍贵，永远不会过时。

探索中的挫折及其原因

社会主义建设是极其艰巨复杂的，是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业，党的探索不可能那样顺利地沿着一条笔直的大道通往认识的自由王

国。既然是探索，就很难避免会有失误和挫折。

十年中，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过严重的失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建设速度急于求成和所有制关系上盲目求纯的错误，曾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生产力遭受破坏，人民生活遇到很大困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问题上出现严重失误，发生了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到庐山会议“反右倾”斗争，再到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的一系列“左”倾错误，在政治上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生的严重失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不长，党在全国范围执政的时间不长，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真正弄清楚。十年中出现的一些脱离实际、超越阶段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许多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片面理解或教条化的结果。由于党对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实践经验，一方面，依靠群众大搞突击运动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被认为是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法宝，过去的成功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教条化、绝对化。另一方面，党在执政过程中，一遇到突发事件和思想认识上的分歧，时常会像战争年代那样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作是阶级斗争，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实行封锁和孤立政策；苏联在中苏关系恶化后对中国施加巨大压力，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台湾国民党当局在美国支持下，一直在叫嚣反攻大陆。这种严峻的外部环境和压力对党在确定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以及各项方针政策时产生影响。党在正确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面时，也在一定时期内对战争威胁和对“和平演变”的危险作了过于严重的估

计和过度反应，对党内、国内政治形势特别是阶级斗争状况严重性和危险性作出过分的不符合实际的估量。这就容易使人产生和接受国内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的错误论点。这也是阶级斗争扩大化迷误一再发生的原因之一。

十年探索中发生严重失误，党的主要领导人和中央领导集体负有重要责任，而根本原因在于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存在弊端。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建设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党内民主制度很不健全。从50年代后期开始，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逐渐不正常，个人专断、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现象滋长起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检法机关分工负责、互相制约等原则逐渐遭到质疑和批判，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被削弱。在缺乏有效监督制约机制的情况下，党难于及时防止和纠正探索过程中出现的重大失误。正是这十年间“左”的错误在实践和理论上的积累和发展，导致了此后“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错误的发生。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对内乱的抵制与抗争

本章提要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场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使党和国家的工作、社会秩序受到巨大破坏，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教训极其深刻。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在党的领导层内，在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中，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的抵制和抗争不断发展起来。这期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仍取得进展，外交工作也打开了新局面。1976年10月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粉碎“四人帮”，党依靠自己的力量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证明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全面内乱

1966年，正当我国克服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完成经济调整任务、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是当时的称呼，实际上它根本不能称为革命，而只是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场内乱。这场"大革命"之所以被冠以"文化"二字，是因为它由文化领域的批判开始。

"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左"倾错误批判不断升级的背景下，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该文是江青到上海秘密组织策划的，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毫无根据地把他响应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于1960年写的《海瑞罢官》一剧中描述明朝历史上海瑞所进行的"退田""平冤狱"，同1962年受到指责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作了猛烈的政治攻击。该文实际上涉及几年来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攻击的矛头并不仅限于吴晗。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普遍反感，也受到中央有关部门和北京市委的冷遇，《人民日报》和北京各报十多天没有转载。这加深了毛泽东对北京市委和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的怀疑和不满，认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是吴晗的后台，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认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是影射1959年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这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此后，批判迅速升级，涉及的范围急剧扩大。

1966年2月初，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提纲虽也有许多在当时环境下难以避免的“左”的提法，但其主旨是试图把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下，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对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约束，不赞成把它变为严重的政治批判。这个提纲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并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后，于2月12日转发全党。“二月提纲”发出后的一段时间里，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批判运动有所缓和，这引起了江青等人的极度不满。此后，围绕着“二月提纲”，开始了一场新的、更严重的斗争。斗争的范围，从意识形态领域扩大到政治领域和党的高级领导机关；斗争的焦点，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转移到对“二月提纲”的否定；斗争的对象，从《海瑞罢官》、“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转移到“支持”“包庇”他们的“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这场批判也就更加明确、直接地和“中央出修正主义”联系起来了。

江青看到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受到抵制，在取得中央军委副主

席、国防部部长林彪的支持后，于2月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纪要》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的文艺工作的巨大成绩，认定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这个《纪要》经过毛泽东的修改审定。它提出的种种严重政治责难不仅是对着文艺界，而且是对着一些中央领导人的。

与批判《海瑞罢官》大体同时，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被加以“篡军反党”等罪名，遭到软禁；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遭到诬陷，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1966年3月底，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被指责为包庇坏人，压制左派。随即，彭真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被停止工作。这些接连发生在党和国家高级领导层的严重政治事件，同报刊上气势汹汹的政治批判相呼应，在党内外引起强烈震动，造成到处都有“阶级斗争”的紧张空气，造成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的巨大错觉。

5月15日，遵照毛泽东关于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为防止突发事变，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的安全。几天后，首都工作组为加强首都警卫力量，进行了部队调动，并重新调整了对在京要害部门和广播宣传机关的保卫工作。

两次中央会议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召开了两次中央会议。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并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

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认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些尖锐的判断都是毛泽东加写上去的，集中反映了他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严重错误估计。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党的最高领导层，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依据。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批判，决定停止他们的领导职务。林彪在会上的讲话大肆散布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的言论，竭力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以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这个小组实际上逐步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直接指挥“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机构。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标志，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会后，“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开展起来。

从5月下旬起，北京市大、中学校的学生率先响应号召，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5月25日，北京大学贴出了后来被毛泽东称作“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向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发难。6月1日，新华社播发了这张大字报。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打倒“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6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这些非常措施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在很短时间里，学生造反组织蜂拥而起，到处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许多学校的党组织陷于被动以至瘫痪。一些党政机关也受到冲击，社会动乱开始出现。

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对运动造成的混乱状况采取赞赏态度。他在6月写的一首诗中说：“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认为这是人民用“风雷”扫除修正主义“败叶”的一场革命。他在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又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这种说法

把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并要在人民掌权的情况下，不断地通过“天下大乱”的方法达到“天下大治”。这既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又违背了中国实际，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邓小平后来明确地讲过：“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长久以来，毛泽东以对马克思主义、对人民利益的忠诚，不断观察和思考新兴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努力追求实现一种完美的社会主义理想。他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在他对于社会主义的一些独特构想中，既有一些宝贵的预见，但也有一些脱离实际的空想。他在当年5月7日的一个批示信中勾画了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的蓝图，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又批判资产阶级的大学校，办成逐步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逐步限制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这种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构想，事实上是行不通的。作为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毛泽东极为关注艰难缔造的党和人民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努力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这是十分可贵和富有远见的。他为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现象和特权、官僚主义等脱离群众现象所做的坚持不懈的斗争，也一直赢得党和群众的拥护、支持。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失误和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认识，毛泽东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这时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他把不赞同自己的意见、提出某些正确主张的一些中央领导人，看成是在搞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过去开展的“四清”“五反”等运动已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公开地、全

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毛泽东在当年5月一次谈话中说：“有的时候我也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①]一个月后，他又说：“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②]由于他对形势的估计和他的理论、政策、方法都是错误的，结果只能事与愿违，造成全国范围的内乱。

为在运动中维护和坚持党的领导，保持社会稳定，6月上旬，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央作出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党组织领导运动，并拟定了有领导有秩序开展运动的八条要求，力图使局势稳定下来。各地工作组在领导运动的过程中，得到多数群众的支持，同时加剧了同造反派的对立。在如何对待运动的问题上，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分歧日趋尖锐。江青、陈伯达、康生先是在学生中进行挑拨，又向毛泽东作了片面汇报。毛泽东改变了原先同意派工作组的主张，严厉指责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刘少奇、邓小平对此承担了责任，作了检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于7月26日决定撤销工作组。

毛泽东认为，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刚刚兴起的“大革命”有被压下去的危险，为排除“阻力”必须再作一次全面发动。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在8月4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他严厉地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路线错误”。会议简报印发毛泽东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

① 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谈话，1966年5月5日。

② 毛泽东同胡志明的谈话，1966年6月10日。

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大字报还针对过去党的领导层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争论说：“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虽未点名，但明显地是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等一些领导人。从批判《海瑞罢官》到发出“五一六通知”再到这张大字报，斗争对象不断升级，这时终于点明了这场“大革命”的主要锋芒所向。

全会根据毛泽东意见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对于运动的对象、依靠力量、方法等根本性问题作了有严重错误的规定。例如，“十六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文件强调青少年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场运动只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出乱子；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等等。“十六条”同“五一六通知”一样，没有对“走资派”“左派”“右派”这些概念提出明确的判别标准，没有对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作出具体规定。虽然它也提出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等，但这些原则性规定在后来的运动中无法落实，也从未被遵守，照此办理的反被指责为“不准革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那些具有很大任意性的概念和助长过火斗争的内容，却在很大范围内激化了盲目的造反行动和严重的社会动乱。

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常委由原来

的7人扩大为11人，增加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林彪排在毛泽东之后；刘少奇则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以后只有林彪被称为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都不再提及。原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是由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调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任中宣部部长的，但他在进入政治局常委后不久就被排斥（后来被迫害致死）。李富春不久后也遭排斥。会议期间和会后，刘少奇、邓小平等一些中央领导人相继受到批判，毛泽东"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这次中央全会通过的"十六条"等决定，在党内完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法定程序。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发动，党内之所以能够接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观点，运动初期之所以有那么多干部、群众投身其中，有着复杂的原因。我们党是经过长期残酷的战争后迅速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对于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科学认识，也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下来的成功的阶级斗争经验，使人们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新矛盾时容易沿用和照搬，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作阶级斗争，把只在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仍然看作社会的主要矛盾，并运用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解决。战争时期在革命队伍里行之有效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经验，也容易用来作为规划理想社会的某种依据。对马列著作中某些论点的误解或教条化，使人们日益陷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之中。建国以来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未能顺利发展，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到这时，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的威望达到高峰，从而使为人民热爱的领袖所犯的错误难以得到纠正，也使林彪、江青这些野心家能够受到信任而得势横行。这些因素聚集在一起，使党终于无法制止"文化大革命"这场严重灾难的发生

和发展。

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当天，毛泽东写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一封信，表示对他们造反精神的热烈支持。随之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猛兴起。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各地红卫兵很快纷纷走上街头，从破除"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展到抄家、打人、砸物。大量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国家文物遭受严重破坏，造成巨大的文化浩劫。从8月中旬开始的全国红卫兵大串连，使动乱迅速遍及全国。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在北京连续8次共接见约1100万红卫兵和学校师生。各地学生纷纷到北京和其他城市进行串连，10月份全国在路上奔波串连的人数将近3000万人。

在中央文革小组煽起的所谓捍卫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狂热下，各地造反组织冲向文化教育界和党政机关，冲向社会，对他们认定的所谓"封、资、修"事物进行大破坏。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的许多人，被当作"黑帮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斗和侮辱。许多长期同党合作共事的爱国民主人士、原工商业者和归国侨胞也受到种种冲击和迫害。造反组织对社会秩序和民主法制的破坏，引起各地党组织和许多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抵制。但是，这种不满和抵制当时却被认为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初，党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造反狂潮扩展到工厂农村。党政领导干部对于这种局势深感忧虑，不满和抵触情绪日益增加。

"文化大革命"表面上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但并未得到多数干部和工农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为进一步克服运动的"阻力"，从10月上旬至下旬，中央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继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对"文化大革命"的再一次发动。会议着重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一条"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说这是反对让

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陈伯达在讲话中对刘少奇、邓小平在运动初期确定的方针和措施进行无限上纲的批判，极力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中央文革小组不仅策动造反派把攻击的矛头集中转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并且指使他们在社会上贴出“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和攻击邓小平的大字报。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受到批斗，机关工作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此后，种种越轨不法行为都可以不受约束，对那些不法行为的干预都被加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社会越来越深地陷于动乱之中。

1966年11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座谈会上，与会同志都主张工交企业的运动由党委统一领导，要求正确处理革命和生产的关系，不能停产闹革命，群情激愤地否定了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一个极左的条例草案。但这却受到林彪、江青的蛮横指责。在他们的干预下，用中央名义发出在工交系统和在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文件（简称“工业十条”和“农业十条”），改变了运动只限于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的原定部署，把运动扩展到工厂农村，并且同大、中学校的学生造反浪潮联系起来，严重地干扰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进行。这是导致全国大动乱的又一个严重步骤。

“全面夺权”导致全面内乱和对内乱的抵制

1966年12月下旬，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提出，要在1967年展开“全面的阶级斗争”。据此，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1月初，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上海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领导权。毛泽东对此予以高度评价，错误地赞扬说：“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

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在上海夺权的带动下，各地掀起由造反派夺取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乃至各工厂、农村领导机构权力的"一月革命"风暴，"文化大革命"由此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从1月中下旬起，山西、青岛、贵州、黑龙江等地的造反派组织先后宣告夺了省、市委，省、市人委的党、政、财、文领导权，得到中央的认可。夺权狂潮一经引发便不可收拾，名目繁多的造反派组织各立山头，为夺权展开激烈武斗，很快发展为"打倒一切"以至"全面内战"的严重局面。

面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造成的空前混乱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在党的领导层内和广大干部群众中，始终存在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这种抵制和抗争，或表现为对"文化大革命"持消极态度，在各自的岗位上坚持工作和生产；或表现为对武斗、破坏持抗议立场，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严厉批评。1967年在老一辈革命家中爆发的二月抗争就是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这年1月19日、20日召开的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坚持军队要保持稳定，不能像地方一样开展"四大"，奋起抨击江青、康生、陈伯达鼓吹军队应和地方一样搞运动的主张。2月中旬，在周恩来主持、有许多政治局委员参加的怀仁堂中央碰头会上，再次爆发了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的激烈斗争。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同志，围绕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广大老干部、要不要稳定军队等"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拍案而起，接连激愤地质问中央文革小组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叶剑英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谭震林说："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形而上学！"这些老同志的抗争被诬为"二月逆流"，受到严厉批判。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继1966年下半年逐渐在实际上



★ 中南海怀仁堂外景。

取代中央书记处后，又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职能。老一辈革命家的二月抗争，代表了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意愿，击中了“文化大革命”的要害，打击了江青等人的气焰。这种正义的抗争尽管暂时遭到压制，但它没有被压倒，仍在不断积蓄。

二月抗争遭到批判后，江青等人趁机煽动群众“反击自上而下复辟逆流”，掀起更大规模的揪斗领导干部、冲击领导机关的狂潮。1967年3月30日，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写的实际上等于点名批判刘少奇的文章为开端，制造了一个从多方面攻击“中国的赫鲁晓夫”的所谓“革命大批判”高潮。这种大批判极尽造谣、诬陷之能事，混淆是非，混淆敌我，助长“左”倾思潮，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同时，在全面夺权中，为攫取更多的权力，造反派组织相互之间的武斗不断升级。

毛泽东虽然鼓励夺权，表示支持“天下大乱”，但是对出现这样严重的混乱状况也感到忧虑。1967年1月至3月，毛泽东先后决定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支持造反派（即“左派”）夺权，一方面也是为了对动乱局面有所约束。当时的报刊连续发表社论、文章，反复宣传毛泽东关于夺权的指导方针：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

"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的"三结合"。在夺权后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称为"革命委员会"。为了实现这种"大联合"和"三结合"，要求正确对待革命干部、正确对待"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正确对待人民解放军；各群众组织要多做自我批评；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等等。为了稳定局势，中央还发布一系列的通知、指示，要求学校师生停止大串连、复课闹革命；要求厂矿企业、农村生产队坚持业余闹革命、抓革命促生产；要求维护铁路、港口、交通运输秩序，保护电台、银行、仓库、监狱；对一些最乱的省、市和党政部门实行军事管制，等等。在毛泽东的支持下，1967年春周恩来主持成立国务院业务组，承担国务院日常工作。

7月底到8月初，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北京和外地的上千个造反派组织先后纠集几十万人围困中南海，上百个高音喇叭昼夜喧叫，冲击国家最高领导机关，要求"揪斗"刘少奇。7月22日江青向造反派组织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公然煽动武斗。公安部部长谢富治8月7日发表讲话，公开煽动"砸烂公检法"。同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发表讲话，煽动夺外交部的权。8月上旬，在上海、南京、郑州、长春、沈阳、重庆、长沙等地相继发生大规模武斗，造成大批人员伤亡的流血事件。许多地方连续发生抢劫银行、仓库、车船、机要档案文件，破坏铁路交通等恶性事件。全国的公安、检察、法院等司法机关遭到更大的冲击。造反派以外交部名义向我国驻外机构滥发造反指示，并制造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等严重涉外事件。在此期间，报纸上不断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不少地方的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和部队的事件急剧增加。"全面内战"使广大人民群众对"左"倾错误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不满更加强烈。7月20日，武汉数十万军民示威游行，并围困中央文革小组代表王力等（当时毛泽东正在武汉），就是这种强烈情绪的大爆发。局势的发展，已到了几乎失去控制的地步。1967年7、8、9月三个月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国家动乱最剧

烈、社会灾难最严重的阶段。

为制止动乱，8月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等中央文革小组骨干分子实行隔离审查，1968年1月又对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纠正了一些“左”的口号，提出要警惕煽动极左行为的“黑手”和“反革命”，批发了多项措辞严厉的命令、布告，对一些顽固的武斗分子采取断然措施，以制止武斗蔓延，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财产。

1967年7月至9月，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沿途就“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制止动乱、实现群众组织大联合、解放干部等问题发表重要谈话。10月，中央发出毛泽东谈话记录。这个谈话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针对造反派山头林立、冲突不已的情况，重申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他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他还批评红卫兵说，“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对他们进行教育。针对大批干部被打倒的情况，毛泽东重申要“正确地对待干部”，“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和各省、市分期分批举办轮训干部和群众组织负责人的学习班。有一批干部从受审查中解脱出来。报刊上加强了对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某些过左的做法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毛泽东领导采取的这些措施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对于制止局势继续恶化起了一定作用。

从1967年冬到1968年春，社会动乱相对趋于缓和。在极左思潮和极左分子受到一定遏制的背景下，干部和群众中怀疑“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情绪迅速地发展起来，不时出现否定“一月夺权”、否定反“二月逆流”、为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鸣不平的言论。上海、北京出现批判陈伯达、康生，打倒张春桥、谢富治的大字报。外交部91名领导干部贴出大字报，批判“打倒陈毅”的口号，要求陈毅回部

主持工作。2月底，国防科委党委常委会针对当时两派对党委领导的"革"与"保"的激烈争论，明确提出要"拥护以聂荣臻同志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这类情况的不断发生，引起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的恐慌。从1968年4月以后，在他们的操纵下，报刊上又开始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对"右倾翻案风"的文章。在反对"右倾翻案风"的煽动下，刚刚有所收敛的无政府主义狂潮再度掀起，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和武斗流血事件重新加剧，一些地区的局势再度恶化。毛泽东不得不再一次采取紧急措施加以制止。7月27日，他指示有关部门组织由工人、解放军指战员组成的"宣传队"进驻学校，领导学校。

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几个很著名的造反派头头的谈话中，批评他们大搞武斗的错误说："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针对造反派提出的所谓"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于陕西"的说法，毛泽东警告：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8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工人和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后，开始进行恢复学校教学秩序的工作。中央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有力地平息了武斗，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动乱。从此时起，虽然还有反复，但就全国来看，形势开始趋于稳定，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开始逐渐恢复。

经过20个月社会大动乱的几次反复，至1968年9月，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勉强成立革命委员会。革委会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前期的无政府状态，承担起组织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管理的责任，对恢复某些日常工作、稳定社会秩序起了一定作用。但是，革委会是在"全面夺权"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建立过程又是各派造反组织争权夺利的过程。它的建立以



★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挂牌情景。

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党政领导体制为前提，集党和政府权力于一身，形成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领导体制，导致了更高程度的集权。这实际上是国家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的一次重大倒退。革委会体制的弊端及其成分的严重不纯，加之它在各项工作中贯彻执行的“左”的方针政策，不能不给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继续造成很大损害。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后，毛泽东决定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为给党的九大做准备，于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了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这次会议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的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因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党分子”“里通外国分子”而被剥夺出席会议权利的，占总数的52.7%。被允许出席的中央委员中许多人是刚刚从被审查的状态中

解脱出来的。八届中央委员总数为97人，除去世者外，到会者只有40人，不足半数，只能从被允许出席的候补中央委员中增补10人为中央委员，才使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人数刚刚超过半数。八届候补中央委员98人，除增补为中央委员10人和去世12人外，只有9人出席会议。而被扩大吸收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等的总数达74人，占出席会议人员总数的55%以上。

10月13日，毛泽东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要求全会讨论一下"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认为：这次"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估计运动"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他还谈到：邓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未发现有什么问题。会上，林彪、江青等人组织围攻参加过二月抗争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还组织攻击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等。

在全会闭幕式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党的九大应有"二月逆流"的人参加，对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等。他要求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要注意一个"准"字，不要搞逼供信那一套。会议期间，他还制止了林彪、江青等鼓噪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图谋。

全会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之下，没有经过证据核实和认真讨论，极其错误地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中央委员陈少敏在通过决议时拒绝举手。刘少奇在被审查期间受尽折磨，完全被剥夺了申辩的权利，于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开封含冤病逝。后来经认真复查，确凿的事实证明，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党和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起最大的冤案。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前的统计，因这个冤案受株连被判刑的达2.8万多人。

还在1967年3月，康生、江青就煽动所谓“抓叛徒”活动。各地造反派竞相组织各种各样的专案组，还制造了所谓“六十一人案件”“新疆叛徒集团案件”“东北叛徒集团案件”“南方叛徒集团案件”等冤假错案。许多过去在敌人统治下英勇斗争、坚贞不屈的老党员、老干部，冒着生命危险为党作了特殊贡献的党外人士，被加上所谓“叛徒”“特务”等罪名惨遭迫害，有些人被摧残致死。此外，在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中，还有许多无辜的干部、群众被加以“反革命”等罪名受到诬陷和迫害。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12人。当时，全国共有党员2200万人，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各部委党委以至基层党组织，都还没有恢复或建立，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九大的代表不可能从选举中产生，他们或由革命委员会与各造反派组织协商决定，或直接由上级部门指定。这使林彪、江青等人得以乘机把他们帮派体系的许多人封为大会代表，造成组织上的严重不纯。

毛泽东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希望党的九大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林彪代表党中央在这次大会上作政治报告。这篇由张春桥、姚文元主持起草的报告的基本思想，就是鼓吹所谓



★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被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最新发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一语,有它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定含义。它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左"倾错误观点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总概括,也是"文化大革命"总的指导思想。这个理论认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这是"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最重要的内容是要开展"文化大革命";它的核心在于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个理论违背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脱离甚至歪曲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的实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这次大会通过的党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写进总纲,而只字不提发展生产力,不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取消了有关党员权利的规定。党章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这种完全违反党的根本原则的做法,在党的历史上从来未有过。

党的九大开幕前夕的3月间,发生了苏联军队多次侵入我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的边境武装冲突事件。毛泽东在九大前的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着重谈了准备打仗问题。九大的政治报告对战争到来的可能性作了异常紧迫的估计,写上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内容。备战不仅成为九大的重要议题,而且成为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稍后,兴起了全国性的战备工作高潮。4月11日,毛泽东在大会秘书处和各组召集人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当前主要问题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一方面把敌人揪出来了,另一方面掩盖了打击面宽和扩大化的问题,希望对扩大化的问题有所约束。他号召全党团结起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这次大会选举了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重新被选入的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仅占原八届中央委员会总人数的

29%。许多功勋卓著、在广大党员中很有威信的老干部被排除在外。林彪、江青帮派体系中的一批骨干和亲信进入中央委员会。随后举行的党的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5人组成：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在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集团的骨干和亲信占半数以上。陈云、李富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虽然仍被选为中央委员，却被排斥在中央政治局之外。

党的九大自始至终为"左"倾思潮和个人崇拜的狂热气氛所笼罩。这次大会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系统化、合法化，提高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它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作用。

毛泽东曾经多次预计，"文化大革命"能在一两年、两三年内"胜利结束"。但动乱既起，即使对他这样有着崇高威望的领袖人物来说，也感到难以驾驭，多次预计都流于落空。在筹备九大过程中，毛泽东曾提议九大后不再设中央文革小组这个机构，原因是"文化大革命"要结束了。但是，党的九大的召开，没有像他所预计的那样使这场"大革命"以胜利的姿态趋向结束。恰恰相反，由于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加深，以及林彪、江青集团掌握了中央重要领导权，实际上存在着更深刻的危机，酝酿着更加复杂尖锐的斗争。

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和纠正极左思潮的努力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文化大革命"在党的九大后进入"巩固胜利成果"的阶段。这就要一方面通过全面的"斗、批、改"落实政策，加强团结，恢复国家的正常秩序，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

到基层；另一方面，按照"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但是，在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这些愿望根本无法实现。

"斗、批、改"运动

"斗、批、改"[1]的任务最先是在"十六条"中提出来的。党的九大以后，按照毛泽东的部署，这个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他认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这里虽然说的是工厂，实际上同样推行于其他各个领域。毛泽东亲自抓了北京的两所大学和六个工厂作为他指导"斗、批、改"的试点单位，要求各地按这些单位的经验仿照执行。他试图通过"斗、批、改"在各方面落实党的一些政策，清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影响，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达到"天下大治"，也含有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实际上是把"左"倾错误方针在各个领域里具体化。

"清理阶级队伍"被作为"斗、批、改"的一项主要工作，当时提出的矛头所针对的，一方面是所谓"走资派"和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另一方面是群众组织里的"坏头头"和"混进群众组织里的坏人"。在阶级斗争扩大化思想的指导下，在没有法律约束和党的有关政策被弃之不顾的背景下，"清理阶级队伍"带有强烈的主观随意性，往往成为派性争斗、挟嫌报私、排除异己、打击报复的堂皇理由。1968年下半年至1970年，"清理阶级队伍"在全国范围内达到高潮，许多人被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地诬为"阶级敌人"，被"群众专政"的人

---

① "斗、批、改"，即"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数迅速增加，又一次造成大批冤案。

“整党建党”是“斗、批、改”阶段一项重要任务。如何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使党永远代表人民的利益，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高度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整顿党的思想和组织被作为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1967年10月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随后这个批示被称为“五十字建党纲领”。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阶级斗争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把“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作为建党的唯一宗旨，对领导国家的经济、文化建设却只字不提；而当时所说的“阶级敌人”，主要是指所谓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这种建党方针显然是错误的。在整党建党中，要求党的组织按照这种方针进行整顿和吸收新党员，称其为“吐故纳新”。结果往往是一部分合格的党员不能恢复组织生活或被错误地开除党籍，而接纳的新党员中虽有一些各方面生产、工作的积极分子，但也有许多不合乎党员条件的造反派。1968年至1969年间，张春桥等人曾几次提出要用造反派组织取代党的组织。他们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在中央，在毛主席，何必要这个党委呢？”[①]“党究竟还要不要？是不是可以用群众组织代替党？”[②]毛泽东显然没有接受这种主张。由于指导方针的错误，这次整党建党问题很多。尽管如此，整党毕竟重新恢复了从中央各部门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恢复了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这对稳定局势、推进工农业生产，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教育革命”是“斗、批、改”的另一项重要内容。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等学校停止招生，大学“停课闹革命”长达四年之

---

① 张春桥在上海整党建党三个试点单位座谈会上的讲话，1969年6月15日。

② 张春桥在上海整党建党座谈会上的讲话，1968年。

久。根据毛泽东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1970年6月，党中央决定在部分高等学校进行恢复招生的试点。招生废除历来实行的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改为"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学制缩短为二至三年，学生被称为工农兵学员。以后，又确定他们学习期间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种"教育革命"带来的恶果是：学校的课程设置、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均以阶级斗争为主线；教师被置于受改造的地位，正常的师生关系和教学秩序被打乱；学员入学时很大一部分文化程度过低，教学质量难以保证。这种"革命"显然是违背教育规律的。同时，也应看到，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大多数教师还是恪尽职守，不少工农兵学员也经过刻苦努力取得一定的学习成绩，许多人后来在各项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总的说来，这种"教育革命"贻误了一代青少年的成长。

1971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由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的《会议纪要》。这个纪要提出所谓"两个估计"，即：新中国成立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毛泽东此前曾经指出：对17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路线的，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但是张春桥等人无视这些意见。他们写进《会议纪要》的这两个极端错误的估计，长时期成为教育战线领导、教师以及广大知识分子的沉重精神枷锁。

这一时期，还开展了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和服务行业处于停滞状态，城镇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就业，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随即掀起知识青



★ 1968年，北京青年告别亲友赴陕北农村插队落户。

年上山下乡的高潮。这个运动被宣传为具有“反修防修”“缩小三大差别”的重大政治意义。至1981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共达1600多万。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去，了解社会，接触工农，在艰苦的环境中，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为建设农村和开发、振兴祖国不发达地区作出了贡献，一些人成长为各条战线上的领导骨干和业务骨干。但是，大批知识青年失去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成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巨大困难。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达300多亿元。青年的家长和相关地区的农民也为此加重了负担。

在这个阶段，大批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高等院校教师、医疗卫生人员和文艺、体育工作者被下放到农村，或在各种“五七”干校从事体力劳动。他们虽然经受了劳动锻炼、增加了对农村的了解，但是长时期被排除在各项业务工作和科学文化研究之外，使他们不能用所学专业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此外，“斗、批、改”运动还包括诸如文艺革命、医疗卫生革命、商业革命、工厂管理革命等方面，涉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所有领

域。毛泽东本想通过"斗、批、改"胜利地结束"文化大革命"，但结果却是伤害了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使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紧张，社会秩序和国家工作很难有多大的好转。"斗、批、改"运动使"文化大革命"的内在矛盾更深刻地暴露出来。

九一三事件和纠正极左思潮的努力

党的九大以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争斗更趋激烈。这些野心家都是在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在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的条件下，为争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发展起来的。为了各自宗派的私利，他们根本不顾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断借机生事。这成为动乱持续不断的重要原因之一。

党的九大以后，毛泽东认为党的重建问题已经初步解决，希望在此基础上，在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下，解决政府的重建问题，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1970年3月7日，毛泽东提出召开四届全国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林彪集团把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看成是夺取更多权力的机会。他们有着狂妄的个人野心。由于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居于"副统帅"地位，这个集团的权势发展很快，经过党的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达到高峰。这时，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已正式写入党章；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都进入中央政治局并通过军委办事组掌握着日常的军队领导工作。因"文化大革命"而取得显赫地位的陈伯达，这时与江青的矛盾日趋尖锐转而投入林彪集团。他们企图利用召开四届全国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机会，夺取更大权力。毛泽东虽然多次明确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他不担任国家主席的意见，但1970年4月11日，林彪却一反"一贯紧跟"的常态，仍然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的意见。表面上，林彪建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实际上，林彪集团的目的是要他当国家主席。

在审定宪法修改草案时，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之间积累的矛盾开始表面化。

在1970年8月审定宪法修改草案的两次会议上，这两个集团之间爆发了关于“三个副词”的一场争论。会上，吴法宪坚持要在宪法中表述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句子中加上“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而已获悉毛泽东意向的张春桥则表示反对。他们之间为此发生的激烈争论，从表面上看是文字之争，实际上是借题发挥。这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两个集团最终摊牌的直接导火线。

1970年8月22日，在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除毛泽东外，其他四名常委都表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主席。但他仍然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8月23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开幕。毛泽东主持会议，原定讨论全国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会议一开始，林彪首先讲话，仍然坚持设国家主席，并利用宣传“毛泽东是天才”的观点把矛头指向江青集团。在叶群的事先布置下，林彪集团的几个主要成员不顾会议预定议程，同时在各自小组会上按照林彪讲话的主旨和陈伯达提供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称“天才”的语录，抓住设国家主席和称天才两个问题，不指名地攻击张春桥。华北组当晚发出登载集中反映陈伯达等人发言内容的第二号简报（亦即全会的第六号简报）。这份煽动性很大的简报，在各组引起强烈反响。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成员，听说有人“否认毛泽东是天才”“贬低毛泽东思想”“不赞成毛泽东当国家主席”，都表示极大的愤慨，要求把这种人“揪出来”。会议出现了紧张气氛。

毛泽东了解到全会上出现的这种不正常情况后，于8月25日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评陈伯达“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提出“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

和诡辩混在一起"，"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全会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对陈伯达展开揭发批判。吴法宪等也受到批评。全会于9月6日恢复原定议程，基本上通过宪法修改草案，决定向人大常委会建议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全国人大；批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会上，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会后，中央于11月发出高级干部学习马列著作的通知，提出高级干部"只有读一些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才能识别真假马列主义"。1970年底至1971年初，中央召开华北会议，在一个多月的会议期间，揭发批判陈伯达。中央还派人参加军委办事组，对林彪集团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掺沙子"。1971年4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除讨论林彪集团的黄、吴、叶、李、邱等的检讨外，又进一步揭发批判陈伯达。4月29日，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把"批陈整风"运动扩大到全国基层单位。

九届二中全会后党中央和毛泽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削弱了林彪集团的权势，使他们陷于被动境地。他们眼见形势不利，决心铤而走险，策划武装政变。

早在1969年10月，担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任命林彪之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1970年11月，林立果利用职权秘密组织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代号为"联合舰队"。他们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建立秘密据点，进行联络，私藏枪支、弹药、电台、窃听器，收集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他们还在广州、上海组织"战斗小分队""教导队"，对精心挑选的成员进行特种训练。1971年3月，"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在上海会商，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代号为《"571"工程纪要》（"571"为"武起义"三字的谐音，指"武装起义"）。这个后来被查获的《纪要》分析了形势，规定了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正当"联合舰队"积极准备发动罪恶行动的时候，1971年8月中旬，毛泽东离京南下，在武汉、长沙和南昌，分别召集湖北、河

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江苏、福建等省、区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多次谈话。他说："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着重谈了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指名批评林彪和黄、吴、叶、李、邱等人，并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他还指出：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林彪对这件事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林彪、叶群得知毛泽东谈话内容后，陷于极度恐慌之中。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8日，林彪下达了批准林立果行动的手令。林立果等密谋在毛泽东南行的旅途中对他采取谋杀行动。9月3日，毛泽东从南昌到达杭州。当他觉察到一些可疑情况后，迅速乘车于9月12日提前返回北京，使"联合舰队"的谋杀计划破产。当日傍晚，林立果乘一架三叉戟飞机从北京到达山海关。周恩来立即下令追查擅自调飞机到山海关一事，并命令该机马上飞回北京。阴谋败露后，林彪、叶群、林立果于9月13日凌晨强行乘飞机叛逃。越出国境后，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飞机坠毁，机上人员全部死亡，"联合舰队"的其他骨干分子有的畏罪自杀，有的被捕。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动的武装政变阴谋被彻底粉碎。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林彪事件的发生，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从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中，人们看到，极力鼓吹个人崇拜的人竟然阴谋杀害党的主席；由党章规定的接班人竟然叛逃；六名中央政治局委员竟然一同从事反革命活动，等等。这一具有极大尖锐性的突发事件促使人们进行严肃的思考："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是什么结果？中国究竟有没有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无产阶级专政下要不要这样的"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五年来究竟依靠的是什么社会力量？它所造成的损失和灾难有多大？继续下去还有什么意义？

林彪事件促使更多的干部和群众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加深了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的怀疑，希望以此为契机纠正一些明显的“左”的错误，多少落实一些党的有关政策。九一三事件的尖锐性和突发性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他也由此陷入极大的痛苦和失望之中。

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与这一事件有关的各种重要问题。党中央决定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代。又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从1971年12月起，党中央陆续批发粉碎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斗争的三批材料，在各级干部和党员中进行传达。随即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清查与林彪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取得相当成效。此时，毛泽东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他的确从林彪事件中受到很大震动，引发了他对这场运动的一些新思考，觉察到这场运动造成的一些严重问题，并在他认为必要的范围内着手纠正某些错误，调整某些政策。

毛泽东亲自抓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在周恩来紧密配合和组织下，使这一工作在短时间内取得相当进展。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指着叶剑英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这实际上是为“二月逆流”的错案平反。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抱病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在他的谈话和周恩来作的悼词中，肯定了陈毅一生对革命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为陈毅恢复名誉。1972年4月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要批判林彪错误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排除“左”和右的干扰，正确处理两类矛盾。许多老干部或他们的家属纷纷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要求弄清问题，落实政策。毛



★ 毛泽东抱病参加陈毅追悼会。

泽东对其中不少信件作了批示，表示关注和支持。根据这些批示，周恩来把握时机，精心安排，加快了落实政策的过程。他反复督促有关部门尽快结束一些专案审查工作，恢复一些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同志的名誉，并把一大批下放劳动或“靠边站”的各级党政军负责干部重新安置到领导岗位，一批专家、学者也得以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尽管他们的处境仍然不好，但是许多人都尽其所能，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努力。1973年3月10日，党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3年12月，毛泽东在同参加军委会议的同志谈话时，提出要给贺龙、罗瑞卿，以及在1968年3月被打倒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承认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这一系列行动，在党内外产生了强烈的政治影响。这些努力加强了党内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力量，从一个重要方面为最终结束“文化大革命”准备了条件。

在这期间，周恩来主张把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和批判极左思潮结合起来。从1969年底到1971年初，为整顿纪律，恢复秩序，批判极左思潮并进行生产动员，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委召开了一系列专业会议。这些会议在不同程度上批判了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强调落实政策和恢复、发展生产。周恩来在一些全国性的

重要会议上和其他场合，反复强调批判极左思潮，指出极左思潮不批透，人们就没有勇气贯彻党的正确路线。他强调，现在我们的企业乱得很，要整顿，首次提出了整顿的任务。针对当时干部在生产和业务工作上普遍存在的顾虑，他指出“运动与业务不能对立”，鼓励各级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根据他的意见，国务院有关经济部门提出整顿企业和加强经济管理的具体制度和措施。在农村工作方面，党中央重申农村工作必须认真按照“农业六十条”的规定进行。党中央还作出关于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解决当时农村普遍存在的分配不兑现、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问题。1972年前后，周恩来等还顶着江青等人大批所谓“崇洋迷外”“爬行主义”的压力，克服“左”倾错误的干扰，为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曾一度受到严重干扰，但在周恩来的关心、指导下，仍然坚持下来并逐步有所发展。从1973年起，经周恩来批准并报经毛泽东同意，我国计划陆续从国外进口一批技术先进



★ 1971年10月，周恩来在北京东方红石油化工总厂视察。

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等重要项目，金额达43亿美元。这个后来被称作“四三方案”的对外引进工程，是继“一五”计划后第二次大规模、多门类地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而且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这是批判极左思潮、促进对外交流的一大成就，带动了我国对外引进工作的全面展开，对我国此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教育方面的极左思潮也受到抵制。根据周恩来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指示，北京大学教授周培源写了《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在一系列问题上反驳了教育、科技领域里的极左思潮。1972年10月6日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后，产生了很大影响。10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河北省怀来县沙城中学的教学改革经验中，提出中学教育应“以课堂教学、学习书本知识为主”，对“教育革命”中的敏感问题公开表示了不同意见。这些都反映了广大科研人员和教师学生的迫切愿望。

周恩来还指导了文化、卫生、体育等方面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他反复强调：过去林彪造成了极左思潮、形式主义，只搞那个“突出政治”，不搞业务，现在要提倡为革命刻苦钻研业务技术，提高质量，勇敢攻关。针对文艺界万马齐喑的局面，他指出：极左思潮不肃清，艺术质量提不高。现在要提倡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百花齐放”。1972年4月，北京市新华书店开始发行《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改变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停止出版古典和近代文学作品的状况，北京市各门市部出现排长队购书的景象。在体育系统，10月在南京举行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田径运动会。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民族和统战工作进行了一些富有成效的调整。1972年初，根据周恩来的批示，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宁夏固原地区座谈会。会议要求：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挑选懂得民族政策的同志到少数民族地区工

作；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满腔热情地帮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会后，根据中央指示，公安部、农林部联合调查组和农林部学习小组分赴宁夏、内蒙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调查了解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和当地群众生活、生产中存在的问题。7月2日中央在批转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报告和联合调查组报告的通知中强调：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极其重要的。要认真学习和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经过一系列深入的工作，党的民族政策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受到严重破坏的民族关系得到改善。1972年的整顿，还涉及宗教、文艺、科学技术、金融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果。

批判极左思潮在1972年下半年达到高潮。8月初，周恩来在讲话中指出：“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的鼻子下面也有嘛”。极左思潮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他很有针对性地说：“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①]在一个短时期内，《人民日报》的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根据他的指示精神，10月14日，《人民日报》以一个整版发表三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以鲜明的立场、犀利的语言揭露了“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打倒一切”“砸烂一切”“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等谬论，特别告诫人们要警惕极左思潮的“重新出现”。这三篇文章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受到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的欢迎。

各个领域清除极左思潮影响、落实政策，恢复生产、工作秩序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却遭到江青等人的反对。1972年10月后，江青等人对《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的一些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进行指责，命令在人民日报社开展批判“右倾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41—542页。

回潮”的活动。他们还指使上海《文汇报》组织文章批判周培源关于重视基础理论教育的正确意见。根据周恩来的意见由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在提交1973年全国计划会议讨论时，28个省、市、自治区赞成，唯有张春桥、姚文元把持下的上海反对。张春桥公然说这是“拿多数压我们，我坚决反对，我们是光荣的孤立”。1972年和1973年两次全国计划会议的两个文件草稿，由于张春桥的阻挠，没有作为正式文件下发。

毛泽东虽然从林彪事件中吸取了某些教训，但他并没有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仍然让江青等人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重要的作用。批判极左思潮发展下去，必然会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当周恩来等一批领导干部同江青集团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发生尖锐对立的时候，毛泽东又错误地支持了江青、张春桥等的主张。1972年12月5日，人民日报社一位干部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很同意”周恩来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并反映张春桥、姚文元等反对批极左思潮的情况。12月17日，毛泽东在同政治局成员的谈话中，针对这封信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那封信我看不对。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这次谈话之后，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方向发生逆转，“批林整风”运动的重点随之转变，周恩来等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被打断。

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因林彪事件的发生而提前一年召开。当时全国有2800万党员。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249人。

党的十大的筹备工作，同样没有经过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只是在1973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确定了修改党章的原则和方法，



★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

以及代表产生的方法。十大代表不是由省级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选举产生，而是由党委扩大会议"协商"选举产生的，这就为江青集团的骨干分子搞政治投机提供了便利条件。

8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党的十大第一次全体会议。大会通过的由张春桥等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仍然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仍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报告还把"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认定为"客观规律"。对于林彪集团，报告认为林彪在我们党内不是经营了十几年，而是几十年；断言林彪集团的垮台"并不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束"，这样的斗争"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报告把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列为首要任务，要求重视上层建筑领域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在这样的"左"倾错误方针指导下，只能使"文化大革命"愈拖愈久，破坏性的后果愈来愈严重。

大会选举中央委员195人，候补中央委员124人。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打击迫害、被排斥在九届中央委员会之外的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廖承志等被



★ 邓小平和邓颖超在党的十大主席台上。

选为中央委员。虽然江青集团的骨干分子更多地被选进党的中央委员会，但一些老干部得以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干部政策的成果。

1973年8月30日，党的十届一中全会选举党的中央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在上海造反起家的王洪文突然被提升为副主席，排名仅在周恩来之后。江青集团重要成员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

党的十大以后，江青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企图全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和活动更加扩张。但是，许多干部、党员通过林彪事件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提高了识别能力。一场更激烈的否定和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正在逐渐地酝酿和形成。

从总的方面看，在极左思潮再次抬头的背景下，党的十大不论是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还是在组织路线上，都继承了党的九大的“左”的错误。

三、经济建设和科技等方面工作的艰难进展

由于动乱的冲击和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出现较大的起伏。但是，党和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目标始终不渝，追求国家兴盛、民族富强仍是广大干部、党员、群众的共同愿望。尽管环境仍然复杂而困难，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工业、农业还是获得一定的增长，科学技术战线也取得若干新成就。

70 年代初的国民经济及三线建设的大规模展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国民经济受到社会动乱的严重冲击。1966年下半年的红卫兵运动和全国大串连，不仅给全国铁路交通造成严重混乱，也使工农业生产受到直接影响。这年底，铁路运输积压待运的物资估计达1000万吨。不过，当时动乱主要集中在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大部分生产指挥系统还未被打乱，特别是由于五年调整给国民经济的发展打下较好的基础，因而1966年各项生产建设事业仍然取得比较好的成绩。全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534亿元，比1965年增长13.4%；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有较大幅度增长；许多生产建设项目都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年度计划。但是，当1966年底动乱全面扩展到工业交通企业之后，就给经济建设带来严重的灾难。在“全面夺权”中，经济工作的指挥、调度和管理系统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国民经济的运行失去控制。原定的1967年国民经济计划无法执行，实际上被废置。1968年连年度计划都未能制定，成为我国建立计划经济体制

以来没有国民经济年度计划的一年。企业内部许多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尤其是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制定并实行的比较完备的各种条例和政策，如“工业七十条”等，都被当作“修正主义”的“管、卡、压”而遭到批判、践踏；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按劳分配原则、利润指标、经济核算等也被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摒弃。结果造成企业管理混乱、劳动纪律松弛、产品质量下降、成本上升、工伤事故增加，全国大批工矿交通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这两年的生产大幅度下降。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66年下降9.6%，1968年比1967年再下降4.2%。国民收入1968年比1966年下降13.3%。财政收入也大幅度减少，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降低。居民取暖用煤、棉布及副食品等定量供应的数量都有所减少。

随着各级革委会的建立，党的九大的召开以及党的各级基层组织相继恢复，国内形势稍趋安定。主持政府工作的周恩来等领导人抓住时机，着手恢复各主要工业部门和其他综合经济部门的工作，加强了对经济的计划管理。1969年2月，召开了中断两年的全国计划会议。会议讨论《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稿）》，并把它作为主要文件下发，由各地边执行，边补充。通过这些努力，1969年的国民经济扭转了前两年连续下降的局面而有所回升。1969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613亿元，比上年增长23.8%；国民收入达到1617亿元，比上年增长19.3%。这些变化的得来十分不易。但这种增长带有明显的恢复性质，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大部分指标仍然低于或大体相当于1966年的水平，经济工作中的许多困难问题依然严重存在。1970年二三月间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拟定了《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由于过高估计外敌入侵的战争危险和对国内刚见好转的经济形势估计过于乐观，突出强调要“以战备为纲”，集中力量建设战略后方，建立自成体系的经济协作区，以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因而计划纲要出现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的倾向，在实施过程中还出现向地方急速、盲目地下放企业管理权限的问题，急

剧地将中央企业事业单位大规模下放地方。1970年经济建设中，内地战略后方的建设（重点是国防工业建设）迅速地全面铺开，地方“五小”工业（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迅猛发展。1970年的积累率由上年的23.2%急剧上升到32.9%，实际投资总额比上年增加55.6%。到年底，当年经济指标以及“三五”计划主要指标在1970年高投入的前提下大体完成，大部分工农业产品产量超过1966年的指标，因“文化大革命”运动干扰的一批重点工程大多在这一期间开工或建成。但是这种盲目急进的建设和体制变动带来许多严重问题。经济发展也暴露出一系列矛盾，如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生产不能满足工业发展和人口增长的需要；原材料工业不能适应加工业发展的需要；基建规模偏大、项目过多，投产率下降；产品质量下降，设备失修，事故增多，等等。

1971年我国开始执行第四个五年计划。由于忽视经济工作中存在的矛盾，继续追求高指标，1971年的基建规模不仅没有适当地压缩，反而进一步扩大，经济建设的冒进之风有增无已。到1971年底，我国国民经济出现周恩来指出的“三个突破”的严重问题，即职工人数突破6000万人，工资总额突破300亿元，粮食销售量突破800亿斤，大大超过预定计划。1972年，“三个突破”问题继续有所发展，以致挖了国家的粮食库存，随之而来出现了货币发行量的突破。周恩来又指出：“票子发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线。三个突破不如这一个突破。”[①]由此造成国民经济一系列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严重后果。

1972年至1973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务院采取各种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首先着重解决“三个突破”问题，大力压缩基建规模，精简职工人数，加强对劳动工资的管理，整顿粮食统销工作；

① 周恩来：《关于经济工作的几则文电》（1966—1973），《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5页。

调整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把农业放到国民经济首位；调整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适当降低国防建设费用；降低“四五”计划原定的过高经济指标；加强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强调统一计划和遵守纪律，等等。经过近两年的调整，虽然经济工作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但经济冒进造成的危害到1973年下半年得到较大程度的缓解，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967亿元，比上年增长9.2%；国民收入达到2318亿元，比上年增长8.3%；财政收入达到809.7亿元，比上年增长5.6%，实现收支平衡。1973年成为“文化大革命”以来国民经济形势最好的一年。

这一时期在三线建设上取得的成果，十分引人注目。在铁路建设中，1970年7月至1973年10月，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铁道兵指战员和铁路工程建设人员在人迹罕见的崇山峻岭克服重重困难，相继建成了连接西南地区的成昆铁路、湘黔铁路、襄渝铁路，连同此前建成的宝成、川黔、贵昆铁路，改变了西南地区长期交通梗阻的闭塞落后状况。此外，在建和建成的大型企业还有：贵州六盘水、四川宝鼎山、芙蓉山，山东兖州等大型煤矿；甘肃刘家峡，湖北丹江口、葛洲坝，贵州乌江等大中型水电站；四川攀枝花钢铁厂、甘肃酒泉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贵州铝厂、四川德阳第二重型机器厂、陕西富平压延厂、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四川汽车厂，等等。石油、机械等一大批建设项目也在中西部建立起来。“三五”期间，“三线”建设投资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高达52.7%。一批大中小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大专院校星罗棋布于中西部地区，新兴的城镇在荒山僻野中拔地而起。三线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状况，为西部地区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一批交通运输线、输油管线和邮电通信设施相继建成，已经开发的油田持续发展。1968年建成的南京长江大桥，铁路桥长6772米，公路桥长4588米，是当时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最大的铁路、公路两用



★ 1968年12月29日，南京长江大桥全面建成通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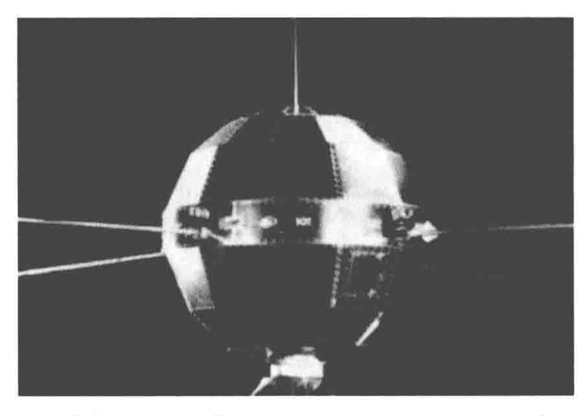
桥。除前述西南三线建成的铁路之外，焦枝铁路、京原铁路、汉丹铁路、宁铜铁路、通让铁路等也先后建成。经过改造，宝成铁路于1975年成为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公路建设也有所进展。1974年我国建成大庆至秦皇岛的第一条长距离输油管道，以及秦皇岛到北京、山东临邑到南京等输油管道。我国的交通运输能力、原油输送能力大大增强。大庆油田广大职工想方设法地排除干扰，使油田开发工作从1971年起走上正常轨道，原油产量长时期保持持续和高速增长，到1975年已达到年产4625.9万吨，并且在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上取得建设特大油田的重要经验。山东胜利油田、天津大港油田初具规模。

国防和科技战线取得的新成就

"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在努力排除动乱造成的严重干扰的情况下，科学技术方面也取得重大成就。

国防科技业绩显著，民用科技也有突破。在导弹核武器方面，

1966年10月我国第一次成功进行了发射导弹核武器的试验，1967年6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69年9月首次成功进行了地下核试验，1971年8月第一艘核潜艇建成并完成系泊试验，1974年4月完成试航任务。国防尖端技术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增强了我国的国防战略防御能力。在航天技术方面，1970年4月，我国成功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标志着中国在宇宙航天技术方面取得历史性的突破。1971年9月，洲际火箭首次飞行试验成功。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人造地球卫星于1975年11月发射成功。生物技术方面也有突破，1973年我国在世界上首次培育成功强优势的籼型杂交水稻。电子技术同时取得进步。我国自行研制成功卫星地面站、彩色电视发射设备、第三代电子计算机，还发



★“东方红一号”卫星。



★ 1973年，袁隆平（左二）带领科研团队培育成功强优势杂交水稻。

展了激光红外技术，自行研制成功小同轴300路载波机。1971年，初步形成全国电视网，半导体、集成电路的研制和生产也取得一些进展。1976年，我国建成纵贯8个省市的中同轴1800路载波通信干线和连通全国20多个省市的微波通信干线。北京、上海还各建成一座卫星地面站，大大增强了我国邮电通信能力。科技战线上的这些重大成就，是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领导人和广大科学技术人员经过不懈努力取得的，也反映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特殊环境下所作的可贵努力。尤其是国防尖端技术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不仅增强了我国的国防战略防御能力，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邓小平后来说过："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文化大革命"前期，在无政府状态下我国人口急剧膨胀，使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更加严重。1971年7月，根据周恩来指示，国务院批发了卫生部等《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提出了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人口控制指标。这是国务院决心克服生育无政府状态，实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的具体部署，成为70年代在全国大力开展计划生育的新起点。1973年6月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第一次把人口控制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同年7月，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成立了专门工作机构。

环境保护工作开始起步。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情况下，在大多数人对于环境保护问题还感到陌生的时候，周恩来就提出并着手抓了环境保护问题。1972年6月，我国参加了在瑞典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这是世界上第一次保护环境的国际会议。当年，周恩来指示开展对官厅水库水源污染的调查。经过十多年的治理，终于控制住官厅水库的污染。这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项成功治理污染的工程，为以后的环境治理提供了重要经验。1973年8月，国务院召开首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研究了有关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制定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这是新中国第一部环境保护的综

合性文件。从此，环境保护被列入党和国家工作的议事日程。1974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正式成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环境保护机构诞生。

这些建设成就决不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成果，而是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排除干扰、共同奋斗的结果。在社会严重动乱的局面下，他们一直以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坚守岗位，克服困难，排除干扰，辛勤劳作，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多作贡献。这些多方面的成就，显示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显示了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下长期凝聚形成的巨大力量。

四、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为中国外交战略的转变提供了机遇。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天下大乱”中，党的外交工作一度受到严重冲击。毛泽东说：“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1]。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到70年代初，我国的国际战略实现重大调整，外交工作打开一个新的局面，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建交高潮。中国外交战略的转变和对外关系新局面的出现，对中国此后的发展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中美关系的突破

“文化大革命”使党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工作受到严重干扰。林

① 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的谈话，1969年3月22日。

彪、江青集团插手外事部门，兴风作浪，甚至图谋篡夺中央的外交大权。他们肆意抹煞新中国成立后17年来外事工作的重大成就，诋毁17年来党的外交路线。在他们的煽动下，外事部门的领导人被揪斗，我国驻外大使几乎全部被调回国内参加"文化大革命"，很多人受到批判。某些外事工作人员受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不顾政策、自作主张、违犯纪律的事屡有发生。在对外宣传方面，不顾内外有别的原则，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对外活动的主要任务，发生种种"唯我独革"、强加于人的错误。特别是1967年8月北京发生的火烧英国代办处等严重事件，造成我国与西方国家及周边一些国家关系紧张的局面，使我国的国际形象受到严重损害，外事工作陷于困境。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同已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发生外交纠纷，同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恶化到降级甚至断交的严重地步。对于这些极左错误，毛泽东、周恩来一直表示反对。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对外宣传中强加于人的做法，周恩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外事工作一度出现的偏差较快得到纠正，一些不正常状态逐步消除。同国内其他方面的工作比起来，外事工作所受破坏的程度要轻些，时间要短些。1969年五一劳动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一些外国驻华使节，同他们进行友好谈话，表达了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改善和发展关系的愿望。不久，中国陆续派出一批批驻外使节，对过去主要由于中方的极左行动而受到损害的双边关系，主动承担自己方面的责任，与对方修复关系。中国的对外关系逐渐走上正常发展轨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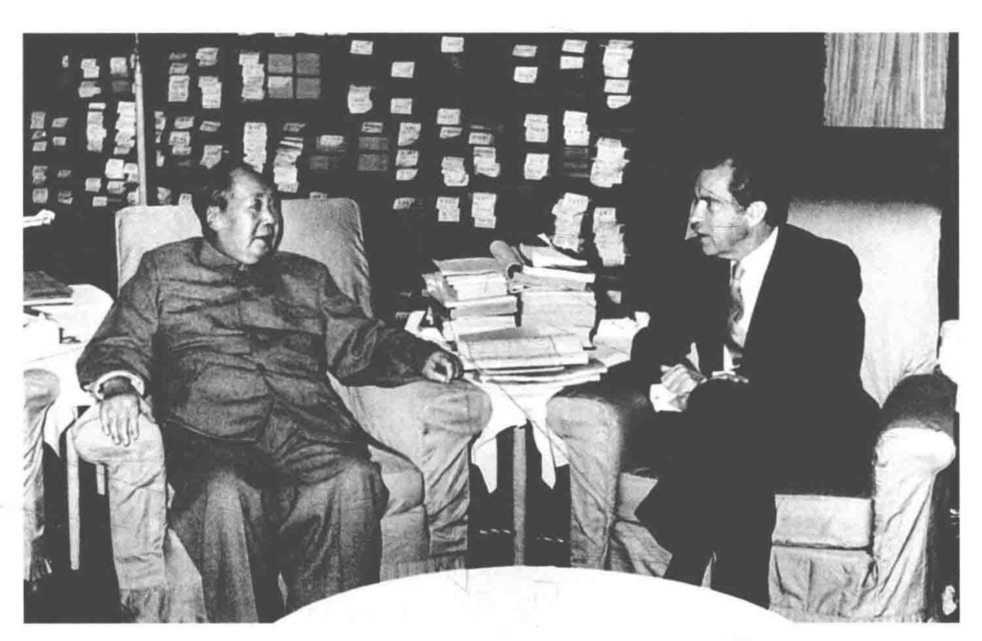
进入70年代，国际形势经过战后20多年的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的国际格局初露端倪。这主要表现在：中国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不与任何大国或集团结盟的独立的政治力量；随着西欧和日本的快速发展，美国在西方联盟中的经济地位有所削弱，并且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苏联不断强化它在美苏争霸中的地位，并对中国形成巨大压力；中国以外的其他亚非拉国家的力量和影响也有了进一步增长。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及时对外交工作作出

富有远见和胆略的重大决策。

局势转变的关键一环，是中国同美国关系的缓和。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长达20年之久。在变化了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两国政府领导人都认为有必要也有可能进行改善两国关系的谈判，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在美国看来，美苏对立一直是它所面对的严重问题，而此时世界上已出现几个力量中心，中国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力量。美国要尽快消除越南战争败局造成的影响并维持它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要对付苏联的挑战，迫切需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中苏关系恶化的加剧使他们感到这种设想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就中国方面来说，要着重对付苏联当时对我国安全所构成的直接和严重的威胁，要解决台湾问题以实现国家统一大业，要恢复和扩大国际交往、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也需要缓和同美国的关系。

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通过多种方式同中国进行接触，表示有意改善中美关系，我国也予以积极回应。1971年4月，毛泽东根据美方的要求，决定邀请参加日本名古屋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以中美人民之间的交往作为打开两国官方关系的序幕。被人们誉为"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以出人意料的方式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和世界形势的变化。经过几次秘密接触，5月29日，尼克松总统接到中方欢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来北京同中国领导人举行秘密会晤的口信。同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这一消息震动了世界。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毛泽东主席会见尼克松，周恩来总理同他举行会谈。中美双方经过会谈于2月28日在上海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在《中美联合公报》中，中美双方申述了各自的原则立场，强调双方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双方郑重声明：中美两国关系走上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政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尼克松。

府明确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用什么方式解决应该由中国自己来决定。美方则表示：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史上的里程碑。此后，两国政府继续就建交问题举行会谈。中国政府提出要实现中美建交，美国政府必须断绝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从台湾撤出美国全部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废除同台湾的所谓"共同防御条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由于美国政府下不了正确处理这些问题的决心，中美建交被拖延下来。但是，两国在1973年互设联络处，双方的贸易关系、科学技术文化交流在几年间有较大发展。两国结束长期的敌对状态，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也对国际形势产生着重大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

中美关系的转变给国际社会带来巨大冲击。第一个重大反响就是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不顾美国的阻挠，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决议。

中国是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也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根据国际公认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应由中国新政府指派代表参加联合国大会及其有关机构的工作，把已经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台湾国民党当局代表驱逐出联合国。但是，主要由于美国政府的反对，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一直被台湾国民党当局占据。围绕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自新中国成立时起，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展开了斗争。这一斗争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支持，逐渐成为联合国内主持正义国家的共同斗争。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亚非拉一系列新独立国家不断加入联合国，美国的阻挠越来越困难。经过许多亚非拉国家和其他主持正义的国家的共同努力，克服美国、日本等企图在联合国席位问题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障碍，这一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在联合国升起。15日，中国代表团肩负全国人民的重托，首次出现在联合国大会上，受到大多数国家代表极其热烈的欢迎。中国代表团团长在大会上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对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进行长期努力的众多友好国家表示衷心感谢，并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原

则立场。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是我国外交工作的一个重大突破，是新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重要标志，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从此，中国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组织内为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各国友好合作、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自己不懈的努力。



★ 1971年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

对外关系的新发展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和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中国外交获得新的活力和广阔的活动天地，一个新的建交高潮出现了。

中美关系的缓和直接推动了中日关系的改善。日本政府曾长期追随美国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美国先同中国进行和解的外交活动在日本朝野引起极大震动，日本舆论强烈要求尽快争取中日建交，为日本取得一个在政治上经济上同各国竞争的有利地位。在日本许多对华友好的政党、社团和人士的推动下，日本政府新任首相田中角荣于1972年9月25日来华访问。中日双方于9月29日签署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中日之间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方面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签字仪式现场。

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对台湾的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1973年初，中日两国互派大使，并陆续签订贸易、航空、海运、渔业和科技文化等一系列协定，使这些方面的交往得到很快发展。两国政府还于1975年开始进行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中日建交打开了两国睦邻友好的历史新篇章，对两国和世界的和平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同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的广泛建交也是这一时期对外关系的重大突破。西欧国家战后随着自身政治经济实力的增长，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抗衡的要求不断加强，它们希望同中国一道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本国独立自强而相互支持、合作的倾向也在发展。中国和它们抱有同样的希望。1969年以前，与中国建交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仅有西欧的法国等六个国家。到1973年底，我国已基本上完成同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建交过程，同欧洲共同体也建立了正式关系。中国同这些国家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合作都有良好的发展。70年代后，中国同东欧各国的关系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复、改善和发展。

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工作的另一个显著成就，是发展了同亚非拉许

多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形成又一个更大范围的建交高潮。中国先后同土耳其、伊朗、马来西亚、智利、牙买加等40多个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从各个方面坚决支持这些国家捍卫自己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维护本地区和世界和平的正义斗争。中国真诚维护并努力促进这些国家之间的团结，为打破大国欺侮小国、富国压榨贫国的国际旧秩序，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而共同奋斗。

还在70年代前期，毛泽东对国际形势逐渐形成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估计。他认为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属于第一世界，苏美以外的西方发达国家和东欧国家属于第二世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思想对指导我国的外交工作，坚持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努力建立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和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包括同美国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都发挥过重要作用。

70年代上半期是中国外交突破性大发展的时期。这一形势的出



★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

现，与国际形势的变动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因势利导，宏观分析形势，对我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这个时期我国外交所取得的成就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拓展了中国外交活动的舞台，也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创造了有利前提，打下了基础。

五、1975年的全面整顿及其中断

周恩来试图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被打断后，江青集团为从整体上维护“文化大革命”，于1974年借机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再次制造混乱。1975年初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开始主持国务院工作，继而又同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展开了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局势发生显著变化。整顿超出了毛泽东容许的范围，遭到了“四人帮”的极力抵制。

“批林批孔”运动和围绕筹备四届全国人大的斗争

经过1972年全国开展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广大干部、群众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厌倦和怀疑的情绪不断增长，希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有所改善的要求更加迫切。周恩来试图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虽然被打断，但却受到人们越来越广泛的赞同和支持。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意识到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但他坚持认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对于反修防修、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这时他一方面希望结束

长期的不正常局面，对已经认识到的一些具体错误进行纠正，以实现安定团结，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又极其关心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担心出现"复辟倒退"和"右倾回潮"。这种忧虑使他提出要批判孔子、反对倒退。

党的十大前后，毛泽东在多次谈话中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推崇法家联系起来。1973年7月，他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中认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1974年元旦，江青等人控制下的"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建议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转发全国。18日，中央以一号文件转发这份材料，并加批语指出：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一场"批林批孔"运动立即在全国开展起来。毛泽东发动这场批判运动，不仅是想从思想根源上把对林彪集团的批判引向深入，而且要借宣传所谓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和儒家"保守""复旧"来维护"文化大革命"。

江青集团为了巩固和扩大在"文化大革命"中既得的权势，竭力利用"批林批孔"运动大做文章，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江青于1974年1月两次在北京召开的驻京部队、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大会上讲话，动员"批林批孔"。她在会上以运动的领导者自居，在讲话中点名攻击中央、地方和军队的一批领导干部，把周恩来、叶剑英置于被指责的地位。江青在另一次讲话中公然声称现在"有很大的儒"，要批"现在的儒"。她还以个人名义向一些部队、机关写信、送材料，煽动"点火放炮""夺权"，鼓吹"大乱是大好事"，还派人到军队"放火烧荒"。由江青集团控制的写作班子连续发表批判文章，以批判孔子为名，实际上是对前一时期周恩来领导的整顿进行攻击。在他们的煽动指挥下，一些一度被冷落的造反骨干分子又再立山

头，再打派仗，到处揪斗老干部，许多地区和单位的领导班子又陷于瘫痪，政治空气再度紧张。“批林批孔”运动使林彪事件后经过艰苦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局势和有所发展的国民经济，重新遭到破坏，工业生产再次下降。1974年成为“四五”计划期间国民经济遭受干扰、破坏严重的一年。据1974年1月至5月统计，煤炭产量比上年同期下降6.2%；铁路货运量比上年同期下降2.5%；钢产量比上年同期下降9.4%；财政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5亿元，支出增加25亿元。

毛泽东虽然发动和支持“批林批孔”运动，但在此时毕竟不愿重新发生社会大动乱。为制止混乱局面的发展，经毛泽东批准，党中央于4月10日发出通知，规定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清查的范围应限制在同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不要扩大化”。这些要求对抑制社会混乱起到重要作用。7月1日党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批判“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错误口号，并指出要揭发、批判停工停产的幕后操纵者。

毛泽东对江青等利用“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图谋有所察觉，并对他们多次批评。7月17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毛泽东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还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搞帮派活动，警告他们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点名批评江青，并在党的最高领导层点出“四人小宗派”的问题。这些批评，使江青等人不得不暂时稍有收敛。这在当时是非同寻常的，为党中央两年后粉碎这个集团准备了有利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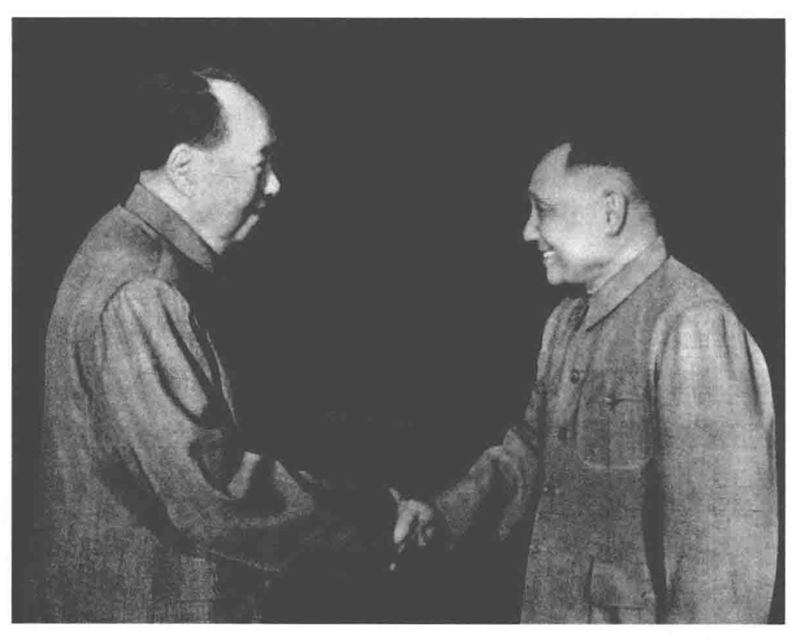
1974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宣布在近期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知传达毛泽东的意见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毛泽东又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毛泽东关于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使

“四人帮”再次搞乱全国的图谋受到抑制，为将要召开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重新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提供了重要依据。

“四人帮”不顾毛泽东的意见，认为召开四届人大是他们篡夺更多权力的时机，加紧阴谋活动。在筹备四届人大时，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等人极为不满，多次制造事端，围攻邓小平。在10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等人借“风庆轮事件”强迫与会者对他们认定的所谓“卖国主义路线”表态，邓小平坚决顶住了“四人帮”的围攻，愤然离开会场，以示抗议，会议无果而散。

“四人帮”经过秘密策划，于10月18日派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诬陷周恩来、邓小平，妄图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由“四人帮”出面“组阁”。毛泽东当即告诫王洪文：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20日，毛泽东又派人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由总理和王洪文一起主持。他还要人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同王洪文一起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毛泽东再次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四人帮”这个概念。他还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毛泽东在几次谈话中批评“四人帮”，高度评价邓小平，称赞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还提议在将要召开的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此前，1973年12月，中共中央已经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党的十届二中全会追认；同时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1975年1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1月上旬召开



★ 1974年，毛泽东同邓小平亲切握手。

的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得到追认，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毛泽东对江青一伙进行多次批评，重申由周恩来主持党中央和政府的日常工作，重新对邓小平委以重任，这对于挫败“四人帮”的“组阁”阴谋，保证四届全国人大顺利召开，起了重要作用。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抱病作政府工作报告，重新确定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按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大会选举朱德继续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等22人为副委员长。大会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华国锋等12人为副总理。这次大会虽然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肯定“批

林批孔"运动的前提下召开的，但它再次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确定以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为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奠定了基础。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九年后，为使国家政治生活逐步转入正常轨道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使身处反复动乱中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又看到了党和国家的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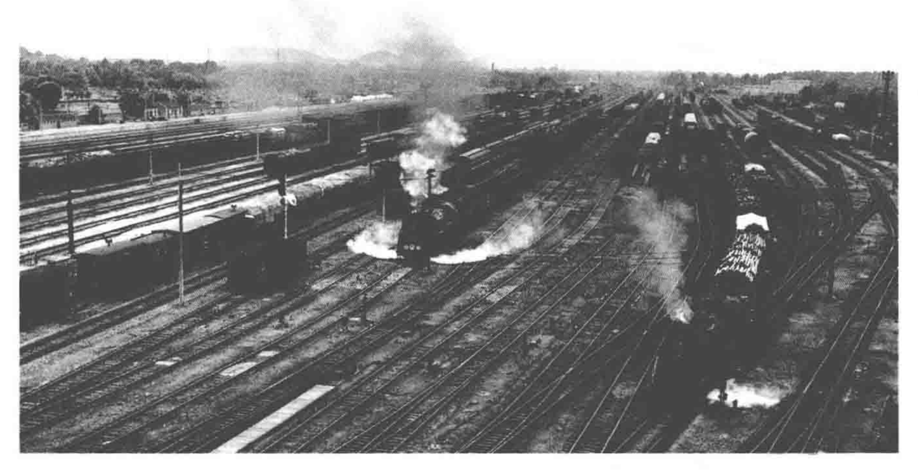
全面整顿的展开和"四五"计划的基本完成

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周恩来病情加重。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逐步全面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当时，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全国各方面工作再次陷入严重混乱状态。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不顾刚刚出来工作、困难重重的处境，通过大刀阔斧的整顿，很快扭转了局势。他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在主持召开的各种类型的会议上，明确、坚定地提出要进行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他强调指出：全国各个方面工作都要整顿。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科技、军队都要整顿，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经过整顿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要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加强党的领导，发扬党的优良作风。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对派性要寸土必争、寸步不让。要注意落实政策，比如对老、中、青干部，对劳动模范、老工人，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都要落实，以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他还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要求一定要搞好科学技术工作，等等。他的这些讲话，促使人们从长期极左思潮的影响下醒悟过来，精神为之大振。

在邓小平领导下，叶剑英、李先念等一批先后恢复工作、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同心协力密切配合，各方面的整顿很快开展起来。

由于闹派性、打派仗，造成徐州、南京、南昌等铁路局的运输长期堵塞，阻碍津浦、京广、陇海、浙赣四条铁路干线的畅通，并影响其



★ 通过整顿，徐州铁路分局列车运行恢复正常。

他干线的运输，严重危及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的人民生活。这是阻碍局势好转的一个关键。党中央于1975年2月下旬召开全国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3月5日作出决定，着重解决铁路运输问题，并派出工作组，会同有关地方党委，对一些问题严重的路局进行重点整顿。工作组发动群众批判派性，撤换一批派性严重、不停捣乱的坏头头，平反错案，坚决调整领导班子，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这些有力措施深得广大铁路职工的拥护，铁路运输状况迅速好转。到4月份，堵塞严重的几条铁路全部疏通；全国20个铁路局中的19个超额完成计划。全国铁路日装车平均达到5.37万多车，比2月份平均日装车多1万多车；煤炭日装车达17800多车，是58个月来第一次完成月生产计划。铁路的整顿，带动了整个工业首先是钢铁工业的整顿。6月份，钢的平均日产量达到7.24万吨，超过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开始补还欠产。与此同时，煤炭工业的整顿也取得成效。

经过几个月整顿，经济形势日益好转。1975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工业增长15.5%，农业增长3.1%。这种状况表明整顿工作抓住了要害，深得人心，成效卓著。

在这期间，党中央在组织工作中采取了一些重要举措，进一步落实干部政策，使被打倒的老干部尽快恢复工作。军队、农业、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整顿，分别取得明显成绩。军队整顿在解决“肿、散、骄、奢、惰”，调整各大单位领导班子，落实干部政策等方面取得很大进展。国防科委解决了七机部两派闹派性达九年之久这个老大难问题。文艺工作重新强调党的“双百”方针，解除对一些优秀作品发表和演出的限制，开始改变近十年文艺界“八亿人民八个戏”和文坛一片荒芜、百花凋零的局面。特别是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中国科学院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撰写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等重要文件，尖锐地批判了“四人帮”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各个领域提出了纠正“左”倾错误、恢复和确立正确政策的指导思想和措施。这三个文件不限于整顿的内容，在一些问题上很有远见地提出了改革工业、科技工作的重要思想，为后来的改革做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在全国政治形势比较有利的情况下，邓小平强调了整顿党组织的问题。7月4日，他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讲话时说：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加强党的领导，把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坚持下去。现在，相当一部分地方党的领导没有建立起来，党的领导削弱了。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建立省委一级的领导。要“把省委的领导建立起来，使省委说话有人听，能够担负起领导责任”。他讲到党的作风问题时说：反对派性、增强党性，是很重要的一条；现在解决各地区、各部门的问题，都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在各方面整顿开始后，邓小平进一步提出：“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方面的整顿就不难”，“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根据这些意见，中组部在对部分省和自治区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整党问题的汇报提纲》和《整党问题参阅材料》，并代中央起草了一个整党文件。

对于邓小平主持下在各个领域所作的整顿，“四人帮”从一开始就利用种种借口、采取各种手段进行阻挠和抗拒，并伺机反扑。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时说：“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12月26日，毛泽东在长沙同周恩来等谈这个问题，又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这些谈话把按劳分配、商品交换看作是资本主义性质或者是容易变成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仍然是他的带有某些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构想的进一步发挥。这些论述被“四人帮”加以夸大、渲染，并作为他们反对整顿的武器。

1975年2月9日，这时由江青集团控制的《人民日报》发表《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社论说：“我们的任务，是不断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作斗争”，“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春桥、姚文元主持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33条语录。全国随即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在“四人帮”指挥下，报刊发表大量文章，反对“经验主义”，号召“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煽动“打土围子”。他们把整顿工作中提出的各种措施，诬蔑为“经验主义”，借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提出“打土围子”，是要把那些反对“左”倾错误的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比作过去民主革命时期在“土围子”中的敌人，要对他们实行所谓“全面专政”。

毛泽东对“四人帮”反“经验主义”的不良意图有所察觉，对他们提出了批评。1975年5月27日和6月3日，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在“批林批孔”运动前后的错误进行批评。针对江青等人把周恩来、叶剑英在1973年11月中美会谈

中的一些言论说成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1974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擅自提出批“走后门”、1975年又突然搞反“经验主义”这三件事，邓小平向江青等人质问道：为什么钻出这三件事？倒是要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他又说：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①]总括了历史经验，搞小圈子历来不好，不搞掉派性不行，“四人帮”值得警惕。吴德、李先念、陈锡联、叶剑英也先后发言，批评“四人帮”。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九年来，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江青等人，这是第一次。江青等人“沉默”地听批评，这也是第一次。此后，江青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上交书面报告，对邓小平批评的三件事进行了检讨。她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这次会议后，王洪文不再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四人帮”的势头受到遏制。经毛泽东同意，从1975年7月开始，中央的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这为整顿工作在全国的展开创造了有利条件。

虽然中央政治局几次开会对“四人帮”进行批评，但是，“四人帮”的野心毫无收敛，仍然竭力寻找机会进行捣乱。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同北京大学一位教师谈了对古典小说《水浒》的看法。姚文元闻讯后当天即给毛泽东写信，对评论《水浒》的意义大加发挥。“四人帮”抓住这个题目在全国报刊上掀起一个所谓评《水浒》的宣传运动。江青提出“《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以此影射、诬蔑周恩来、邓小平要“架空毛主席”。毛泽东得知后，对江青的讲话加以斥责，使“四人帮”的嚣张气焰又一次受到打击。

由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许多领导同志的共同努力和斗争，由于毛泽东对“四人帮”一定程度的抑制，由于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人心思治，积极工作，努力生产，1975年的形势明显好转。一些地区的武斗得到制止，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

---

① “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经济迅速回升。

1975年是执行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在整顿的推动下，这一年工农业总产值和大多数产品产量指标按照“四五”计划基本完成，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经济状况最好的一年。工农业总产值完成计划的101.7%，其中农业总产值完成“四五”计划规定的104.5%，工业总产值完成100.6%。“四五”期间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共有2579个，全部建成投产的有700多个。“四五”计划能够得以完成，与1972年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特别是1975年邓小平主持整顿密切相关，是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抵制动乱、坚持生产和工作的结果。

在1975年全面整顿过程中，围绕着要不要安定团结、要不要发展国民经济、要不要落实党的政策展开的激烈斗争，其实质是继续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还是进行整顿，使党和国家的工作有所转变、有所前进。整顿的深入展开，势必触及“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左”的政策和理论，以至逐渐发展到对这些错误政策和理论的系统的纠正；势必进一步加深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形成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趋势。毛泽东虽然严厉地批评了“四人帮”，但也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全面整顿的日益深入，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引起毛泽东的不满。

1975年下半年后，毛泽东的病情加重，行动、说话都很困难，但他仍然是党和国家大事的最后决定者。他接近的人越来越少，对实际情况越来越缺乏了解，对党和国家大事的设想和主张越来越抽象化。他同中央政治局委员之间只能通过联络员来保持不多的联系，这使他更难以了解全面情况。“四人帮”在其间所作的一些带有歪曲、挑拨性的情况反映，对毛泽东作出错误判断、决策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

1975年11月，毛泽东听信“四人帮”及其亲信的诬告，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对邓小平转交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写的两封信（信上反映了“四人帮”两个亲信人物的问题），毛泽东认为信的矛头是对着他的，而邓小平则是偏袒和支持这位副书记。11月初，清华大学党委

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反击右倾翻案风"随即展开，一些学校相继进行了"教育革命大辩论"。整顿被迫中断。

但是，在历经近十年的动乱之后，干部群众的认识已经大不同于"文化大革命"初期了。邓小平主持整顿的成效有目共睹，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既违背事理，又违背人心，一开始就受到广泛的抵制。人们从阅读当时印发的供批判的材料中，反而对坚持党的正确方针政策的邓小平有了更多的了解和信任。这显然是"四人帮"始料不及的。九个月的整顿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抵触情绪迅速发展，在全国形势的又一次反复中孕育着新的斗争。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1月下旬，毛泽东决定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华国锋1971年调国务院工作，是党的九届、十届中央委员和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专管外事。1976年2月下旬，华国锋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开会，传达毛泽东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多次谈话，焦点仍在维护和肯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这些谈话中，再一次重申"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并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一些老干部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是因为"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错误是两个，即"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历经十年动乱后，毛泽东这些肯定"文化大革命"的说法，对当时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来说，已经很难有多少说服力了。

"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个很不得人心的批判运动，破坏了刚刚出现的比较稳定的局势，否定了整顿中提出的许多正确政策和措施，打击了一批坚决执行这些政策的领导干部，而在整顿中被撤职或调离的派性严重的人和造反派头头又被重新起用。一些地区派性斗争重

新泛滥，造成停工停产，交通堵塞，全国再度陷于混乱。这种状况，促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更加厌恶“文化大革命”，更加看透“四人帮”祸国殃民的面目。人们心中长期郁积而又迅速发展起来的怀疑、不满和愤恨情绪已经如大宗火药堆积，一旦点燃引信，便将猛烈地爆炸起来。

六、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1966年，“文化大革命”被自上而下地发动起来。虽然它号称“群众运动”，但却违背了群众的意愿和利益。十年之后，对“文化大革命”的强烈不满却催生了一场真正的、来自人民的群众运动，而这场运动的矛头正对准了“文化大革命”本身。这时，拥护党的正确领导的群众真正成为运动的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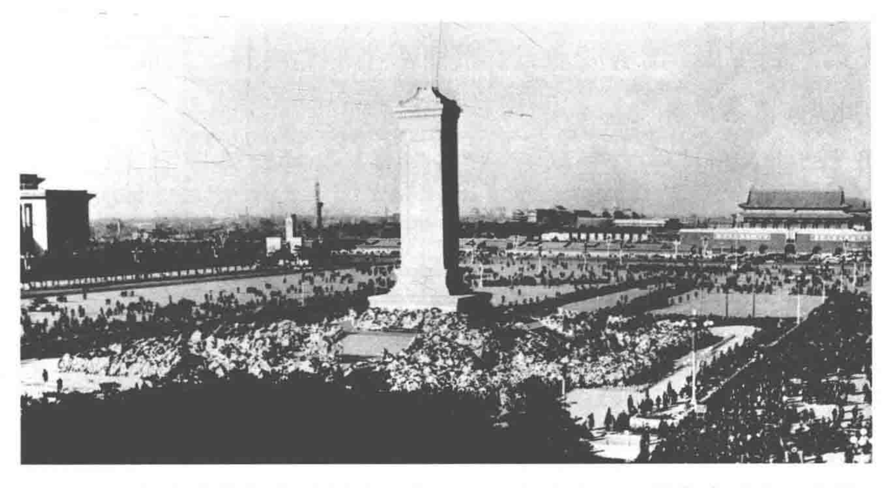
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抗议运动

1976年1月8日，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逝世。周恩来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动乱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耗尽了心血。他的逝世引起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十里长街、万人同哭的悲壮送殡场面，反映了人民在党和国家危难的时候，对于失去这位卓越领导人的极度痛苦的心情，对于如何才能摆脱灾难争取国家光明前途的无比忧愤的心情。



★ 人民群众沉痛悼念周恩来。

在为周恩来治丧期间，“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和诬蔑群众性的悼念活动，更加激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极大愤怒。自3月下旬起，南京、杭州、郑州、西安、太原等城市的群众，利用清明节祭祀的传统习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首都人民从3月底开始，自发地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花篮，张贴传单，朗诵诗词，发表演说，表达对周恩来的悼念，痛斥“四人帮”的罪恶。整个广场出现了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花



★ 1976年清明节前后，200余万京内外群众连续几天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深切悼念周恩来，愤怒声讨“四人帮”。

山诗海”。“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首有代表性的诗矛头直指江青、张春桥等人。在痛悼周恩来的同时，人们还喊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代最强音。4月4日（农历丙辰年清明），悼念活动达到高潮。首都和外地来京的群众，不顾当时一再重申的禁令，到天安门广场的达200多万人次。声势浩大，群情激愤，锋芒直指“四人帮”。当天，南京、郑州、杭州、西安等城市都出现了群众自发悼念周恩来活动的高潮。

4月4日晚，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未参加），讨论连日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态。这次会议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把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态定为反革命事件，并认为它干扰了当时运动的大方向。会议决定当晚采取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标语等措施。毛泽东的联络员将政治局会议情况和决定写成书面报告，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

4月5日凌晨，群众看到天安门广场所有的花圈、诗词、挽联等都被撤走，异常气愤，同奉命维持秩序的民兵、警察和部队战士发生严重冲突。晚上9时30分，一万多民兵和警察奉命手持木棍跑步进入广场，驱赶、殴打和逮捕留在广场的群众。4月7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由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此后，“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将“反击右倾翻案风”进一步升级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但是，这种宣传遭到了广大群众的强烈抵制。

天安门事件是全国人民反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集中表现，它的实质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已经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激起广大干部和群众愈来愈大的憎恶。人们把恢复社会秩序和党的正确方针的希望寄托于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身上，而他们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使人民对“四人帮”产生更加强烈的怒火，终于在天安门事件中集中爆发出来。以天安门事件

为中心的全国性抗议运动鲜明地体现了人心的向背，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

粉碎"四人帮"

1976年7月6日，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朱德逝世。9月9日，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在短短九个月的时间里，三位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相继逝世。亿万人民对他们在缔造党、军队和国家，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结合中国实际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的伟大功绩和卓越贡献，都怀有深深的崇敬之情。他们的逝世，使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 1976年9月18日，毛泽东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9月11日，王洪文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企图切断党中央同各地的联系，由他们指挥全国。“四人帮”指使他们的亲信在上海加紧装备民兵，作为他们夺权的后盾。“四人帮”还伪造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在报上大肆宣传，以党内“正统”自居。

“四人帮”篡党窃国的露骨活动，使老一辈革命家们深感忧虑。他们大多处境困难，但是仍通过各种渠道，互通信息，酝酿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攻势下，认识到“现在不能再等待了”[①]，必须消除这个党和国家的痈疽。经华国锋同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共同研究和反复商量，得到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支持，决定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

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审查。当晚，中央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商讨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会议通过由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这个决定后来由1977年7月举行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追认。

“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骨干探知江青等被审查的消息后，立即实行紧急动员，妄图发动武装叛乱，为挽救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最后挣扎。党中央及时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局势，使这一叛乱阴谋未能得逞。

10月14日，党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人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开怀畅饮，神州大地一片欢腾。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

---

① 《李先念传》编写组编：《李先念传（1949—1992）》（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99页。



★ 首都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和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重大胜利。

革命"中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粉碎"四人帮"，实现了党和人民的共同意愿，是党和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它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这是党和人民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起了重要作用。党和人民在经历十年的磨难和挫折之后，终于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使我国的社会秩序得以恢复正常，党和国家的工作得以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党的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

"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的动乱，使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损失最大的挫折。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受到极大削弱，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十年间"我

国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①]，“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②]。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的强力推动下，西方发达国家与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一段高速发展的时期，而中国却处在内乱中，丧失了宝贵的历史机遇。我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严重摧残，广大科技人员、教师、专家普遍受到歧视以至迫害。由于“四人帮”的疯狂破坏，十年动乱中，党的优良传统和社会良好道德风尚在相当程度上被毁弃。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派性严重泛滥。“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留下了极其惨痛的教训。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和人民对“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这种斗争十分艰难曲折。“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表明：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其中许多同志遭受严重的打击和迫害，但是他们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仍然密切关注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和发展前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党做一些有益的工作。这实际上是以不同方式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抵制和斗争。其中刘少奇、彭德怀、贺龙、张闻天和陶铸等中央政治局成员，都因遭受严重折磨而不幸去世。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他们对党对人民无比忠诚、无私奉献的高风亮节，永远被铭记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心中。我们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

---

① 邓小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1页。

② 邓小平：《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

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各级干部的抵制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社会主义建设在一些重要领域仍然取得一定进展。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全国主要工业品产量增长较快，农业稳步增长，对外经济工作有较大进展，三线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综合起来看，在"文化大革命"这十年中，中国工农业总产值指数（以1952年为100），比1965年增长了133.54%。其中工业总产值1976年比1965年增长181.7%，平均每年增长9.9%；农业总产值1976年比1965年增长51.2%，平均每年增长3.8%。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证明，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1966—1976年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

指标 年份	社会总产值		工农业总产值		国民收入		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元）
	金额（亿元）	指数	金额（亿元）	指数	金额（亿元）	指数	
1966	3062	116.9	2534	117.3	1586	117	216
1967	2774	90.1	2306	90.4	1487	92.8	198
1968	2648	95.3	2213	95.8	1415	93.5	183
1969	3184	125.3	2613	123.8	1617	119.3	203
1970	3800	124.1	3138	125.7	1926	123.3	235

（续表）

年份＼指标	社会总产值		工农业总产值		国民收入		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元）
	金额（亿元）	指数	金额（亿元）	指数	金额（亿元）	指数	
1971	4203	110.4	3482	112.2	2077	107.0	247
1972	4396	104.4	3640	104.5	2136	102.9	248
1973	4776	108.6	3967	109.2	2318	108.3	263
1974	4859	101.9	4007	101.4	2348	101.1	261
1975	5379	111.5	4467	111.9	2503	108.3	273
1976	5433	101.4	4536	101.7	2427	97.3	261

注：本表绝对数按当年价格计算。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指数以上年为10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第20—21页。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对于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追求纯洁的、完美的社会主义，自以为是开辟一条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而实际上却被束缚在一些脱离实际的抽象的观念中。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重用过林彪等人，也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他重用过江青等人，也对他们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我

们党顺利地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苏联大国霸权主义的压力，制定正确的对外政策，打开了外交新局面，并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我国社会主义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都同毛泽东的巨大作用分不开。因为这一切，特别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历史教训是多方面的。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时期里，值得从多方面不断地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总结。

（一）必须科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准确把握中国基本国情，从实际出发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想捍卫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但是，历史表明，"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根本没有事实根据的，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混淆了是非和敌我。"文化大革命"从反面告诉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指出了方向，但是不能代替我们去思考和解决中国社会主义进程中的具体问题。国情千差万别，时代不断前进，只有准确把握我国基本国情和新的时代特征，从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实际出发，充分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不断作出新的、科学的理论概括，才能深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再认识，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二）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的主要任务，

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而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不仅是理论上对社会主义认识失误的结果，更是对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错误判断的产物，是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特别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发展生产力，正确地领导经济建设，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中心任务。对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只能在党的领导下，主要依靠国家法律来进行，而不能把这种斗争简单地等同于全国范围的阶级斗争，更不能将此引申为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搞全面夺权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只能给党和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三）必须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健全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发动起来并持续十年之久，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极不健全、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有密切关系。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家长制和一言堂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他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狂热的程度，而且不容许有任何不同的意见和反对的声音。这就使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使党和国家难以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四）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而不能实行“大民主”和“造反有理”。长期以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没有得到应有重视，本来就比较薄弱的民主法制逐渐被削弱，以至到“文化大革命”遭到空前破坏。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没有民主和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根本保障。党必须领导人民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必须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必须使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具有不可侵犯的神圣权威，使全体公民的民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

范围内活动，任何一级党组织和它的领导人都不能有超出法律之上的特权。

（五）必须制定正确的党的建设的方针和政策，不断加强执政党的建设，而不能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方法。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要围绕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进行党的建设，把党的建设同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教育党的干部和党员不脱离人民群众，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存在的阴暗面和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需要高度重视，但需要作出实事求是的估计，不能夸大，更不能简单地看成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反映；要采取符合党章要求、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正确途径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不能像"文化大革命"那样采取阶级斗争的方法"重建"党的各级组织。

"文化大革命"是在探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走入歧途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自己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纠正的。"文化大革命"持续十年，以十分尖锐的形式，相当充分地暴露出我们党和国家在体制、政策、工作等方面存在的严重缺陷。正如邓小平总结1957年以来历史经验时所指出的："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1]科学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将使党和人民获得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中国这块大地上，绝不允许"文化大革命"这种内乱再度发生。

① 邓小平：《要吸收国际的经验》（1988年6月3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页。

小结　党在1949年至1976年的历史性巨大成就

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这个时期前后历时整整27年。

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这是对于党在这个时期历史的主题和主线、本质和主流所做的科学概括。

党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主要是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尤其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曾经犯过严重错误，但是从总体上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在探索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这个时期取得的历史性的巨大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面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我们确立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政治制度，即：国体——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国家结构形式——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在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又确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全面确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不仅巩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成果，而且为当代中国尔后的一切发展、进步创造了政治前提、奠定了制度基础。

第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取得历史性的巨大进展。

首先，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从“一五”计划时期开始，国家以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为中心，进行了大规模投资，逐步建成了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涉及冶金、汽车、机械、煤炭、石油、电力、通信、化学、国防等领域，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从“一五”时期起到“四五”时期，累计达4956.43亿元。在铁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有明显的进展。从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不仅增强了国防力量，而且改善了工业布局。在毛泽东生前，中国不仅已经能够自行设计和批量生产汽车、飞机、坦克、拖拉机等，而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氢弹，试制并成功发射了中远程导弹和人造卫星。这些进展，使全世界为之震惊。同时，我们还通过兴修水利、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培育推广良种、提倡科学种田，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生产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正是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自豪地宣布：“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就为中国经济独立自主的、持续的发展奠定了牢固

的物质技术基础。

其次，尽管经过了两次大的起伏，中国经济的发展，从总体上看，是相当快的。

从经济发展的速度来看：从1953年到197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9%，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1%。

从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来看：钢产量从1949年的16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2046万吨。发电量从1949年的43亿度发展到1976年的2031亿度。原油从1949年的12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8716万吨。原煤从1949年的3200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4.83亿吨。汽车产量从1955年年产100辆发展到1976年的年产13.52万辆。

从国家经济实力增强的情况来看：按当年价格计算，195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79亿元人民币，1976年增加到2965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119元增加到1976年的319元。这个数字虽然还不高，但在原有基础上的增长是很明显的。

再次，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得到逐步提高。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始终把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作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随着建设事业的进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高。全国总人口从1949年的5.4167亿增长到1976年的9.3717亿。同期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从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就是说，增产的粮食不仅多养活了近4亿人，而且使9亿多人的人均占有粮食量比5亿多人时增加了近200斤。

全国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农村居民从1952年的65元增加到1976年的131元，城镇居民同期从154元增加到365元。在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支援国家工业化基础建设的情况下，尽管人民群众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是一个奇迹。

教育事业得到长足发展。从1949年到1976年，小学在校生从2439万人发展到1.5亿人；中学在校生从103.9万人发展到5836.5

万人；高等学校在校生从11.7万人发展到56.5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0%以上。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大批地成长起来。医疗事业也得到蓬勃发展。1949年全国拥有医院2600家，到1976年发展到7850家。20世纪50年代后期，农村普遍建立了县、区（社）两级医疗卫生机构，60年代又在绝大多数生产大队建立了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这个时期，全国人口的死亡率从1949年的20‰下降到1976年的7.25‰。居民平均预期寿命随之显著延长，1949年仅为35岁，1975年提高到63.8岁。群众性体育活动广泛开展，中国运动员共获得22项世界冠军，打破和超过171项世界纪录。中国人不再被讥笑为“东亚病夫”了。

邓小平在1979年明确地说过：“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这些进步，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成果，是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优越性的初步而有力的显示。

第三，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重要的积极成果。

在探索刚刚起步时，毛泽东就论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具有中国特点的思想和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基本原则，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阐明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

此后，党又进一步总结经验，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初步作出了正确的论述，提出了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并且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重要原则。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要实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以农、

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坚持工业和农业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大中小企业并举等“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正确解决好综合平衡的问题，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生产和生活的问题，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要把“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作为努力的目标；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坚持人民民主，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处理好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尤其是人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权利；社会主义法制要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社会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实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要建设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要向科学进军，不能走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的老路，而应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在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必须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正规化国防军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的重要指导思想，还提出国防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方针，并为巩固国防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积累了军事斗争同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相结合的独创性经验。

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共产党自身建设方面，毛泽东最早觉察到帝国

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号召共产党人提高警惕，同这种危险作斗争。同时，他又十分警惕党在执政以后可能产生的种种消极现象。为此，他提出：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自觉地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服务，依靠人民群众行使这个权力，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必须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平等待人；必须防止在共产党内、在干部队伍中形成特权阶层、贵族阶层，坚决地反对党内和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必须切实解决“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问题。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阐明的这些重要思想，系统地回答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之后，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以创造性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这些思想成果，为党继续进行探索并系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第四，创造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

新中国从建立之日起，就把捍卫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为对外工作的目标，努力为国内和平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毛泽东制定的国际战略思想和对外工作方针的指引下，党领导人民逐步冲破西方敌对势力对新中国的孤立、遏制、包围和威胁，有效地维护了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安全。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于1971年10月得到恢复。毛泽东还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到197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经有113个，这包括了当时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西方对中国封锁禁运的局面开始被突破。这些都为后来中国逐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正因为取得了以上这些巨大的成就，中华民族才得以光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古老的中国才能以崭新的姿态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